

国是

Vol. 13

治学：上下而求索

洞见：财政管理、角色冲突与组织绩效

分享：我在国外大学学习的感受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

2015年5月



国 是

【顾 问】

钟 杨 曹友谊

【名誉主编】

吴建南 章晓懿 彭 勃
谢 玮

【主 编】

王云芬

【副主编】

李锦红 黄超芸 方 勇
曹逸丞 曹军强

【美术编辑】

杨树飞

【编 辑】

程雅青 韩 琳 李 婧
李利文 吕立远 马一丹
潘 阳 潘倩倩 任小龙
孙泽雨 谭新雨 杨树飞
杨玉萍 张晓敏 周裕祺
张嫣婷

卷首语

——明天会更好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 吴建南

自去年九月来学院以来，每每体会饮水思源的真切。感谢学校的肯定，让我能从交通大学西迁之地来到发源地。感谢母校西安交通大学的多年培养、支持关照，让我能够不断成熟、适时进入新的阶段！感谢学院各位同事、同学的支持关照，让我很快适应新的环境！彼时此刻，感慨万千！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一份子，我深感地处东海之滨的上海给我们海纳百川、包容世界的胸怀，更深知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上海交通大学给我们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平台，更明白以国际为先导的公共事务学院给我们沟通交流、通力合作的舞台。

我坚信，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大政方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乃至全国各个省市的战略举措，都给我们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每一个学科、每一个团队与每一位师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目录

洞见

财政管理、角色冲突与组织绩效：
面向中国乡镇政府的探索性研究 1
吴建南 李贵宁 侯一麟

从大国间关联利益看国家安全美国
对俄德的经济战略及其后果 11
黄琪轩

台湾地区民主巩固下的政治支持 22
吴维旭

治学

上下而求索 35
彭勃

对研究生教育的一些看法 37
黄宗昊

注重历史与政治的经济学研究 40
吕守军

开卷

《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
译者感言 43
徐家良

范式与沙堡
—评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
化：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 45
陈拯

有感

苛政之后的“同情”：毁灭还是繁
荣？—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
命》 49
李利文

斩断伸向民众的黑手
—读《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
以发生与应付》 51
沈星辰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
基础》与公共事务中的集体行为
选择 43
殷航

汤面与华年 55
潘倩倩

分享

我在国外大学学习的感受 57
韩广华

志存高远 昂首向前 59
张楠

比利时，此刻的青春最美丽 61
晏子

一个文科生的自白 64
武子珺

当“学神”遇上“三好标兵”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66
朱宇轩

前沿

政治学领域前沿梳理 68

公共管理领域前沿梳理 70



财政管理、角色冲突与组织绩效： 面向中国乡镇政府的探索性研究*

吴建南 李贵宁 侯一麟*

摘要：在财源有限而公众需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内增外减的结构性失衡，进而影响整体政府组织绩效的改进与提升。本研究以陕西省特定乡镇政府为对象，采用文献探讨、年度财政资料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揭示在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中国地方政府组织财政管理与其绩效关系主要是通过财政管理调控组织首要领导的角色冲突程度来间接作用的。研究发现，现阶段政府组织绩效的影响因素，固然有内部管理的问题，而整体财政管理体制尤其是事权与财权的严重不对等，是造成现阶段乡镇政府绩效不佳的根本原因。在此背景下，如果不尽快调整财政管理体制，会进一步加剧乡镇政府的不作为并使绩效水平较低的状态进一步恶化，更使目前“乡镇政府何去何从”的问题更加让人关注。

关键词：财政管理；角色冲突；组织绩效；乡镇政府

一、引言

当代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财政资源有限而公共需求无穷的难题。为应对这一难题，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深受财政危机困扰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旨在增进政府部门效率和效能（施政绩效）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财政，作为政府施政计划具体实现的首要途径，也是政府部门中影响组织行为最强有力和起支配作用的因素（维尔，1981），首当其冲成为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焦点和突破口。例如美国于1990年左右推动绩效预算（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主张政府组织的预算必须与中长期的战略规划相结合，强调以组织整体的目标为导向，以绩效评估手段，要求政府组织建立政府战略规划。为促成这一财政改革的实施，美国还于1993年颁布了与之相应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如加拿大（Expenditure Management System）、英国（Medium Term Financial Strategy）、新西兰（Strategic Management）、澳大利亚（Financial

Management Improvement Plan）以及瑞典（Three-year Guidelines）等国都相继实施了以财政改革为根本内容的行政改革新方案（吴建南、李贵宁，2004）。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时期，我国政府也同样面临财源匮乏，公共支出需求激增的财政困境。为应对中央财政日益吃紧的困难局面，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施了以“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改革运动。通过重新界定和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有效地集中了国家财政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财政的困难境地。然而，这一系列财政改革的实施在向上竞争性地集中财政资金的同时，将事权逐层下放，在很大程度上也加重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尤其是处于中国政府层级底层的乡镇财政的负担。自1985年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以来，乡镇财政在国家财政整体框架和国民经济中就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国民经济的基本要素，是国家财政的基础环节。乡镇财政的状况影响着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广大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关系到全社会



的安定团结和政治稳定。

除了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外，影响乡镇财政的国家性财政管理制度还有 1995 年预算管理制度和 2000 年税费改革制度，另外还有特定县乡财政关系的作用。这些国家或地方的财政管理体制，总的说来，通过集权化或自上而下“压力型”方式限制了乡镇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同时，由于政府事权的逐层下移，乡镇财政支出需求也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在这两种相互冲突力量的作用下，乡镇政府整体呈现出财权和事权高度不对称状态，压力（尤其是财政压力）凸现。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在整体财政紧张背景下，处于中国政府层级最底层的乡镇政府，其财政状况及压力是否会影响其管理绩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影响体现哪些地方？更进一步来说，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其绩效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乡镇财政管理对乡镇政府绩效的作用过程，可能还有助于我国政府管理实践界和研究界广泛关注的“乡镇政府何去何从”问题的探讨。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乡镇财政管理困境及其压力产生的影响原因（荣敬本等，1998；吴理财，2001；朱钢，2002；韩俊、唐卡，2003；赵菊娥，2004；赵树凯，2004；樊丽明、石绍宾，2005），而对于财政管理对乡镇政府绩效的作用影响则较少提及，至于是如何影响等作用路径研究则更为少见。目前仅有吴理财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探讨了乡镇政府职能调整和角色变迁话题（吴理财，2001；吴理财，2003）。本文以陕西特定乡镇政府为对象，采用文献探讨、年度财政资料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深入个体乡镇政府“黑箱”内部，探讨财政管理与政府组织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希望能够揭示这样的规律，即在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财政管理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财政管理调控组织首要领导的角色冲突程度来间接作用的。这样，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想从根本提升乡镇政府绩效，根本途径可能是调节财政管理体制。

二、文献综述

（一）基本概念

1. 财政管理与控制

从一般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说，管理控制是组织创造环境激励组织成员努力工作，以实现组织期望目标的行为过程（Fisher, 1995）。依照实施渠道特征的不同，有正式管理控制与非正式管理控制之分，其中，正式管理控制包括会计控制与非会计控制（Abernethy, 1996）。财政管理控制是一种通过财政或财务数据信息进行的正式管理控制，包括会计控制如预算管理以及非会计控制如行政命令两种形式，涉及组织财政/财务资金收入、运营及支出的所有阶段和行为。其中，预算管理作为财政/财务管理控制的核心内容，是一种结果形式的管理控制（result form of control），是组织通过规范控制组织成员的行为，以实现组织预期目标的一种管理工具或方法（Merchant, 1995）。

2. 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是组织理论发展与研究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Leigh, Lucas & Woodman, 1988），是指一个人在扮演组织所界定的角色行为中，同时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且不一致的期望，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期望，都不可能或很难满足其他的角色期望。此时可能会因个人的内在标准、价值观、能力或特质之影响，而与组织（包括他人、规范或参考团体等）所期望的行为不一致，进而形成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Rizzo *et al.*, 1970；Stryker and Macke, 1978；Hoy and Miskel, 1982；Tuner, J. H., 1982）。

3. 组织绩效

绩效是一个普遍概念，任何系统都存在绩效问题。组织绩效（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泛指组织运行过程及其结果表现。具体地，考虑到组织所处的动态、复杂、多维交织的内外环境，组织绩效是指特定情境中的组织，在特定形势（situation）的驱动下，为实现或提升组织价值，而在其运作全过程中围绕绩效维度所展现出来的状态或程度。究其可操作化的概念内涵来看，组织绩效框架包括了利益相关主体贡献、战略、能力、过程以及利益相关主体满意等存在因果关系的五个层面（Kaplan and Norton, 1992；Neely and Adams, 2000）。

4. 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源于经济学，主要指一个地区或国家所拥有的“先天”给定的资源要素，具体包括土地与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与环境、人口及其结构、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本积累等等。它是一个地区或国家比较优势产生的基础。

(二) 相互关系探讨

1. 财政管理和角色冲突的作用关系

在管理科学上，组织的控制环境，包括行为控制、产出控制以及专业控制，对角色冲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Abernethy and Stoelwinder, 1995）。具体到乡镇政府组织来说，乡镇财政的建立使乡镇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财政权力，这为乡镇政府自利倾向的形成和自利行为的实践奠定了基础。正是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涉及乡镇政府的财政管理改革的影响，导致乡镇政府“公共倾向”的衰落，“自利倾向”的产生（吴淼，2003），最终促成了乡镇政权（包含政府）从“国家代言人（代理人）”向“国家型经纪人”的角色冲突与转变（吴理财，2001；吴理财，2003）。

2. 角色冲突和组织绩效的作用关系

在政治科学中，乡镇政权（包含政府）可以被视作一种具体的结构（structure），进而进行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每一种结构都是由各种角色组合构成。“采用角色和结构两个术语，而不用职位和机构这两个用语，是为了强调参与政治的个人的实际行为，强调政治机构的实际行为”（阿尔蒙德等，1987）。乡镇政权“国家代言人（代理人）”与“国家型经纪人”的角色冲突（职能异化）会动摇群众基础，危及国家政权（吴理财，2001；吴理财，2003）。

在管理科学上，角色冲突作为角色压力的两种构成形式之一，产生的结果是焦虑和工作不满足，在直接降低个人绩效的同时，也间接导致较差的组织绩效（Rizzo *et al.*, 1970; Abernethy and Stoelwinder, 1995）。总的说来，二者呈现负相关的作用关系。

3. 财政管理和组织绩效的作用关系

管理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财政/财务管理对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在政府管理领域，财政是政府施政计划具体实现的首要途径，

也是政府部门中影响组织行为最强有力和起支配作用的因素（维尔，1981）。因而财政管理导向政府绩效的因果关系是确定无疑的。

4. 资源禀赋对财政资源的影响作用

资源禀赋的研究一向集中于经济研究领域，多探讨其对特定地区或国家比较优势的影响作用。在财政管理特别是在财政收入方面，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多数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由资源禀赋差异而产生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地区或国家间财力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三、理论构建

按照管理系统理论观点，政府组织可被视作“黑箱”（Yilin Hou, Moynihan and Ingraham, 2003）。政府组织获取资源，输出结果，对于外界来说，是可直接观测和认识的事情，而对于政府组织这一“黑箱”内部的作用关系、运作流程则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由财政管理行为影响的财政资源，如何通过乡镇政府这一“黑箱”的处理和作用，进而影响政府管理绩效的。



图1 政府“黑箱”理论示意图

1. 乡镇财政及其压力

我国乡镇财政普遍建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撤社建乡”的基础上，我国于1985年开始建立乡镇财政制度及相应财政机构，乡镇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财权。随后，借鉴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思路，乡镇建立了“分灶吃饭”和“层层包干”式的财政体制。1994年，鉴于日益困难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形势，国家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其后，广大乡镇普遍建立起以分税制为导向的财政体制（吴理财，2003；赵树凯，2004）。

在分税制以前，乡镇财政的收入来源相对比较随意，即便是财政困难，上级财政还有一定的转移支付。此时，一般来说，其财政利益可以得到保证。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得以重新划分，财政出现层层向上集中的趋势，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中央财政的匮乏局面，但是却造成地方政府特别是广大乡镇政府普遍陷入“财政困境”（赵菊娥，2004；赵树凯，2003；赵树凯，2004；吴理财、李芝兰，2003；韩俊、唐卡，2003）。

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正式颁布实施。作为现代政府财政管理制度的核心，乡镇预算管理更是呈现上级主导的特征，预算参与程度低、预算控制强，财政收支规模、结构受到限制。“分税制”改革后，目前县乡两级财政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比较普遍的“分税包干，自求平衡”；二是比较少见的“县级统筹”（安徽省全省试行“乡财县管”）（赵树凯，2004）。由于乡镇财政没有或很少具备实质的财权，不管哪种形式，县级财政总有主导或者绝对主导地位，乡镇财政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在财政匮乏背景下，乡镇政府预算总是呈现“非递增”的特征（Schick, 1988）。

从2000年起，国家在包括安徽省在内的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推行旨在规范农村税费制度的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税费改革也限制了乡镇政府收入的随意性，同时也使乡镇政府无法直接向其服务对象收费，降低了收入来源，增加了收入的不稳定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乡镇的财政困境（朱钢，2002；樊丽明、石绍宾，2005）。

从上述来看，在财政匮乏和困难背景下，从县乡财政分权，到分税制和预算管理，再到税费改革，乡镇政府的财政来源逐步缩减，财政困境加剧，自上而下、集权化的“压力型”财政管理特征渐趋明显（Rubin, 1997；荣敬本等，1998；吴理财，2001）。

而与财政困境不相适应的是，乡镇政府所承担的社会事务却日益增多，在财力逐层向上集中的同时，事务却逐渐下移，特别是在乡镇层级，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对称。按照事权划分原则，区域性公共物品由地方相应层级政府提供。然而在财权向上集中的过程中，乡镇政府却仍然需要承担地方公共物品（包括传统的，和应公众需求新增加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职责，同时还要承担上级政府指派临时性任务（贾康、白景明，2002）。由

此可见，在具体事务增多或公众需求结构变化的情况下，乡镇政府所掌控的财政资源不但没有相应增加，相反还逐渐减少，因而乡镇财政普遍面临沉重的“压力”。

2. 财政管理对乡镇政府及其主要管理者角色冲突的作用

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由工商部门、社会部门和政府部门三个部门所构成。一般来说，三个部门中的任何组织都必须同时应对内外环境，因而都具有对内（自身发展）对外（公共服务）的双重职能，并且其组织双重职能结构的差异决定了组织的根本性质。例如，企业靠“利润动机”的驱使（以对内的自身发展为主要职能），政府以照顾多数民众为原则（以对外的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而社会部门则靠“使命”来引导（德鲁克，1994）。

作为现阶段中国五级政府中的最低层级，乡镇政府也同样具有对内自身发展和对外公共服务的双重角色。其中，体现乡镇政府根本性质的是，对外公共服务职能是主要的，而对内自身发展职能是次要的。但在特定压力环境下，如集权化、自上而下财政管理压力（县乡“压力型”财政管理体制，具体表现特征是乡镇财政收支规模、结构受到限制，预算参与程度低、预算控制较强等），财权事权不对称的乡镇政府，其职能结构就会发生动态调适。

面临财政压力，政府的调适行为不外乎“开源”、“节流”（《墨子》）两种对策，也即对抗策略(resistance measures)或者缓和策略(smoothing strategies)（Levine, 1978）。对抗策略是针对收入层面而言，意味着增加收入，但是在整体财源匮乏背景下，鉴于前述的集权化的和自上而下财政管理体制，乡镇政府无法从传统的税收中增加收入，并且在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无法直接面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因此，对抗策略是不太可行的。缓和策略是针对之出面而言的，意味着减少支出，即重新界定支出方向，限制支出规模，对乡镇政府来说，在对抗策略不太可行的情况下，缓和策略相比较而言较为实际，符合乡镇政府理性需选择特征。

由此可见，在整体财源匮乏背景下，如

果当增加收入变为不可行，并且财政压力大到足以影响乡镇政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乡镇政府便会限制支出规模，调整支出结构的优先次序 (Schick, 1988)，主要是限制公共支出需求，减少公共支出数额，维持自身生存与运转。此时，乡镇政府角色从以公共服务职能为主转变为以自身发展职能为主，甚至以牺牲或利用公共服务职权来维持或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从而徘徊于“公共物品提供者”与“营利性经纪人”之间（公共和自身职能异化）（吴理财，2001；吴理财，2003）。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政府机构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指国家特定的行政机关首长在所属行政机关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本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时享有最高决定权，并对该职权行使后果向代表机关负个人责任的行政领导制度（黄贤宏，1999）。与上述乡镇政府职能特征相适应，在行政首长负责制特征尤甚的乡镇政府中，乡镇政府首要领导总是同时面对外部公众和内部雇员（包括自己）两大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要求，同时扮演着“公共利益维护者”和“自我利益的保护者”两大角色。由于乡镇政府首要领导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决定了整个乡镇政府的行为特征，因而财政压力下乡镇首要领导处理内外利益时在个人内在、组织期望、个人资源以及多角色扮演方面的冲突，很大程度上（自然地/直接地）决定了乡镇政府职能的异化。

3. 角色冲突对政府组织绩效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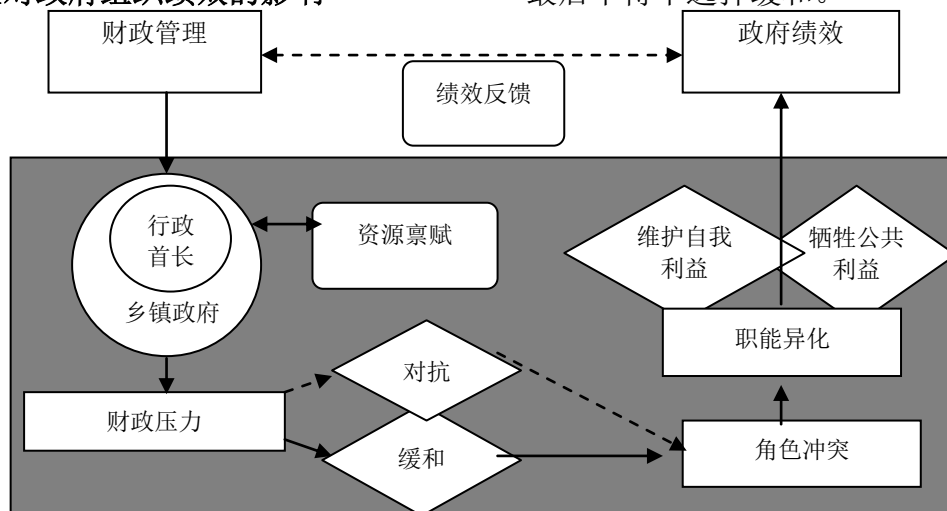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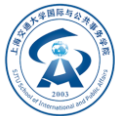
图2 财政管理、角色冲突与政府组织绩效研究理论框架示意图

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广大乡镇政府组织中，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党政一体特征明显，乡镇首要领导对乡镇政府运作绩效的影响非常显著。而根据组织行为学相关研究，角色冲突会在根本上降低管理者绩效进而导致整体组织绩效不佳。由此可见，此时乡镇政府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政府主要领导的角色冲突状态或程度（Rizzo *et al.*, 1970; Abernethy and Stoelwinder, 1995）。

4. 资源禀赋对财政压力及角色冲突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除转移支付收入外，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行政规费以及资产收入等其他收入，其中税收收入（包括税收返还）是主要来源。税收的丰歉则与当地的工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然而工商业活动的规模则主要取决于土地与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与环境、人口及其结构、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基础建设以及资本积累等资源禀赋要素。因此，资源禀赋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财政状况。

资源禀赋对乡镇政府财政压力及角色冲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乡镇政府的调适对策选择环节。如果资源禀赋及其所引发的工商业活动能够提供充足的自有财源保证乡镇政府应对日益紧张困难的财政局势，出于成本和风险的理性考虑，乡镇政府会比较倾向于选择增加收入的对抗策略，而放弃删减公共支出的缓和策略。而对于那些资源禀赋条件比较差的乡镇，选择对抗策略几乎是不可行的，最后不得不选择缓和。



四、案例分析

(一) 调查背景

2005年6月,作者对陕西关中西部地区某镇(以下简称A镇)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入访谈和查阅资料的方式来收集信息。访谈对象为A镇主要官员,包括A镇党委书记,镇长,党委副书记兼副镇长,副镇长,以及镇财政所所长,另外,还包括原县统计局副局长。查阅资料主要包括A镇财政预、决算报表。

A镇属于城郊型乡镇,地处秦岭北麓边缘地区,南邻渭水,辖村18个,其中1/3为城中村,1/3为平原村,1/3为山区村;辖区居民1.6万人左右,总居住人口4万多人。A镇辖区内企业数量较多,多为国有型企业,乡镇企业仅有3家。A镇财政供养人口300多人,其中镇政府工作人员70多人,教师200多人,卫生所人员20多人,官方公布官民比为1:49。A镇属于财政紧张型乡镇。

(二) 乡镇政府财政压力:

财权与事权不对称

1. 财政管理及其压力形成: 历程与现状

1985年A镇(由乡改镇)建立,镇财政所也同时建立,但没有建立相应的金库。有财政机构但没有赋予相应财权,这对A镇来说,意味着乡镇财政机制的不完全。A镇政府官员也不止一次说到“乡镇财政只是个空壳子,虚的”,“没有独立自主的财政收入权和财政分配权,每次开乡镇人代会的时候,还要提交政府工作报告汇报财政收支状况,觉得很尴尬”,充分从乡镇本身表达了对乡镇财政机制的总体认识和感受。从A镇财政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我国财政已经具有显著的集权化和自上而下特征,处于中国政府最基层的乡镇政府,财政权力越来越弱化,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外收入同时减少,财政状况日益拮据艰难,近乎“雪崩”。详细内容如下。

自A镇财政建立以后,历经了多次财政管理改革,其中对A镇财政影响较为深远的财政管理变革或制度是:

(1) 分税制改革。A镇从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将消费税100%,增值税75%上划国家,增值税25%由省、市、县、乡进行二

次分配。分税制的实施对A镇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也是历次财政改制所带来的影响最大的一次。A镇在实施分税制以前的1993年,财政结余在300万左右,实施分税制的第一年即1994年,财政开始出现赤字。A镇领导说,分税制“使A镇从富变穷,由盈余变赤字”。

(2) 税费改革。A镇从2002年开始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等收费项目,减轻农民负担50%左右,减少财政收入30多万,占A镇财政预算收入的10%以上。在此基础上,A镇还逐步取消了面向农民的农林特产税和农业税,到2005年,农业税将全部取消。至此,农民税费负担几乎没有,而A镇财政预算收入减少50万左右,加上费改税损失,总计减少财政预算收入80万左右,占A镇年财政预算收入的40%以上。税费改革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乡镇政府再不能向农民(服务对象)收取任何费用,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乡镇的制度外财政。这虽然在制度上规范了乡镇政府乱收费行为,大大减轻和消除了农民负担,但在实质上却削弱甚至瓦解了乡镇财权和财力,以至危及乡镇政府正常运转。

(3) 县乡财政分成比例。按照A镇所在县财政部门颁布的规则,县乡之间的财政分成比例是县48%,乡镇52%。每年财政预算收入的几乎一半都要上解县级财政。

(4) 年度预算。A镇每年的财政预算都是由县级财政部门代为编制。预算编制一般都是上面说了算,编制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即便A镇领导向上反映乡镇意见,但也不会受到重视。在上述制度作用下,截至2004年,A镇的财政预算收入2,397,108元,财政预算支出5,401,396元,除去上级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收入,赤字20余万,累计赤字5,140,906元(包括改制前的企业负债,基础设施改造或修建拖欠的工程款等)。

2. 事权膨胀: 进一步凸现财政压力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行使下列职权：（1）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2）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3）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4）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5）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6）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7）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从 A 镇的实际情况来看，A 镇政府的事务主要包括临时性、突发性事务，日常行政事务，以及一些迎来送往的应酬三部分，其中临时性、突发性事务是最多的，占到整个 A 镇政府事务的 60% 左右，这些都与上级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相对应。这种类型的事物之所以多，一是因为制度的原因，国家法律规定乡镇政府要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上级往往也通过这种途径将很多事务下压。政府层级越低，它所面对的上级政府越多，需要执行的上级政府的政策与命令也就越多。二是还存在个人的考虑。这里所说的个人就是乡镇行政首长。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背景下，乡镇行政首长个人的政绩、升迁、荣辱多与上级意志密切相关，因此上级交办任务不得不全力完成。三是还有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A 镇由于地处城郊，本是上级政府的工作或任务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和下派给 A 镇政府，例如城市创卫、创文明工作。

另外，还存在一种因素就是基层政治体制不顺。在实施“村民自治”之前，上级将事权下压给 A 镇政府以后，A 镇政府还可以将部分事务下派给村，而现在由于村民自治以后，原来还具有“下级”意义的村，对乡镇政府不再是服从态度，而是讨价还价的谈判态度，乡镇政府无法再将事权下压，从而处于一种两面受压的尴尬与困难境地。面对如此境地，A 镇领导们深有感触，“乡镇政府

就是办事机构，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对于某些事务“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却有这方面的事情要做，且不说我们还没钱做这些事情”，“领导指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事务，钱的问题自己解决”。由此可见，在整体事权自上而下逐层下放的背景下，乡镇财政支出需求膨胀。

（三）乡镇政府内外角色冲突与行为选择： 财政压力的自然结果

面对日趋沉重的财政压力，A 镇的主要领导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增加收入，二是控制支出。对于增加收入来说，这是 A 镇领导们最优先考虑，也是考虑最多对策。但是对于 A 镇来说，A 镇财政没有财权，无法独立组织收入，特别是预算内收入，除常规的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外，A 镇还常常主动争取一些上级专项收入，这主要靠竞争。另外，乡镇领导总是能找到特定的办法，争取到一部分预算外资金，例如辖区内企业的赞助，乡镇企业改制或承包费用等等。就 A 镇的情况来看，由于辖区内有很多企业，尽管多数都是国有、市管或县管的企业，A 镇政府也可以通过为这些企业协调处理一些纠纷或其他事务，争取到一部分制度外收入。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税费改革方面的制度因素，这些制度外收入都不是稳定的、持久的，甚至有时候不是正规的收入。但要维持乡镇运转，这些又都是无可避免的做法。整体来说，这些收入，相对于 A 镇的实际需求来说，例如消除债务，完善区域公共物品，这只是“杯水车薪”。

对于控制支出来说，整体来看，A 镇政府的情况已经将开支控制到极限。一般依照对内对外职能的不同，指出控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控制自身支出，二是控制公共支出。如何选择？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很难取舍的问题，面对实际状况，哪一种回答都存在问题”。选择前者，乡镇政府难以为继，自身利益得不到保证，“没有生存，何来发展”；选择后者，悖离甚至缺失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乡镇政府即便存在，实际上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显现合法性危机。面对这一两难处境，在当前行政首长负责制下，A 镇首要领导面临沉重的角色压力和高



度的角色冲突。在调查中,面对履行对外公共服务和对内自身建设,A镇首要领导深有感触,“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规则或政策自相矛盾,缺少足够的资源或条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常常睡不着觉”,“压力很大”。这些言论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A镇首要领导扮演内外角色时在时间、资源以及内心期望方面的高度冲突。

但是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制度性的选择。近几年国家实施了“两个确保”,“保工资,保稳定”,A镇财政的80%—90%,有时甚至更多,都用于公职人员工资的发放,再加上每人每年400元的公用经费,除某些特殊情况外,基本维持了政府运转,“保证开门”。然而对于公共支出而言,A镇财政根本无力负担,这时候A镇主要领导除了考虑精简编制外雇员之外,更多地考虑是减少公共支出项目,降低公共服务水平。即便做,也只是做一些常规性公共服务,象征性做一些事情,如咨询、协调工作;但有时候政府会被逼着做一些大的公共支出项目,但多采用“启动性”、“前期性”公共支出,如基础设施修建与维护,教育发展等,在财政压力下,这部分“启动性”、“前期性”支出往往形成更大的乡镇政府隐性债务,并逐年累积。

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县乡财政体制对乡镇政府角色冲突的具有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A镇所在的县将工资发放收归县级财政部门,由县级财政部门负责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发放,很大程度上间接减轻了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镇的财政压力以及角色冲突程度。对此,A镇首要领导也坦言,“工资有保证以后,我们个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压力。”

(四) 乡镇政府绩效: 观点与探讨

根据调查,现有的对A镇政府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乡镇与上级政府签订的目标责任项目,内容主要包括GDP,招商引资,农民纯收入,科技推广以及计划生育达标情况等几项内容,对辖区公共物品提供情况根本没有或很少涉及。从上级政府的角度来说,只要完成这些上级交办的任务,就是乡镇政府的绩效。但是,这些评价项目与政府行为的因果相关性尚有待探讨,并且其强

烈的经济发展偏向,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乡镇政府的工作方向。从A镇政府本身的角度来说,对于A镇政府的绩效而言,A镇的主要领导们大都表示这样的看法,“A镇政府的最大绩效就是能保证发工资,维持A镇政府的正常运转”。从这个角度来说,A镇政府的绩效是处于较高水平的。这种观念正与前面提到的A镇首要领导的角色压力与冲突相对应,并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引致A镇政府的行为选择以及最后的结果表现。然而从辖区公众的角度来说,A镇政府最重要的是要提供辖区内的公共物品。但是由于前述的财政压力与角色冲突原因,A镇政府根本无力承担所有区域公共物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A镇政府的绩效很难达到较高的水平。乡镇政府的绩效到底是什么,学术界与实践界还正在探讨,但是,从乡镇政府的服务对象——辖区群众的角度来讲,A镇政府的绩效水平亟待提高。

(五) 资源禀赋: 财政压力的重要调节因素

在本研究中,资源禀赋的作用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A镇地处城市边缘,辖区内国有企业,市直属企业,县直属企业众多,人口集中,工商业活动较为发达,这为A镇财政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收入来源。尽管A镇财政仍然拮据,然而资源禀赋对财政压力以及角色冲突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正如A镇财政所长感慨,幸好“A镇靠近城市,地面上还有这么多企业,还能争取到一些收入”,“那些地处山区,偏僻的乡镇,政府连工资都发不起,更不要谈做什么实事了”。A镇党委书记也描述了去深圳乡镇考察的感受,“深圳那边的乡镇太富了,A镇根本没办法跟人家比,A镇要是那样子,我根本不用操心什么。”

五、结论

自1994年以来分税制开始实施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已经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型。在诸多改革举措中,从表面上观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似乎涌现了一批理性的“经济”主体:级别越高,“理性”即“自利性”越强。这种情况可能直接导致了财权与事权划分过程中的不对等博弈,从而

逐渐形成了自上而下政府财权与事权的极度不对等的境地。

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主要致力于探讨乡镇政府层面财政管理、角色冲突和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作用路径。之所以选择乡镇政府，主要是考虑到乡镇政府处于中国五级政府的最底层，直接面对中国具有直接意义的“三农”问题，而乡镇政府的行为表现直接表现为国家政策的实施。而在集权化的体制下，再加上财权的不完备，乡镇政府所受到的财政压力，以及与此相关的角色压力与冲突最为显著。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绩效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呢，以及如何受到冲击呢？这是本研究主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通过以陕西特定乡镇政府为对象，采用

文献探讨、年度财政资料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本文发现，在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财政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主要是通过财政管理调控组织首要领导的角色冲突程度来间接作用的。但是同时，本研究也发现了政府绩效因果关系链上新的影响因素，这就是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收归上级财政发放的管理制度，它在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之外，也对乡镇政府的角色冲突起着很大的调节作用。本文认为，财政管理在根本上决定着乡镇政府组织的绩效，只有解决了乡镇政府的财权，或者划分与财权相对称的事权，减少财政压力，降低与此相关的内外角色冲突，才能在根本上改善乡镇政府的绩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203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3CZZ006）资助项目、国家985工程资助项目。

致谢：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及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吴建南.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贵宁.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侯一麟. 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1] 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P: 100-150

[2] 德鲁克著，余佩珊译，非营利机构的经营之道，（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3] 樊丽明、石绍宾，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县乡财政运行分析——以临沂市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65-70

[4] 韩俊、唐卡，财政体制与县乡财政——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研究员韩俊，税收与社会，



2003年09期: 1-3

- [5] 黄贤宏, 论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 中国法学, 1999年03期: 98-103
- [6] 贾康、白景明, 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 财税与会计, 2002年第5期: 9-13
- [7] 荣敬本等,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8] 维尔著, 美国政治, 王合、陈国清、杨铁钧译, 商务印书馆 (1981), P: 155
- [9] 吴建南、李贵宁, 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型及其通用指标体系构建,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25-31
- [10] 吴淼, 财政困境下的乡镇政府行为选择, 调研世界, 2003年第2期: 20-23
- [11] 吴理财, 农村税费改革与“乡政”角色转换, 社会, 2001年06期: 28-31
- [12] 吴理财, 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 收录于黄卫平、邹树彬主编《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 案例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第1版
- [13] 吴理财、李芝兰, 乡镇财政及其改革初探——洪镇调查, 中国农村观察, 2003年第4期: 13-24
- [14] 赵树凯, 困局中的乡镇财政——10省区20乡镇的调查, 决策咨询, 2004年10期: 21-23
- [15] 赵树凯, 乡村治理: 组织和冲突, 战略与管理, 2003年06期: 1-8
- [16] 赵树凯, 乡镇政府的财政困扰, 领导文萃, 2004年01期: 46-48
- [17] 赵菊娥, 完善县乡财政体制的观点综述, 经济研究参考, 2004年第63期: 40-45
- [18] 朱钢, 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缺口, 中国农村观察, 2002年第2期: 13-20
- [19] Abernethy, M. A. (1996). Physician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Role of Accounting and Non-Accounting Controls. *Financial Accounting & Management* 12(2): 141-156
- [20] Abernethy, M. A., and J. U. Stoelwinder (1995).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Control in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1): 1-17
- [21] Allen Schick (1988). Micro-Budgetary Adaptations to Fiscal Stress in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8(Jan./Feb.): 523-533.
- [22] Andy Neely, Chris Adams (2000). Perspectives on Performance: The Performance Prism. Cranfield School of Management. www.Cranfield.ac.uk.
- [23] Fisher, C. (1995). Contingency-Based Research on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Categorization by Level of Complex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Literature* 14: 24-53
- [24] Hoy, W. K. and Miskel, C. G. (1982).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Ed. Random House, New York, N.Y.
- [25] Kaplan, R.S., and D.P. Norton (1992). The Balanced Scorecard—Measures That Drive Performa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p.71-79.
- [26] Levine, C. H. (1978). Organizational Decline and Cutback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8(Jul./Aug.): 316-324.
- [27] Leigh, J.H., G.H. Lucas, and R.W. Woodman (1988), Effect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 Role Stress-Job Attitud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4 (1), 41-58.
- [28] Merchant, K.A. (1995). *Control in Business Operations*, London: Pitman
- [29] Rizzo, J. T., House, R. J. and Lirtzman, S. I. (1970).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 in Complex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5: 150-163.
- [30] Rubin, Irene S. (1997). *The Politics of Public Budgeting: Getting and Spending, Borrowing and Balancing*, 3rd ed. Chatham, New Jersey: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Inc.
- [31] Stryker, S. and Macke, A. S. (1978).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Role Conflict. *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 69-90.
- [32] Tuner, J. H. (1982).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Wadsworth Pub. Co., Belmont, CA. pp.417-437.
- [33] Yilin Hou, with Donald Moynihan and Patricia Ingraham. (2003). Capacity,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Exploring the Link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 3, pp. 295-315.

从大国间关联利益看国家安全

——美国对俄德的经济战略及其后果

黄琪轩*

摘要：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面临一次战略机遇，将昔日的对手俄罗斯转变为合作伙伴；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也曾面临过类似的机遇：将欧洲最大的战争机器德国转变成盟友。美国对俄罗斯与联邦德国实施的经济战略后果迥然不同。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战略是失败的，它让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疏远；而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对联邦德国的经济战略则取得了成功，将往日的对手转变成了盟友。本文试图指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俄罗斯转型问题上实施了消极的对外经济战略，既没有减免俄罗斯背负的债务负担，也没及时有效地提供援助。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其国内政治困局，也使得俄罗斯民众和精英对西方国家的认知越来越负面，美国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协助昔日的对手德国进行经济重建，并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这样的经济战略最终也惠及美国。因此，即便是相互竞争的国家，国家利益也存在关联性。随着当代世界安全结构的变迁，大国的利益半径在扩大，关联利益日趋明显。要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就需要关照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俄罗斯改革；美国对外战略；关联利益；国家安全；德国重建；马歇尔计划；现实主义政治经济

1991年末，苏联解体。在没有发生大战的情况下，国际格局出现了重大的体系变革。在对苏联心怀畏惧长达近七十年，实施遏制政策长达四十余年以后，美国领导人面临一次全新的战略调整：如何帮助俄罗斯政府发展市场经济，建立民主国家，这对美国外交战略而言是一个新的契机。如果积极作为，美国就能帮助俄罗斯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将俄罗斯转变为合作伙伴。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战略却是失败的，没能把昔日的对手转变为可靠的合作伙伴。这让美国政界、学界、新闻界不少人埋怨：谁失去了俄罗斯？美国对俄经济战略的失败与二战后美国对联邦德国的经济战略形成鲜明对照。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也面临过类似的困境：如何将欧洲最大的战争机器德国转变成一个和平取向的国家？而美国的对德经济战略则是成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将惩罚德国的措施转变为重建德国，并提供马歇尔计划等大规模的国际援助，战后的欧洲才能有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安排最终也惠及美国。俄罗斯与德国同为美国昔日的竞争对手，为何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在俄罗斯失败了，但却在德国取得了成功？

一、对德与对俄援助的不同成效： 不同的视角

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战略让俄罗斯日益疏远美国；而对联邦德国实施的经济战略塑造了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国际关系不同流派会从全然不同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

自由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制度的力量。约翰·伊肯伯里在其著作《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中指出：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霸权是不情愿的霸权；也是民主的、开放的霸权。它在战后建立的制度对自己形成约束，并建立了一套将各大国捆绑在一起的政府间制度安排，从而将世界各国锁定在有利的战后秩序中。^[1]因此，美国能成功地转变德国，有赖于强大的国际制度。但是制度主义者却需要回答：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制度为何无助于将俄罗斯转变为西方国家的可靠伙伴？

建构主义者强调理念、规范的力量。克雷格·帕森斯认为二战结束以后，欧洲具有“准联邦制”特点的一体化进程离不开理念的作用。在法国政治精英的推动下，从“欧共体”到“欧盟”这样一套独特的政治理念在法国形成演变。这一理念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推动了战后欧洲一体化，也实现



了法德和解。^[2]而泰德·霍普夫则强调俄罗斯普通民众的共识迫使俄罗斯领导人改变了对世界政治的看法。俄罗斯的精英要求推进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走得更近；而俄罗斯普通民众则持有不同的看法。当大众的理念和精英发生分歧时，大众观念形成了巨大的阻力使俄罗斯无法走向西方。^[3]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俄罗斯民众对走近西方还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民众态度的转变离不开俄罗斯政治经济环境的转变。

现实主义者会宣称，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联邦德国能走到一起，有赖于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苏联的存在。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推演，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并与俄罗斯展开更多合作。现实主义往往宣称国家在国家利益的选择上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国家利益是给定的，国家的首要利益是要确保生存最大化。不过，确保国家安全的选择却不止有一条道路。同样是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服务，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对德国的经济战略与冷战结束以后对俄罗斯的经济战略就大相径庭。世界政治在逐步演化，即便从现实主义政治经济的视角来审视，也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国家并非如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那样脆弱。米尔斯海默从大国都拥有进攻能力、也难以把握他国意图等特征推出了国家生存环境极端严峻。但是，现代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却不同于以往。国际关系史上，军事竞争跌宕起伏、异常残酷，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往往是生存与毁灭的竞争、灭国的竞争。公元 990 年，欧洲存在几千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到公元 1550 年，只剩下了 500 余个；到 1780 年还剩 100 个左右。^[4]因此，为了确保国家生存，国家在实施对外经济战略时往往无所不用其极。查尔斯·利普森宣称国家在安全领域难以实现合作是因为在安全领域，国家遭受背叛的代价太大。巨大的风险和代价让国家之间难以在安全领域实现合作。^[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国际关系的现实不像一个人处于自然状态时那样污秽、野蛮和短暂。一个重要原因是国

家不像自然状态的人那样脆弱。”^[6]在自然状态下，人很容易被他人伤害或者杀害，而在当代的世界政治中，国家却并非如此脆弱，对大国而言尤其如此。连肯尼思·沃尔兹也坦言：“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消亡率非常低。在 19 世纪下半期，仅有四个国家灭亡了，它们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帝汶。在竞争的经济体系中，很多企业倒闭破产，而在国际体系中，却罕见国家灭亡。”^[7]即便在安全领域，大国也并非像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那样脆弱。大国间在政治经济领域长期的互动不仅需要大国有能力报复对手的背叛行为，同时还要持有良善的、宽容的策略。^[8]因此，世界政治的变化促使我们要重新思考国家生存途径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

其次，大国的利益半径在扩大。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兴国家跻身大国俱乐部的成本和门槛更高；大国对世界政治发挥的影响更为显著；大国的权力投射在空间上得到极大的扩展。沃尔兹用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来比附国际体系。沃尔兹宣称，正如完全竞争条件下众多公司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的制定者；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一个超出自身控制的国际结构影响。但是，现代国际结构恰恰不同于微观经济学完全竞争的结构，而类似于寡头竞争的结构。各个寡头都可以是“价格制定者”（price maker），而不仅仅是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9]换句话来讲，大国的选择可以重塑世界政治；反过来，世界政治的大国也会受到自身行为的影响。由于大国的权力投射更广，以往和自身国家利益无关的安排，包括竞争对手的利益和地缘上遥不可及的国家的利益，现在都可能影响到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而影响自身的安全。

基于当代世界政治的这两个新特点，即大国并非高度脆弱；大国利益半径在扩大。因此，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探讨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时就需要关注竞争者的生存与基本利益，这是“关联利益”（complementary interests）。它既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强调的“绝对收益”，也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学者强调的“相对收益”。由

于大国高度卷入世界政治，被其压垮的国家的利益也很可能是它自己的利益。

本文试图指出，正是由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俄罗斯债务和援助问题上无所作为，加剧了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困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其国内政治困局，也使得俄罗斯民众和精英对西方国家的认知越来越负面，美国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这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即便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的国家利益也存在关联性。讨论国家利益的时候要超越“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传统限制。大国的对外经济战略需要关注与其他大国，包括竞争对手的“关联利益”。

二、背负债务负担的俄罗斯改革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俄罗斯政府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外汇储备枯竭、国内通货膨胀、社会陷入恐慌等。在 1991 年末的冬天，俄罗斯出现粮食短缺，俄国民众开始面临挨饿的危险。^[10]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领导人对于改革抱有很大的信心。俄罗斯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向民众许诺一切将会变好：大家会发现在近六个月的时间里，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不过，我们能迅速渡过难关。此后，物价会下跌，市场上将摆满商品。在 1992 年秋季的时候，俄罗斯的经济将会稳定下来。^[11]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俄罗斯人的确有理由保持乐观的心态。叶利钦是支持民主政治的力量，他积极支持市场化改革，和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叶利钦还提拔了一批年轻的、锐意进取的改革派进入政府。盖达尔等改革派具有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信仰，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和西方是一致的。他们还希望通过改革，让俄罗斯融入欧洲，转向市场经济，建立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他们认为俄罗斯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和苏联时期的经历仅仅是偏离了轨道，现在是回到正轨的时候了。不仅精英阶层持这样的想法，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俄罗斯民众也希望建立像西方那样的“正常的国家”。^[12] 俄罗斯开始积极寻求和西方国家合作，和美国与欧

洲保持良好的关系，和周边国家和平相处。

^[13] 西方的政策顾问被邀请到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政府部门都有西方顾问的身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为俄罗斯制定全面的经济改革计划，美国的军事专家协助俄罗斯销毁核武器。这与后来形成鲜明对照。到了 21 世纪初期，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美国的新闻界、学界、政界都在谈论：“谁失去了俄罗斯”？^[10]

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要从美国自身的对外经济战略上寻找根源。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国内面临高度的政治经济不稳定。即便在卢布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俄罗斯每年的资本外逃达到 200 亿美元，超过西方国家给俄罗斯提供的援助资金。此外，俄罗斯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在苏联解体以前，苏联就欠下了西方国家高达 600 亿到 850 亿美元的债务。^[14] 其中，欠美国的债务数额并不高，为 28 亿美元。^[10] 但是，此时美国的态度对西方各国的影响却十分重要。如果此时美国与西方国家一道对俄罗斯进行债务减免与经济援助，将有助于恢复俄罗斯国内与国际社会的信心，帮助俄罗斯政治经济走上正轨。此时的俄罗斯领导人认为，现在他们和西方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西方国家会为俄罗斯提供实质的帮助，乃至可以和二战结束后的马歇尔计划媲美。^[15] 在 1991 年秋季，美国国务院官员丹尼斯·罗斯就建议召开援助会议。罗斯指出：我们不能以纯粹的经济眼光看待俄罗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此时此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我们放任不管，或者对俄罗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支持，那么我们将蒙受重大损失。俄罗斯的改革对资金需求巨大，需要外界提供帮助。^[10] 不过，俄罗斯领导人和罗斯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

在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让人百思不得其解。1991 年到 1992 年间，西方社会对俄罗斯遭受的困难无所作为。此时的西方国家目光短浅，一门心思考虑如何让俄罗斯偿还苏联所欠的债务。^[16] 在苏联解体前夕，美国国务卿访问莫斯科，他告诉戈尔巴乔夫，只有偿还苏联的债务，西方才会提供援助。^[10] 1991 年 10 月，由于



苏联无法偿付西方债务，西方国家立刻做出反应，宣布西方国家将不再提供新的贷款，还会中断食品援助。这些举措把苏联经济推向崩溃之路。在1990年到1991年间，解体前夜的苏联接受了156亿美元的援助，而还债就用了131亿美元。因此除了还债，苏联的盈余所剩无几。^[14]在苏联解体之前，人们还可以理解西方国家对债务减免和援助的重重顾虑。但是到1991年末，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就让人费解了。当愿意和西方国家和解的俄罗斯政府需要轻装上阵时，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却让俄罗斯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负重前行。

三、虚幻的国际援助与改革的失败

1992年是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的第一年，也是稳定政治经济形势非常关键的一年。在1992年1月底，俄罗斯代表告诉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奈尔斯(Thomas Niles)：如果没有西方国家实实在在的援助，那么俄罗斯的改革只有50%的胜算。因此，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在明天就看到俄罗斯往好的方面转变，而不是拖到几年以后。^[10]到1992年2月，叶利钦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指出：如果俄罗斯改革失败了，那么美国和俄罗斯将可能重蹈军备竞赛和冷战的覆辙。在此次会议上，叶利钦希望获得更多的食品援助。为表示诚意，他甚至还提到可以把俄罗斯的高浓缩铀卖给美国。但叶利钦却受挫了，他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叶利钦抱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说得好听，但却对俄罗斯的请求无动于衷。^[17]

在美国国内，有一批政界和学界人士希望把握好这次历史机遇，加大对俄罗斯的援助。在1992年春，美国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以及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敦促布什政府为新生的俄罗斯政权和改革派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尼克松指出：西方对俄罗斯的援助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将会减少美国的国防开支，降低美国面临的核威胁和核武器扩散的风险，通过展开和平的商贸活动，美国可以获得俄罗斯丰富的资源，也可以为美国的商品开拓一个广阔的新兴市

场。^[18]哈佛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只有国际社会给予慷慨的和富有远见的帮助，俄罗斯才可能转变。即便每年提供150亿美元的援助，这也只是冷战时期军备开支的一个零头。如果能够确保冷战结束，这些花费只是和平红利的一小部分，是值得的。^[19]但是，美国政府却迟迟没有行动。相反，财政部副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还集中精力让俄罗斯偿还债务。^[10]外部援助的匮乏，沉重的债务负担让俄罗斯的改革步履维艰。

1991年11月，叶利钦任命叶戈尔·盖达尔为负责经济改革的副总理。1992年3月盖达尔出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在同年6月就任代总理。以盖达尔为代表的改革派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盖达尔看到，由于俄罗斯外汇储备枯竭，因此需要尽快获得外国援助以推动改革。他指出：如果两三个月后我们还如此被动，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的灾难，出现全面的崩溃乃至内战。^[20]经济改革面临巨大的阻力。政府内阁成员、俄罗斯杜马领导人以及盖达尔后来的继任者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等都对经济改革展开了攻击。年轻的盖达尔在政坛上刚崭露头角，因此他迫切需要西方支持为其改革提供国内的正当性，也让俄罗斯议会和总统能认可其改革方案。因此，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债务减免和援助对改革派非常重要。为了稳定卢布，俄罗斯的改革者希望西方政府能提供援助，为卢布的自由兑换提供卢布稳定基金。这在1990年的波兰曾经有过成功的尝试。由于俄罗斯经济体量大，萨克斯预计俄罗斯的改革需要比波兰等国更多的援助。因此，在1992年，俄罗斯共需要150亿到200亿美元。世界银行也进行了类似的估算，认为在1992年俄罗斯需要230亿美元来推行改革，而俄罗斯国内却无法负担。^[21]

在1992年4月，美国和德国宣布为俄罗斯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金额高达240亿美元，其中包括美国提供的20亿美元。但是美国的大部分援助是用于购买美国食品的拨款和信贷。可见美国许诺的援助主要不是为了稳定俄罗斯经济，而是为了销售美国食品，促进出口。尽管如此，这也让俄罗斯的改革

派兴奋不已。盖达尔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马上提供资金，帮助俄罗斯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通货膨胀、预算赤字等问题。

这笔许诺的援助帮助盖达尔等人渡过了暂时的难关。面对国内强大的反对声音，盖达尔表示：如果改革派被迫辞职，那么俄罗斯就难以获得这笔资金。俄罗斯的反党派做了妥协。在这一轮较量中，美国的口头许诺拯救了俄罗斯的改革者。萨克斯宣称：这笔援助是富国无穷无尽具有欺骗性声明中的一项，实际上这项声明根本没有给俄罗斯什么钱。大多数宣布的款项是按照市场利率发放的短期贷款，用于购买美国和欧洲的食品。有人把这笔援助和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但是马歇尔计划是无偿援助，而不是短期的贷款。^[19]

俄罗斯国内的形势瞬息万变，而国际援助和行动却非常缓慢。美国的资金迟迟没有到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也来晚了。到了1992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为俄罗斯提供第一笔10亿美元贷款时，盖达尔的宏观经济稳定计划已经流产。到1992年底，俄罗斯的通货膨胀高达2500%。^[22]当资金注入俄罗斯政府的账户时，盖达尔等改革派已经失势。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后，增加了对俄罗斯的援助金额，但是每年10亿美元的援助对一个庞大的、千疮百孔的俄罗斯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10]大多数援助是以商业贷款的形式发放，这和20世纪20年代德国获得的道威斯计划贷款并无二致，这些贷款没有减轻俄罗斯背负的巨额外债负担。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面临一次重要的机会，将以往的对手转变为合作伙伴。但是，美国和欧洲却坐失良机。事实上，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担心始终存在。有人指出俄罗斯曾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且早在共产主义政权建立之前，俄罗斯就是一个帝国。因此，西方不应该帮助这样一个国家。有一天它可能再度崛起并威胁西方利益。^[23]不少人还延续了冷战思维，指出美国不仅需要摧毁俄罗斯的核武器，还可以让俄罗斯陷入分裂。俄罗斯越弱对美国国家利益越有利。甚至有人还希望俄罗斯发生内部崩溃。^[10]萨克斯后来回忆道：到了1992年中期，设立卢布稳定

基金的方案没有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付诸实施。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及其副手正在起草“国防政策白皮书”，其主旨是要保持美国在长期内对所有对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美国决策层看来，俄罗斯注定不会成为欧盟的成员，更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19]支持俄罗斯的经济恢复和政治稳定被美国政府视为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在俄罗斯改革陷入困境之际，美国开始扩充其军事影响力。从1994年开始，克林顿政府启动了北约东扩。美国人认为他们在扩展自由，而俄罗斯人则认为美国军队将其权力渗透到了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俄罗斯的国际生存空间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此时的俄罗斯内外交困，为国内极端势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四、俄罗斯的困局与美国国家利益

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国际援助也姗姗来迟，俄罗斯的改革步履维艰。到了1994年，俄罗斯的GDP比1991年下降了40%。^[24]经济的全面下滑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工资、养老金、住房、幼托、医疗、假期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在199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0%的俄罗斯人能按时足额地领到工资；而有39%的人根本就领不到工资。^[2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只有1/10的人能获得最低养老金，而这点微薄的养老金也在最低生存线之下，有时甚至还不到最低生存线的一半，而且养老金也往往不及时发放，常常拖延3到9个月。^[26]在1992年到1993年间，至少有1/3的俄罗斯人属于贫困人口，这个数字是1991年的3倍。到1999年，仍有超过38%的俄罗斯人属于贫困人口。^[27]由于物资匮乏，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口开始自己种植土豆、洋葱、大蒜、黄瓜和西红柿。为了生存，不少俄罗斯人的生活退回到了前现代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28]俄国人的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18岁以下的俄罗斯青少年，有1/6被诊断患有慢性疾病。^[25]在90年代，俄罗斯的死亡率上升了30%，出生率下降了40%。俄罗斯人变得沮丧、愤世嫉俗，悲观失望、自杀率显著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自杀率增加了1/3，



自杀率高居世界第三。在1992年和1993年，自杀的人数占俄罗斯非正常死亡人数的1/3。^[25]因此，大部分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受到了显著影响。据调查：大约有60%的俄罗斯民众认为他们是这次转型的受害者。^[26]

随着改革的失败，俄罗斯国内的极端势力开始滋生。美国和欧洲失去推动俄罗斯改革，转变俄罗斯社会的关键机会。俄罗斯社会原本存在两类亲西方的群体，他们要么主张推进市场化改革，要么主张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到了1993年，这两类人群的数量大幅度下降，^[12]极端势力开始涌现。在1993年的新杜马选举中，持极端政治立场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获得了俄罗斯民众很大的支持。他公开宣扬激进的、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认为要推翻现有体制，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有人把他的风格比作当年纳粹时期的希特勒。^[10]新杜马选举后，俄罗斯的民主实验逐渐变得和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类似。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加剧了国内分裂。在1993年，俄罗斯杜马领导人和叶利钦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引发大规模的街头暴动。叶利钦调动军队炮轰议会大厦。据俄罗斯官方报道，在此次冲突中有150人死亡，600人受伤，而实际数字可能更高。^[24]不少西方的观察家觉察到：到了1994年春，法西斯主义滋生的前提条件已经在俄罗斯社会蔓延。^[29]自由派和温和派的团体逐渐失势，而强硬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避免国内的危机，强硬派敦促叶利钦在1994年12月袭击车臣武装。^[30]但是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反而让俄罗斯国内矛盾更加激化。

在1996年俄罗斯大选期间，不少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候选人涌现。根纳季·久加诺夫的竞选言论持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他许诺要削弱过去几年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久加诺夫还持有强烈的反美言论，批评叶利钦是美国的玩偶。他宣称如果自己上台，将会带领俄罗斯抵制美国的帝国主义。另一位候选人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的言行更让人感到他如果上台，将会颁布戒严令，实施军事化统治。^[10]在大选前的1996年1月，叶利钦的支持率跌至5%。俄罗斯国内的寡头集团

和西方国家开始动员起来挽救叶利钦。美国不得不通过援助等手段帮助叶利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积极向俄罗斯提供贷款，让人觉得西方国家罔顾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而只在乎政治。^[16]

在国内寡头和西方国家的积极支持下，叶利钦得以连任。但是连任后的叶利钦仍无法扭转俄罗斯的改革颓势。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俄罗斯经济急剧下滑。经济危机下的叶利钦频繁更换总理。到1999年8月，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俄罗斯总理。这是俄罗斯在17个月内的第五任总理。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加剧了政治困局。到了1998年，支持市场化的改革派已经销声匿迹。有观察家发现：在俄罗斯国内，已经很难再找到支持改革的人了。^[31]经济恶化和政治动荡动摇了以往俄罗斯人在改革初期对西方国家持有的正面共识。^[12]

很多俄罗斯人抱怨西方国家的援助不仅无助于俄罗斯经济的恢复，还损害了俄罗斯，试图控制俄罗斯经济命脉。关于西方国家的传言越来越多，不少俄罗斯人认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援助与商贸活动就是一场阴谋，目的在于剥夺俄罗斯的资源，让俄罗斯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这些传言被广泛地传播。^[13]在90年代末，俄罗斯国内还滋生了显著的反美情绪。反美情绪的滋长不仅源自俄罗斯的经济困难，也因为在1999年，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对前南斯拉夫展开了空袭。这让俄罗斯人对西方国家的憎恶与日俱增，即便是亲西方的俄罗斯人对西方国家罔顾俄罗斯意见，执意独行的行为也感到震惊。俄罗斯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2]到了90年代末，俄罗斯人的情绪和1991年时所持有的乐观情绪显著不同，乃至有人觉得这与当年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类似。^[10]不仅俄罗斯民众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俄罗斯领导人的言行也出现了变化。普京在早年曾公开宣称俄罗斯需要更密切地融入西方社会，他也会和西方国家持续合作。但是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普京反对西方的言论越来越多，这与之前形成鲜明的对比。^[13]

在对南联盟发动武装打击之后，美国政府又频频出手。进入新千年以后，美国政府

积极支持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家的颜色革命。2007年初，美国政府宣布，计划在波兰部署导弹防御拦截器，在捷克部署中程雷达。俄罗斯对此做出强烈反应，认为此举矛头指向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直至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达到高潮。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经济制裁。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支持率却创下新高。有美国学者宣称，美国自身要对乌克兰危机负责，美国和欧洲推动北约东扩，支持颜色革命，试图把乌克兰从俄罗斯防卫圈中解脱出来，融入西方怀抱。而俄罗斯则不会坐视重要邻国成为西方堡垒，因此诱发了此次危机。^[32]在2014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西方国家又再度把墙筑起来了。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俄罗斯，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其主要症结出在西方。

我们看到，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欧洲原本有机会赢得一个合作的俄罗斯。而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和利益则有着过度诉求，不仅要求俄罗斯偿还债务，也没有及时提供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东扩，对南联盟进行武装干涉，支持颜色革命等。对于俄罗斯的利益诉求，美国都没有积极地回应，还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这些举措恰恰在于忽视大国间利益的关联性，将俄罗斯越推越远。在给俄罗斯造成困难的同时，让自身面临更多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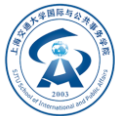
五、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德经济战略

冷战后美国对俄经济战略的失败与二战后美国对联邦德国的经济战略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美国协助联邦德国重建的历程有过波折，乃至可能引发和后来对俄战略同样的后果。

在1944年夏，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了一项计划，历史上称为“摩根索计划”。该计划旨在削弱和控制德国，把德国变成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此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比较倾向于摩根索削弱和压制德国的意见。罗斯福相信德国人天生

就具有进攻性，这样的天性难以根除。因此，他不相信一个多边的贸易秩序可以改变德国。对罗斯福而言，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并和苏联一道携手对德国采取强硬立场。^[33]如果按照这一思路来执行美国的对德经济战略，美国得到的就不是一个战略伙伴，而是和自己分歧越来越大的对手。面对削弱和压制德国的意见，美国国内外都有不同的声音。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就试图劝说罗斯福放弃该计划。史汀生指出：强制的贫困是更糟糕的结果，它不仅摧毁了受害者的精神，还贬低了胜利者。1945年1月，英国人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指出摩根索计划不符合国家安全。因为一个混乱、饥饿和破产的德国不符合占领军的利益。英国人看来：摩根索计划不仅无助于国家安全的实现，反而是国家安全的威胁。^[34]战后的欧洲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1946年到1947年的寒冷冬天更加剧了困境。整个欧洲的困境与德国的困境紧密相连。自1890年以后，西欧国家资本输入的最主要来源是德国，而且德国也是欧洲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因此，战后德国贸易停滞成为当时欧洲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35]要恢复战后欧洲的经济秩序，离不开帮助往日的竞争对手德国。

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命名的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实施了大规模的援助，因此称为“欧洲复兴计划”。这项计划不仅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欧洲受益，也为战后美国经济的成长做出了贡献。它通过大规模援助把美国利益和欧洲以及战败德国的利益绑定到了一起。1947年6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马歇尔指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欧洲将陷入致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困境。这将会对世界和平与政治稳定构成负面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因此，美国需要担负起责任，帮助世界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项任务旨在消除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33]马歇尔援助欧洲的思路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逐渐融合为一体。1948年1月，马歇尔在美国国会发表证词指出，欧洲复兴计划会影响未来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民族的福祉。我们做这件事既是为我们国家利益服务，也是为世界服务，帮助他



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一个自由和繁荣的欧洲是一致的。马歇尔的看法表明了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战略思路的调整，注意到大国间利益的关联性。美国作为战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要实现其国家利益，就要关照其他大国的利益。实施马歇尔计划后，很多工业的订单集中在重工业产品，比如机械、卡车、拖拉机、电子设备。这些产业在二战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战后的需求则不足。如果没有外部市场，这些产业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此外，马歇尔计划还为美国过剩的谷物、水果和棉花寻找海外销路，这可能比在美国国内实施救济更为有效。^[36]在 1948 年 4 月到 1951 年 12 月，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 130 亿美元的援助，按 2011 年的价格计算，相当于 1000 多亿美元，占当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有 2/3 的援助流入了 4 个国家：英国接受了 24% 的援助；法国接受了 20%；联邦德国接受了 10%；意大利接受了 11%。援助不仅包括战胜国，还涵盖了战败国；不仅包括了美国的盟友，也包括了昔日的竞争对手。

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也渡过了最不稳定的时期。美国也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按计划，欧洲超过 2/3 的进口源自美国，这意味着美国公司获得了利润和机会。此外，马歇尔计划的政治成就可能大于经济上的成就，这项计划更好地实现了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让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欧洲的民主国家站稳了脚跟，美国也赢得了可靠的盟友。二战结束后，美国能用更宽广的视野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美国二战后处理战败德国的经济战略和一战后处理德国问题的经济战略形成鲜明对比。一战结束以后，战胜的协约国集团在战争期间已欠下美国 100 多亿美元的债务。要是美国能放弃这笔债务的话，那将大大有利于解决德国战争赔款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取消债务。美国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在 1918 年 11 月宣布：所有的战争债务都需要全额偿还。^[37]由于美国在债务问题上的坚持，致使欧洲战胜国在德国赔款问题上

实施过度榨取的政策，引发了一战后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持续动荡。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德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沉重的赔款负担让魏玛政府开动印钞机。德国马克变得一文不值，大人们将钞票捆起来生火或者糊墙，小孩则拿来当积木。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德国又开始经历严重的失业。1929 年，德国的失业人数为 130 万人，在 1930 年纳粹党崛起的时候，失业人数大致是 300 万；仅仅一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 435 万；到了 1932 年，它又上升到 510 万；1933 年上升到 600 万。^[38]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动荡，为德国极端政治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条件。纳粹党在 1928 年的大选中仅获得了 12 个国会议席。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在 1930 年的国会选举中，纳粹赢得了 640 万张选票，由国会中位居第九的最小党变成了德国的第二大党。在 1932 年 7 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 1370 万张选票，取代了社会民主党而成为德国的第一大党。^[39]尽管在 1932 年，美国政府在洛桑会议上把债务一笔勾销，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这个历程花了 13 年，这是各方相互猜忌和怨恨不断增长的 13 年。赔款使得战争激情历久不衰。”^[40]一战后美国政府对战争赔款问题的坚持，最终无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反而把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伤亡人员总计为 100 余万人，其中死亡人数为 40 余万人。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夸张地形容道，“德国欠下的所有战争债务，只需要美国人掏出五美分就偿还了。”^[41]而正是因为这“五美分”的战争债务，美国需要吞下自己酿下的苦果。而美国在冷战后，其对外经济战略又重蹈一战后的覆辙，在追求国家安全最大化的同时，罔顾大国间关联利益，失去了化敌为友的机会。

六、结语

本文主要关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战略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联邦德国实施的经济战略导致的不同后果。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俄罗斯转型问题上持消极态度，既没有减免俄罗斯背负的巨额债务，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不仅

如此，美国还推动北约东扩，武装干预南联盟事务、支持颜色革命等。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其国内政治困局，也使得俄罗斯民众和精英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认知越来越负面。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忽视大国间存在的关联利益，过度追求国家利益与安全，从而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与此不同的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为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欧洲重建提供援助，联邦德国和欧洲的复兴抑制了德国国内的极端政治势力，稳固了联邦德国的新生政权，重建了战后国际秩序。在关照竞争对手关联利益的同时，美国也实现了自身的利益。美国实施不同的对外经济战略导致了不同的后果，这需要我们反思：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下，国家即便根据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原则制定对外经济战略，也需要做出一些修订。

首先，由于现代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脆弱性降低，对外经济战略不宜固执于做“最坏的打算”。在很长一段时期，国家的生存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确保国家生存，国家在制定对外经济战略时可能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经过长期的国际竞争留存下来的国家，尽管仍需要把国家生存摆在首位，但是此时却不宜在制定对外经济战略时做“最坏的打算”。关照其他国家的利益不仅不会加剧自身的脆弱性，反而更能服务于自身的国家利益。米尔斯海默指出的大国需要靠争夺地区霸权来赢得安全，坚守这样的逻辑将会面临巨大的危机。不少大国在崛起过程中，试图取得地区乃至世界霸权。但是，它们最终得到的不是霸权，而是诸大国的结盟以制衡其争霸行为，最终乃至被他国军事占领。拿破仑的过度扩张导致了法国战败和帝国的坍塌；德国的争霸导致德国陷入长期分裂并被外国军事占领。坚守现实主义政治经济的逻辑并非总能现实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用极端现实主义的思路制定对俄罗斯的经济战略，与一战结束以后美国推行的对外经济战略十分类似。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把国家生存和国家利益的逻辑推到极致，不仅无益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反而损害了国家利益。

其次，由于利益半径在扩大，大国需要更加关注“关联利益”。当代的国际关系并非类似于“完全竞争”的结构，而更类似于“寡头竞争”的结构。因此，大国既在改写国际结构，也深受自身改写的国际结构的影响，这个影响包括负面影响。大国在制定对外经济战略时，不仅要关注自身的利益，乃至还要关注竞争对手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恰恰可能是相互关联的。一战后的美国忽视其他协约国利益，固执于获得战争债务的对外经济战略最终无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反而把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战略重复了一战后的错误，忽视俄罗斯国内改革的困难，不仅坚持索要债务，也没能及时给俄罗斯的改革与转型提供援助。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援助了包括往日对手德国在内的欧洲，不仅为欧洲赢得了持续的和平，也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回报，并使得二战后美国在世界政治上的领导权有了更为稳固的政治基础。

不仅大国之间存在关联利益，对地缘上的边缘小国，国家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联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没有兑现对外援助达到国民生产总值0.7%的承诺，美国自身也受到了牵连。萨克斯指出：“无论恐怖主义者是富人、穷人还是中产阶级，如果他们成长的社会是由贫穷、失业、快速的人口增长、饥饿以及缺乏希望所包围，恐怖主义就有滋生的温床。不解决这些不稳定的根源，就不能消除恐怖主义。”有些小国没有被纳入繁荣的世界，而在世界经济中被边缘化，逐渐丧失了希望。萨克斯抱怨：很多美国人看不清对外经济援助和他们的国防安全有什么关系，他们把更多资源投入到军事力量上。在2004年，美国的军事开支是对外援助的30多倍。不过，“经过了几十年，英国政府仍然镇压不了北爱尔兰的共和军；强大的以色列军队仍然无法解决巴勒斯坦人的暴动；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军队也没能镇压住阿富汗的游击队员。”^[19]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陷入困境，频繁发生内战与恐怖主义，反过来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困境又让美国安全受到损害。贫困世界危机重重，通过传染病、恐怖主义和毒品等方式殃及包括美国在



内的发达国家。富裕国家的民众会因全球最底层的十亿人身处混乱而丧命。因此，由于对大国而言，其利益半径的扩大使得其关联利益变得更为广泛。国外的极端贫困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存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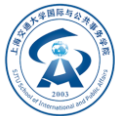
因此，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探讨国家

安全与国家利益时需要关注竞争者的生存与基本利益，被压垮的国家的利益恰恰可能就是它自己的利益。由于当代大国的利益半径扩大，世界政治中竞争对手乃至在地缘上属于边缘小国的利益，最终可能影响这些大国的利益。

*黄琪轩：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 [1] (美) 约翰·伊肯伯里. 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
- [2] Craig Parsons. Showing Ideas as Causes: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1, 2002, p.47-84.
- [3] Ted Hopf. Common-sense Constructivism and Hegemony in World Politics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7, No.2, 2013, pp.317-354.
- [4] Michael Ma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M].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88, p.153.
- [5] Charles Lips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J]. World Politics, Vol.37, No.1, 1984, pp.1-23.
- [6]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J].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1978, p.172.
- [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p.137-138.
- [8]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169-190.
- [9] Jonathan Kirshner. Appeasing Bankers: Financial Caution on the Road to War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
- [10] James Goldgeier and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60; pp.1-2; p.71; p.76; p.69; p.78; pp.10-11; p.5; p.132; p.145; p.1.
- [11] Ronald Suny. 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 [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90.
- [12] Marlene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29-30, p.15; p.15; p.15; pp.31-33.
- [13] John Thompso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from the Kievan State to the Present [M]. Westview Press, 2009, p.337; pp.344-360; p.381.
- [14] Jim Leitzel. Russian Economic Reform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133; pp.136-137; p.169.
- [15] Christian Thorun. Explaining Change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ole of Ideas in post-Soviet Russia's Conduct towards the West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40.
- [16] Anders Aslund. Russia's Capitalist Revolution: Why Market Reform Succeeded and Democracy Failed [M].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p.297; p.298.
- [17] Gennady Burbulis. Come, Make Goods and Sell Them [N].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2, 1992, p.A21.
- [18] Marvin Kalb. The Nixon Memo: Political Respectability, Russia, and the Pres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130, 133-34.

- [19] Jeffery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y of Our Times* [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5, p.133; p.141; pp.139-140; pp.210-215; pp.309-328.
- [20] Yegor Gaidar. *Days of Defeat and Victory* [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p.114.
- [21] World Bank. *Russian Economic Reform: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Structural Change* [R]. Washington: World Bank, 1992, p.49.
- [22] Padma Desai. *Conversations on Russia: Reform from Yeltsin to Puti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7.
- [23] Zbigniew Brezinski. *A Premature Partnership* [J].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2, 1994, pp.67-82.
- [24] Michael Kort. *A Brief History of Russia* [M]. New York: Checkmark Books, 2008, p.236; p.234.
- [25] Allen Lynch. *How Russia Is Not Ruled: Reflections on Rus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91; p.99; p.106.
- [26] Stephen Lovell. *Destination in Doubt: Russia since 1989* [M]. New York: Zed Books, 2006, p.114; p.114.
- [27] Bertram Silverman and Murray Yanowitch. *New Rich, New Poor, New Russia: Winners and Losers on the Russian Road to Capitalism* [M]. Armonk: N.E. Sharp, 2000, pp.17-18.
- [28] Harley Balzer. *Russia's Missing Middle Class* [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p.177.
- [29] Charles Fairbanks.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J].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5, 1994, p.41.
- [30] John Dunlop. *Russia Confronts Chechnya: Roots of a Separatist Conflict*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64-200.
- [31] Janine Wedel. *Collision and Collusion*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102.
- [32] John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J]. *Foreign Affairs*, Vol.93, No.5, 2014, pp.77-89.
- [33] Carolyn Eisenberg. *Drawing the Line: The American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6; p.322.
- [34] James Van Hook. *Rebuilding Germany: The Creation of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9; p.32.
- [35] Alan Mil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4, p.10.
- [36] Robert Wood. *From Marshall Plan to Debt Crisi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36.
- [37] Alan Dobs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47-48.
- [38] (美) 克劳斯·费舍尔. *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254.
- [39] Conan Fischer. *Europe betwee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M].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1, p.215.
- [40] (英) A·J·P·泰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39.
- [41] William McNeil. *Weimar Germany and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Jack Snyder and Robert Jervis, eds., *Coping with Complex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193.



台湾地区民主巩固中的政治支持： 基于 TEDS 与 ABS 的分析*

吴维旭*

摘要：台湾地区“3.18 学运”显现部分民众对目前代议民主体制治理品质的不满。本文运用“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研究”（TEDS）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数据，在民主体制、权威机关两个层面探讨台湾民众政治支持的分布与影响因素。发现台湾民众对民主体制的坚定支持与民主运作满意度并不是很高，民众对权威机关的负面评价会侵蚀民众对民主体制的支持。2012 年后“民主批评”与“民主离异”群体比例上升，学运可视为民众对“民主赤字”扩大的“行动”反应。其中，“民主批评”群体会对行政当局的政策产出带来优化动力，但台湾朝野政治精英如何强化权威机关的治理表现是长期且关键的问题。

关键词：民主巩固 政治支持 民主满意度 民主批评者

一、问题的提出

2014 年 3 月 17 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审查《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委员会会议爆发激烈的朝野争斗。18 日，持“反服贸”立场的高校学生占领立法机构，进而拉开自“野百合学运”后台湾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占领行动前后持续 24 天，严重瘫痪台湾立法系统，期间发生学生占领“行政院”、3.24 驱离冲突、3.30 凯道游行、4.10 学生退场等诸多事件。

不可否认，全球化背景下大陆崛起所引发的岛内部分民众的集体焦虑以及国家认同/族群政治的分裂是本次学运所显现出的重要问题，而本次学运表现出的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面向则是，部分民众在学运中通过“非法”的行为方式表达对台湾当局代议民主体制治理品质的不满。学运期间，长于民主化研究并主持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计划的学者朱云汉撰文表示学生占领“立法院”是试图中断“代议民主政体”，并指出“如果民主大厦的根基本来就不牢固，很有可能在众人尚未惊觉的情况下，被社会中少数但激进的群体一推而倒”。

针对“318 学运”中部分民众所表现出对代议民主制权威机关的“行动主义”立场，本文试图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分析这种不满情绪、行动立场背后台湾民众对民主体制及运作、执政当局（含权威机关与政治人物）

的政治支持或信任问题。因此，本文欲对下列问题予以初步探讨：台湾民众对民主体制、各权威机关政治支持或信任的分布与变化趋势为何？与此相关的是，持不同民主态度群体具有哪些社会特质，即群众基础的特征为何？

本文以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研究”（TEDS）历年民调以及台湾大学东亚民主研究中心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台湾地区）三波民调为主要资料来源，基于这些调查中问卷题目设计的延续性，本研究将对相关问题进行时间序列上的比较分析，而在各民主态度群体特质的考察方面会侧重于使用 2013 年的“截面”数据资料。

二、政治支持与民主巩固

民主的重要面向是在于政治制度的确立与体制运作应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若民众对政治权威失去支持或信任，则可通过选举的方式更换之。但当民众对政治体系失去支持或信任时，则可能导致政治系统的崩解。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与政治支持概念密切联系，政治信任一般被认为是体现民众政治支持的重要指标，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政治稳定具有相当程度的增进作用。由于民主本身是难以精确的概念，且民众对民主应然面与实然运作的认知也会存在差异，其在政治支持或信任研究领域的表现之一，

便是对作为政治支持对象客体 (objects) “政治体系”的区隔分层。学者 Easton 将民众政治支持的对象划分为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政体 (regime)、执政当局 (authority) 三个层面。其中, “政体”支持包括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价值原则、程序与体制运作的认可 (如民主价值观、民主支持度等), 这属于广泛政治支持范畴, 多由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形塑; “执政当局”支持主要以权威机关 (含特定机关评价、现任官员满意度等) 为对象, 其属于特定政治支持范畴, 多随民众对各权威机关的治理绩效评定起伏。Easton 指出政治支持若持续低落, 会损害民众对权威机关的政治信任, 甚至会动摇对政体的信任, 而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本文所要分析的政治支持或信任的对象主要是在政体与执政当局两个层面。

学者 Linz 与 Stepan 认为民主巩固可指涉为“民主游戏规则被精英与大众认知为唯一存在的机制”, 并将绝大多数民众即使面对重大经济问题或不满现任领导人时, 仍坚信民主制度是治理的最适当方式, 并将其作为判断态度层次上是否民主巩固的标准。既有的相关研究指出良好的民主治理绩效有利于民主体制的巩固。由于缺乏深厚的民主政治文化传统, 第三波民主化地区权威机关的绩效表现与民主政体的合法性高度相关。长期令人失望的政绩势必使执政当局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与信任, 进而可能会动摇民众对民主体制的信心。一旦大众丧失对权威机关的支持, 并存有高度的政治不信任感, 则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可能会超出一般的选举投票、合法集会的范畴, 而非法的抗议示威、不服从运动发生几率会增加, 可能这会使新兴民主社会陷入失序状态, 导致民主崩溃危机。

自 1970 年代开始, 欧美民主国家普遍出现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政府与政治人物信任度、投票参与程度等态度、行为比例大幅降低的现象。部分西方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作“民主的危机”, 并从微观个体价值观念与宏观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上对这种现象作出理论解释与实证验证, 即日益富裕的公民逐渐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转变, 他们不再那么遵从权威, 并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反抗行动来挑战政府, 成为“批判性公民” (critical citizens)。

也有学者提出“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 概念来描述公民对民主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指出“批判性公民”群体对政党政治、内阁政府与议会等代议民主机制倾向持怀疑态度, 但同时却又对民主理念、价值与原则有情感支持。这些“批判性公民”群体对民主运作的不满评价, 并未涉及到“政治社群”、“政体形式”层级, 而多针对执政当局的层次。有学者认为此类民众并不会对民主体制带来合法性危机, 而会成为民主政府效率与施政表现优化的动力。

就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而言, 2008 年大选实现了二次政党轮替, 象征台湾已走向民主巩固阶段, 但台湾的民主巩固却面临着自身的诸多困境, 朝野政治精英的严重对立、民众对政局与经济状况的不满、“台独”因素引发两岸关系间歇性的紧张等, 都使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充满不确定性。作为新兴民主化地区, 台湾的民主巩固亦需要社会民众确立民主的规范与价值, 对民主制度应保持较高的政治信任。

2012 年马英九再次连任, 但岛内经济不景气与部分政策失误或争议 (如美牛、油电双涨、服贸等) 使台湾社会普遍存在不满马当局氛围。因此需要明晰的是, 当前台湾民众的政治不支持、不信任是集中于执政当局, 还是对民主体制亦是如此? 若存在“批判性公民”群体, 其分布与特质如何? 这些问题可视为是第一部分所提问题的进一步延伸。

三、台湾民众政治支持的分布与趋势

在考察台湾民众对民主政体的支持方面, TEDS 与 ABS 系列民调均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测量题目。由表 1 可知, 2000 年后随着民主运作经验的积累, 台湾民众逐渐形成对民主制度态度的固定认知。认为民主是最好制度的比例均超过 40%, 但台湾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支持态度并不稳定, 呈现上下起伏, 2012 至 2013 年的下降幅度较大, 这与传统西方民主社会中呈现稳定分布的民主支持度有所不同。此外, 认为“独裁政治比民主政治好”与

“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一样”的比例基本分别超过 20%，且在 2013 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合计达 48.1%，超过民主体制的支持者比例。

表明部分台湾民众对支持民主政治有犹豫态度，台湾民主的支持比例偏低，而这是否与台湾已进入民主巩固的判断相矛盾？

表 1 台湾民众对民主制度（或政体原则）的支持程度（2001-2013）

下列三个说法中，请问您比较同意哪一种？（%）	2001	2003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3
不管什么情况下，民主政治都是最好的政体	42.8	44.1	55.4	47.5	44.4	50.8	52.2	44.9
在有些情况下，独裁政治比民主政治好	24.2	23.1	17.9	20.6	21.7	24.4	21.8	25.5
对我而言，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是一样	23.4	25.3	17.8	25.1	23.8	20.6	20.2	22.6
不知道、看情况、拒答等其他选项	9.6	7.5	8.9	6.7	10.1	4.1	6.1	7.2
样本数	1415	1674	1823	1587	1905	1592	1826	2292

资料来源：ABS2001、TEDS2003、TEDS2004P、ABS2006、TEDS2008P、ABS2010、TEDS2012、TEDS2013。

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计划问卷中，也有三个问题用于测量民众的民主政体意向，分别是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以三种具体的非民主的方式取代现有的民主选举与治理模式，这三种非民主的方式分别为个人专制统治（personal dictatorship）、军人专制统治（military dictatorship）与单一政党威权统治（single-party dictatorship）。由表 2 结果看，自 2000 年以来，台

湾民众非常反对现有的民主选举的制度与设计为任何非民主的制度所取代，且反对意向（即“不同意”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表明，相较于表 1 所列问题，在有明确反民主体制选项的刺激下，台湾民众民主意向的表达非常明确，表明台湾社会与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态，已基本具备 Linz 与 Stephen 所提倡的民主巩固特征。

表 2 台湾民众对反民主体制问题的态度（2001-2010）

%	选项	2001	2006	2010
应该废除议会和选举，由一个强力领袖来决定	同意	13.7	16.8	15.1
	不同意	73.8	76.1	78.4
只允许一个政党选举与执政	同意	14.7	11.2	9.4
	不同意	83.0	82.9	87.0
应该由军队来进行统治	同意	6.3	6.2	4.2
	不同意	83.9	88.2	92.7
样本数		1415	1587	1592

资料来源：ABS2001、ABS2006、ABS2010。

与上述针对民主体制的态度密切联系的是台湾民众对民主运作的满意度测量。由表 3，若将“非常满意”与“还算满意”合并，则可发现表示对台湾民主运作满意的民众比例在 2004 年至 2008 年是一个低位期（不超过五成的满意程度），这也与陈水扁第二任期民主治理绩效差有明显的关系。另一较为明显的是 2012 年至 2013 年民主满意度的快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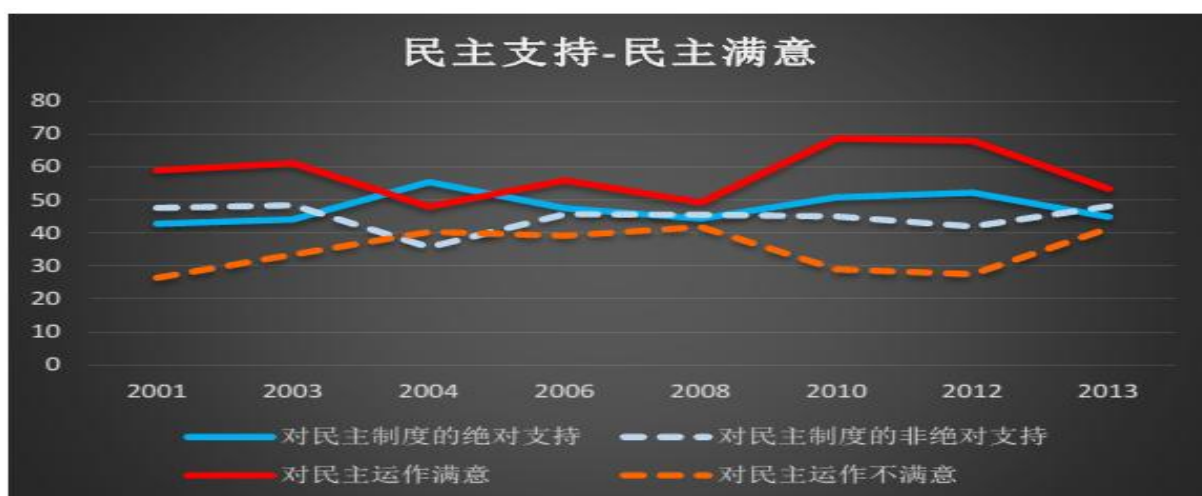
下降至 53.4%，表示不满意民众比例接近 2008 年水平。有关影响台湾民众民主满意与民主支持因素的分析将在第五节论述。若将历年民主支持度与民主满意度作图（见图 1），则可发现 2008 至 2013 年间台湾民众针对民主的两项台独变化趋势比较一致，这也显现出 2008 年后台湾执政当局的民主运作绩效对体制支持度的直接影响。

表 3 台湾民众的民主运作满意度评价（2001-2013）

整体来说，请问您对台湾民主政治实行的情况，是非常满意、还算满意、不太满意、还是非常不满意？（%）	2001	2003	2004	2008	2010	2012	2013
非常满意	3.2	4.6	5.3	4.9	7.7	5.3	3.9
还算满意	55.8	56.5	42.7	44.3	60.9	62.6	49.5
合并“满意”	59	61.1	48	49.2	68.6	67.9	53.4
不太满意	22.9	31.3	34.2	35.9	26.2	23.9	34.5
非常不满意	3.6	2.2	6.1	5.9	2.8	3.6	6.9
合并“不满意”	26.5	33.5	40.3	41.8	29	27.5	41.4
样本数	1,415	1,674	1,823	1905	1592	1826	2292

资料来源：ABS2001、TEDS2003、TEDS2004P、TEDS2008P、ABS2010、TEDS2012、TEDS2013。

图 1 民主支持度与民主满意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ABS2001、TEDS2003、TEDS2004P、TEDS2008P、ABS2010、TEDS2012、TEDS2013。

四、台湾民众对权威机关信任评价的分布与变迁

Warren 指出对机构信任指涉民众预期的机构功能履行的程度，亦即政府权威机关表现与民众期望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信任度越高意味着权威机关的表现越符合民众的期望，政治组织或政治机关的效能受到民众的肯定。权威机关的政策输出对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定极为重要，只有令民众满意的表现，权威机关才能得到大众的支持与信任，从而强化这些权威机关在政治体系中的合法性。本文选取“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台湾地区问卷中有关行政、立法、司法等部门的表现作为民众评价权威机关的指标。

由表 4，可以发现台湾民众对权威机关（除去“地方政府”与“公务员”两项）表现的评价并不高，信任度皆低于五成，明显

可见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都未能达到民众语气的施政表现或效能，对政治权威机关抱持低信任度可能影响民众对民主体制的信心。具体来看，对“总统”、“行政院”的信任程度至少在 2010 年前维持在 30% 左右。法院的信任度降至三成。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立法院”的信任程度一直未超过 20%，表明多数民众对“立法院”的表现感到失望，而在表 2 中也有约两成多的民众并未反对“废除议会和选举”。政党（未说明是哪个政党）的信任程度最低，基本在 15% 左右，表明台湾民众对长期的蓝绿政党恶斗非常不满，而政党是台湾地区最高民意机关的主要行动者，在以代议政治为主要运作方式的现代民主政体中，一旦民众对反映民意、监督其他权威机关的民意代表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这必然会对民主政治的良性运作带来威胁，这也为“3.18 学运”中众多民众支持学生的占领行为提供了比较充足的民意基础。

表 4 台湾民众对权威机关、政党、媒体的信任程度

%		2001	2006	2010
最高领导人		39.4*	29.0**	34.3
“立法院”		18.3	19.4	19.1
“行政院”		39.4*	34.6	32.6
地方政府		48.4	52.2	50.4
法院		41.2	30.6	29.7
政党		15.8	15.4	14.1
公务员***		52.4	52.7	48.3
媒体	报纸	32.2	24.9	22.0
	电视	41.2	29.4	26.6

说明：*ABS2001 中问题是针对“national government”，本文界定为行政当局，其中包括“总统”与“行政院长”，在 2006 与 2010 年调查中专设针对“总统”信任度的问题；信任百分比包括“非常信任”与“比较信任”；

**2001 年的调查问题是问“对‘行政院长’或‘总统’的信任”；

***该问题是针对“civil service”，本文界定为公务员；

资料来源：ABS2001、TEDS2003、ABS2006、ABS2010。

民众对地方政府与公务员的信任度均维持在五成左右，相较于“中央”层级，台湾民众更为信任基层权威机关。对两种媒体的信任程度持续走低，降至 3 成以下，这表明媒体作为监督政府或社会公义的一种力量，

其表现未能获得多数民众肯定。由表 5 可看到机构信任度之间存在显着相关性，同时这样的相关性是正向关系，即对一机构有高的信任感也会对其他机构具有较高的信任感。

表 5 台湾民众对权威机关、政党、媒体信任度的相关性分析

	总统	立法院	行政院	地方政府	法院	政党	公务员	报纸	电视
最高领导人	1	---	---	---	---	---	---	---	---
“立法院”	0.435**	1	---	---	---	---	---	---	---
“行政院”	0.383**	0.472**	1	---	---	---	---	---	---
地方政府	0.565**	0.531**	0.468**	1	---	---	---	---	---
法院	0.364**	0.365**	0.490**	0.364**	1	---	---	---	---
政党	0.285**	0.271**	0.269**	0.328**	0.246**	1	---	---	---
公务员	0.278**	0.314**	0.359**	0.365**	0.315**	0.414**	1	---	---
报纸	0.161**	0.274**	0.311**	0.242**	0.251**	0.187**	0.236**	1	---
电视	0.188**	0.219**	0.288**	0.205**	0.266**	0.215**	0.244**	0.580**	1

资料来源：ABS2010

说明：*： $P < 0.1$ ；**：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定）

此外，另有一组题目是分别询问民众对政府官员的可信度（做事是不是大多数正确、在媒体上发言是否可信）、操守（是否会浪费民众税金）以及制定政策与规划（制定政策时是否会考虑民众福利）等面向的评价。题目本身指涉的对象是“政府官员”，与前述 Easton 政治支持中的现任执政官员层次比较接近。

在历经多次全面选举以及媒体提供多元资讯的同时，台湾地区民众对政府整体的信任感出现相当的波动。从表 6 中各种政治信任面向的整体分布趋势可发现，自 2001 年至今民众对政府（首长与官员）的信任评价一直不高，同意政府所做事情大部分正确的比

例维持在 25% 以下，由于陈水扁时期糟糕的治理绩效以及贪腐案等因素，该项信任值在 2008 年达到一个低点（14.4%），在 2012 年升至高点（23.2%），但在 2013 年快速下降至 14%，即认为政府所做事项不正确的比例接近八成。认为官员浪费税金的比例在 2008 年达到第一个高点（79%），在 2013 年迅速升至 82.7%。认为政府决策会优先考虑民众福利的比例在 2013 年快速跌至 38.2%，而不相信政府首长在媒体上表态内容的比例在 2013 年急剧上升至 66.9%。整体来看，台湾民众对马政府（首长与官员）的政治信任在 2012 年选举后有一个明显的急速下滑。

表 6 台湾民众政治信任感的分布—以执政当局为对象（2001-2013）

%	选项	2001	2004	2008	2012	2013
政府所做的事情大部分是正确的	同意	21.0	18.0	14.4	23.2	14.0
	不同意	60.7	67.1	71.5	65.6	79.8
政府官员时常浪费老百姓所缴纳的税金	同意	66.7	68.0	79.0	74.3	82.7
	不同意	17.4	17.2	10.3	16.0	11.8
政府决定重大政策时，会不会把民众的福利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	会考虑	49.1	46.1	46.8	52.1	38.2
	不考虑	36.1	40.9	43.3	39.4	56.2
您相不相信政府首长在电视或报纸上所说的话？	相信	39.5	33.7	30.4	42.5	37.9
	不相信	46.6	54.3	59.3	47.8	66.9
样本数		2022	1258	1905	1826	2292

资料来源：TEDS2001、TEDS2004L、TEDS2008P、TEDS2012、TEDS2013；

说明：表中所列选项经过合并，其中并未列出“看情况”、“很难说”、“其他无反应”等选项。将原选项中的“非常同意”、“同意”合并为“同意”，将“经常会考虑”、“有时会考虑”合并为“会考虑”，将“很相信”、“还可相信”合并为“相信”。

五、不同民主态度的群众基础

本文用“民主支持（度）”指涉民众对民主体制的欲求与信奉程度，并区分为“绝对支持”与“不完全支持”两类，前者强调对民主的无条件支持，后者强调对民主的优先支持或反对。本文用“民主满意（度）”指涉民众对现行民主制度运作的评价，区分为“满意”与“不满意”两类，民众对民主治理绩效的正面评价会增进民主体制的稳定与合法性。由此，延续部分台湾学者对民主态度的划分，民主态度可被区分为“民主满意者”、“民主批评者”、“民主顺从者”、“民主离异者”四类。“民主满意者”表示支持民主理念与体制，也满意台湾民主的实质运作；“民主顺从者”表示无法保持对民主理念与体制的绝对支持，但对台湾的民主运作表示满意；“民主离异者”表示民众不但缺乏对民主体制的绝对支持，同时也对台湾当下民主体制的运作持负面评价；“民主批评者”表示绝对支持民主价值与体制，但对

台湾民主运作现状不满。其中，“民主批评者”的界定类似于 Norris 所提出的“批判性公民”。

根据上述对民主态度的划分，在 TEDS 民调测量“民主支持”题目中，将选择“不管什么情况下，民主政治都是最好的政体”的样本设定为“绝对支持”，将选择“在有些情况下，独裁政治比民主政治好”与“对我而言，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是一样”合并为“不完全支持”，将“不知道”、“拒答”等设为遗漏值；在测量“民主满意”题目（即“整体来说，请问您对台湾民主政治实行的情况”）中，将“非常满意”、“还算满意”选项合并为“满意”，将“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合并为“不满意”，无反应设为遗漏值。

由表 7 可见台湾 2013 年受调查民众的民主态度划分交叉列联表。按照此划分方法依次处理 2008、2010、2012 年民调资料中的相关题目，可得到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以来民众民主态度的大致趋势。（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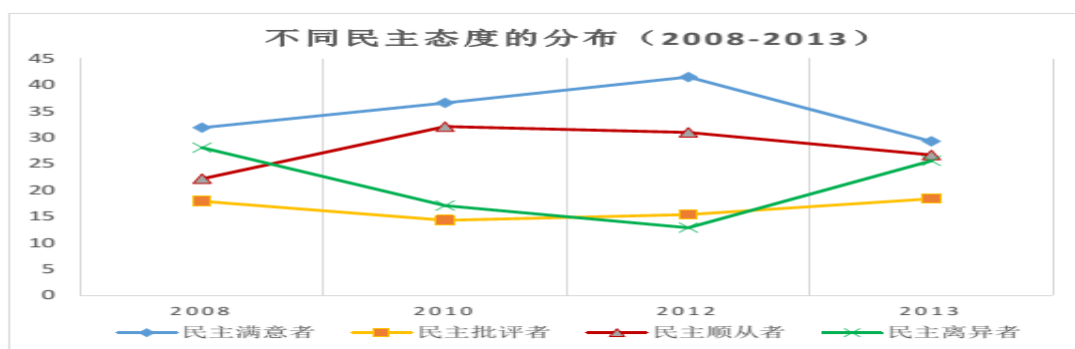
表 7 不同类型的民主态度（交叉列表）

		民主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民主支持	绝对支持	民主满意者； n=613 29.3%	民主批评者； n=385 18.4%
	不完全支持	民主顺从者； n=559 26.7%	民主离异者； n=537 25.6%
N=2094 (2292) *			

*选项合并后样本有效百分比为91.4% (2094/2292)；

资料来源：TEDS2013。

图 2 台湾民众的（分类）民主态度分布（2008-2013）



%	TEDS2008P	ABS2010	TEDS2012	TEDS2013
民主满意者	31.9	36.6	41.5	29.3
民主批评者	17.9	14.3	15.4	18.4
民主顺从者	22.2	32.1	31.0	26.7
民主离异者	28.1	17.1	12.9	25.6
样本数	1905	1592	1826	2292

资料来源：TEDS2008P、ABS2010、TEDS2012、TEDS2013。

总体来看，民主满意者的比例在 2008-2012 年呈现上升趋势，最高达到 41.5%，但在 2012-2013 年出现急剧下降，跌至 29.3%，低于 2008 年；民主批评者的比例在 2010 年小幅降低，此后小幅上升，在 2013 年达到 18.4%，高于 2008 年；民主顺从者比例在 2008-2010 年上升明显，最高至 32.1%，此后至 2013 年下降到 26.7%，高于 2008 年；民主离异者比例在 2008 年为高点（28.1%），2008-2012 年下降明显，2012 年最低至 12.9%，2012-2013 年快速上升至 25.6%，但低于 2008 年。

表 8 模型以民主支持度为因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中将年龄、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政党偏好、身份认同、统“独”立场、回顾性经济评价、对

“行政院”、“立法院”以及马英九的评价作为自变量。表 8 结果显示，年龄、身份认同、统“独”立场、回顾性经济评价、对“行政院”评价、对马英九满意度变量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相较于年轻人，年龄越长者，越支持民主制度；在身份认同方面，自认为“台湾人”者，会更为支持民主体制；相较于“泛蓝”认同者，“泛绿”政党认同者较为支持民主体制；统“独”立场方面，偏“独”者更为支持民主制度。令人注意的是，对“行政院”评价较高者，较不支持民主制度，而对马英九执政较满意者，较不支持民主制度。其可能的原因是支持“行政院”与马英九的多为深蓝民众，而他们有可能是所谓的“民主顺从者”，即不太坚定地支持民主制度，但会对国民党的执政表示满意。

表 8 关于台湾民众民主支持度的回归分析（2013）

台湾民众的民主支持度（自变量）			
	B	(S.E)	Exp (B)
年龄	-0.203	0.067***	0.816
性别（1=男；2=女）	0.010	0.110	1.010
家庭收入	-0.001	0.067	0.999
教育程度	-0.195	0.121	0.822
政党偏好	-0.110	0.073	0.896
身份认同	0.011	0.006*	1.011
统“独”立场	-0.120	0.069*	0.887
回顾性经济评价	0.153	0.087*	1.165
“行政院”评价	0.144	0.069*	1.155
“立法院”评价	0.009	0.068	1.009
马英九满意度	0.220	0.085**	1.246
常量	0.359	0.644	1.432
N	1371		
-2 对数似然值	1892.330		
NagelkerkeR ²	0.042		
卡方（模型）	44.689		

资料来源：TEDS2013。

*:P<0.1; **:P<0.05; ***:P<0.01.

运用同样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来对影响台湾民众民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析，自变量的选择与表 9 一样。其结果显示（见表 9）年龄、家庭收入、教育程度、政党偏好、对马英九满意度变量呈现统计上的

显著性。年龄越大者，对台湾的民主运作较为不满；家庭收入、教育程度越高者，其民主满意度越高；对马英九较满意者，一般多为在政党认同更为偏蓝者，也较满意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民主运作。

表 9 关于台湾民众民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2013）

台湾民众的民主满意度（自变量）			
	B	(S. E)	Exp (B)
年龄	0.116	0.070*	1.123
性别（1=男；2=女）	-0.094	0.114	0.911
家庭收入	-0.253	0.069***	0.777
教育程度	-0.209	0.124*	0.812
政党偏好	0.239	0.075***	1.269
身份认同	0.002	0.005	1.002
统“独”立场	0.012	0.072	1.012
回顾性经济评价	0.048	0.092	1.049
“行政院”评价	0.018	0.071	1.018
“立法院”评价	0.032	0.070	1.032
马英九满意度	-0.519	0.089***	0.595
常量	0.359	0.644	2.825
N	1380		
-2 对数似然值	1799.092		
Nagelkerke R²	0.092		
卡方（模型）	98.870		

*:P<0.1; **:P<0.05; ***:P<0.01.

资料来源：TEDS2013。

透过双变量的交叉列表分析，表 10 显示男性比女性有较多的比例成为民主批评者；女性中民主满意者的比例要高过男性。在年龄方面，年长者中民主批评者的比例较高，青年群体中具有民主顺从与民主离异倾向的比例高于其他年龄段。教育程度越高者对民主满意的比例也越高，而教育程度低者，具有民主批评的比例较高。收入越高者越支持并满意民主运作，收入越低者，更容易成为民主批评者。在政党认同方面，偏蓝群体

对满意或顺从民主运作的比例较高，偏绿群体对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民主运作会有更多的批判倾向。可能是由于国民党执政的缘故，自我认同为台湾人者，其成为民主批评者的比例会更高。同时，持偏“独”立场群体更容易具有民主批判的倾向；偏统群体对民主运作更为满足、顺从。在回顾性经济评价方面，认为台湾经济较之前差的群体更容易成为民主的批评者与离异者。

表 10 台湾民众各民主态度倾向的群众基础：交叉分析

变量	民主满意者	民主批评者	民主顺从者	民主离异者	样本数
性别					
男性	27.8%	21.1%	26.0%	25.1%	1067
女性	30.8%	15.6%	27.5%	26.2%	1027
年龄					
20-34	27.8%	14.0%	30.9%	27.4%	658
35-49	30.3%	14.9%	29.1%	25.6%	577
50 以上	29.7%	24.1%	21.9%	24.4%	860
教育程度					
国中及以下	23.4%	24.5%	26.0%	26.2%	543
高中职	26.8%	18.2%	24.2%	30.8%	627
专本及以上	34.2%	14.9%	29.0%	21.9%	918
家庭收入					
45k 以下	21.6%	26.7%	24.6%	27.1%	431
45k-75k	27.9%	18.0%	27.3%	26.7%	666
75k 以上	34.1%	13.8%	29.6%	22.6%	669
政党偏好					
偏蓝	34.6%	9.4%	31.5%	24.5%	743
无偏好	26.1%	16.8%	27.8%	29.3%	709
偏绿	26.7%	30.6%	20.0%	22.8%	641
身份认同					
台湾人	27.9%	24.3%	23.2%	24.7%	1216
都是	30.7%	10.2%	32.3%	26.8%	753
中国人	37.6%	11.8%	25.9%	24.7%	85
统“独”立场					
偏统	32.6%	11.1%	28.0%	28.3%	368
维持现状	28.4%	17.5%	27.8%	26.3%	1243
偏“独”	28.6%	27.6%	21.9%	21.9%	434
回顾性经济评价					
比较好	39.7%	6.4%	38.5%	15.4%	156
差不多	29.6%	12.8%	32.0%	25.5%	874
比较不好	27.4%	25.1%	20.1%	27.5%	1037

资料来源：TEDS2013。

六、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具体反民主体制选项的刺激下，台湾民众的民主意向明确，且在时序资料上呈现上升趋势，已基本具备民主巩固的特征，但民主体制的坚定支持仍不是很高。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台湾是新兴民主化地区，需要一个长期的政治

社会化过程；此外权威机关的政治信任程度普遍低落，特别是民众不信任台湾朝野对立氛围下代议立法机构，同时政党与媒体的信任度呈现长期低落；由表 8 模型也可看到执政当局民主治理绩效（满意度）不彰，会左右民众对民主政体的支持信心。同时，台湾民众对民主运作的满意程度也不是很高，表 9 模型也显示除了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

影响因素外，执政当局的民主治理绩效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再次表明在缺乏深厚的民主政治文化传统的台湾地区，民主政体的合

马英九自 2012 年连任后，台湾地区“民主满意”群体下降明显，相对应的是“民主离异”群体比例的迅速上升，这种现象并不利于长期的民主巩固。“民主批评”群体比例上升，他们在短期会对马英九当局民主治理绩效表示不满，但目前看这类群体不至于对台湾的民主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但若他们对民主运作长期不满，也不能排除他们日后会成为“民主离异”者。

对当局信心、民主支持与民主满意程度的下降象征台湾民众对民主治理品质的怀疑，现在的台湾呈现出类似于上世纪西方国“民

法性与权威机关的绩效表现高度相关。

台湾地区自 2008 年后一直存在 15% 左右支持民主但不满民主运作的“批评者”群体。“民主危机”阶段的诸多特征，而占领立法机构与“占领华尔街”等抗议活动在全球化背景下显现新时期民众对“民主赤字”的行动反应。若权威机关在经济以及民主治理方面无明显起色，可以预见的是台湾民众对权威机关政治支持将持续低落，进而侵蚀民众对民主体制的普遍支持，与“民主批评”、“民主离异”群体比例上升相伴随的，必然是民众“行动主义”立场的增强。毕竟“民主赤字”无法有效解释公民兴趣，但能够显著削弱抗议活动。



*本文首次发表于第二届台湾研究博士生论坛（2015 年 3 月 28 日），感谢上海交通大学林冈教授、黄宗昊、左亚娜助理教授、清华大学殷存毅教授的评论与建议，也感谢上海交通大学李利文博士、丁玎同学在定量分析方面的帮助。本文使用的资料部分系采自“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TEDS）系列调查（包括 TEDS2001、TEDS2003、TEDS2004P、TEDS2004L、TEDS2008P、TEDS2012、TEDS2013）。“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多年期计划总召集人为台湾政治大学黄纪教授。这些民调资料的计划主持人分别为黄纪（2001）、朱云汉（2003）、黄秀端（2004P）、刘义周（2004L）、游清鑫（2008）、朱云汉（2012）、黄纪教授（2013）；详细资料请参阅 TEDS 网页：<http://www.tedsnet.org>，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概本文内容概由作者自行负责。由于本文正在修改中，欢迎关于本文的任何改进批评，可电邮 www19851110@163.com。

*吴维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台湾研究中心 2011 级博士生。

[1] 在审查议会中，民进党籍“立委”占领主席台，会议主席、国民党籍“立委”张庆忠以“服贸协议”



- 审查已超三个月视为已审查为由，用隐藏式麦克风径自宣布服贸协议审查完毕送院会存查，引发朝野激烈争斗。
- [2] 朱云汉：《台湾离民主崩坏还有多远？》，《天下》杂志 544 期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7056>，2015 年 2 月 6 日登陆。
- [3] David Easton,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5, 5 (4), pp.435-457.
- [4] 在 Easton 的划分中，“政治社群”支持指涉大众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疆界或成员身份的认定与态度倾向，具体到台湾地区，其指涉的测量问题多集中于民众的统“独”立场、国家/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等方面，有关台湾地区“政治社群”支持且基于 TEDS 民调资料研究成果，可参见 <http://teds.nccu.edu.tw/intro3/riki.php?id=intro31&CID=1>。
- [5]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1996,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5, 16.
- [6] 此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Pereira, Luiz Carlos Bresser, Jose Maria Maravall and Adam Przeworski,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A Social-Democratic Approach*. 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朱云汉：《台湾民主发展的困境与挑战》，《台湾民主季刊》，2004 年第 1 期，第 143-164 页。
- [8] Pippa Norris,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199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7.
- [9] 相关研究可参见 Russell Dalton, *Democratic Challenges Democratic Choices: The Erosion of 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200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Pippa Norris,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201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 In Pippa Norris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7.
- [11] 此论点的典型论述可见于 Pippa Norris,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201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张佑宗、朱云汉：《韧性威权与民主赤字：21 世纪初叶民主化研究的趋势与前瞻》，《政治学的回顾与前瞻》（吴玉山等主编），台北：五南图书公司，第 121-135 页；黄信豪：《再探台湾民众的政治信任—检验“批判性公民”的解释》，《台湾民主季刊》，2014 年第 1 期，第 153-193 页。
- [12] Chu Yun-han, Larry Diamond, and Doh Chull Shin, "How People View Democracy: Halting Progress i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1, 12(1), pp. 122-136.
- [13] Mark E. Warren, *Democracy and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k E. Warren ed, 1999, pp. 346-360. 转引自林琮珠、蔡佳泓：《政党信任、机构信任与民主满意度》，《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10 年（总）第 35 期，第 162 页。
- [14] 对于民主类型的 2x2 划分，可参见张佑宗：《选举输家与民主巩固：台湾 2004 “总统”选举落选阵营对民主的态度》，《台湾民主季刊》，2009 年第 6 期第 1 卷，第 41-72 页；黄信豪：《台湾态度的类型：台湾民众二次政党轮替后的分析》，《选举研究》，2011 年（总）第 18 卷第 1 期，第 1-34 页。本文民主态度类型的划分沿用黄信豪的处理方式。
- [15] 本文原计划采用多项 logit 模型来分析四种民主态度群体的特质，发现多数变量在统计上并未具有显著性，因此改用双变量交叉的方法。
- [16] 台湾地区民众的政党认同与统“独”立场、身份认同密切相关，有关台湾不同政党社会基础的区隔差异，可参见林冈：《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研究—以社会分歧与选举制度为分析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3-94 页。
- [17] 黄信豪：《批判性公民与民主赤字》，《台湾民主季刊》，2012 年第 3 期，第 163 页。

上下而求索

彭勃

人物小传：彭勃，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研究领域：基层政治与地方治理，西方政府管理改革，公共政策分析，新媒体与网络政治研究。

记者：彭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都知道您在基层政治与地方治理领域成果颇丰。作为一名学生，特别想听听您的学术成长故事，怎样才能在学术科研上有一定成绩？

谈不上有什么成绩。不过，我个人经历的道路与你们博士、硕士研究生一样，从本科一直到博士阶段，学习的专业和师生群体也和你们一样。对你们的情况都非常了解和理解，有一些想法也许可以供你们参考

学术科研与其他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今天我浪费了几个小时，或者一次答辩没过，还要重新来过。而是人生的路上走了弯路，这种浪费是巨大而不可弥补的。不管你们以后干什么，都应该尽早树立一个大致的人生目标，朝那个方向及早开始，不断努力，日积月累，不动摇，不游移，一定会干出成绩的。

我没有什么太励志的故事。我记得读硕士的时候，从来没有规定说必须发表文章才能毕业，但是我就觉得作为研究生，不写点东西发表实在说不过去。因此，就在本科生论文基础上，在导师指导和帮助下，发表了一篇论文。虽然很幼稚拘谨，但毕竟自己的辛勤成果变成了铅字，现在还可以在《人大复印资料》上找到。读博士期间，身无分文，一个人在寝室里冥思苦想。行文到困顿之处，望着寝室的墙壁，觉得怎么这么难。其实每个人都有困难，人生与工作中迈过去一个坎，后面就是一马平川。

当然，学术科研上还有一些重要工作要做，例如，应当尽可能多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提升学术品味。本领域的经典名著还是要认真研读。研究方法也要认真学习，并在实际的研究中演练和揣摩。

记者：最近我们学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和调整，对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都习惯简称为“ABC”（A考、毕设、C刊）。对于学院培养方案的调整，同学们之间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随着C刊压力的增大，如何平衡好实习与学术文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研二的同学们来说。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待？



你们总结的ABC非常好。对于培养一个高质量的研究生，这些的确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基础性的ABC。学院对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修订和调整，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学院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对于培养标准的提高，同学们暂时不适应，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学院在决定过程中也考虑到了同学们的感受和反应。但是，根据学院对我院师生实力的判断，这个要求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我非常不同意将实习与学术文章对立起来的想法。实习是为了找到好工作，学术文章也同样会帮助你们找到好工作。身边这样的案例很多，就不再举例了。如果你们什么样子进来，拿个文凭戴个帽子，什么样子出去，作为老师是心中有愧的。



学生的能力培养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作为一个一流的学术单位，我们一定要培养学生的最重要和最可贵的能力，就是你们分析问题的视野、思路、角度和研究方法。这种能力到任何一个单位都是用得着的。而且越是到高的位置，这种能力就越是关键。如果不能在这一块上帮助和督促你们上一个台

阶，我们何谈一流？最多是一个中低档职业培训所。

研二同学只要处理好实习与学习的关系，尤其是如果能够将发表文章和毕业论文研究结合起来，围绕导师，依靠导师，向学院这么多老师学习，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求將俯跼
索上遠湯
下于漫
而吾其

对研究生教育的一些看法

黄宗昊

人物小传：黄宗昊，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

来学院后，承接了两门研究生课程，接触了一些研究生，也对研究生教育产生了一些观察与想法。《国是》是学院开放的论坛，也是分享的园地。很荣幸能有机会接受编辑同学的采访，将我的体会和大家交流。

一、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的不同

我觉得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教育的差别在于学习的自觉性。本科生主要是被动接受知识，抄抄笔记，或是等老师来安排活动；而研究生需要更多自觉地研习相关文献，在课堂上互相讨论、互相启发。本科教育多为知识的学习，进入研究所之后，更重要的是去分辨到底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不断进行思考以提升自我理解、分析、批判的能力。大量的文献阅读和不断的思考、讨论都只是工具，目标是帮助研究生提高思辨能力，这也是研究生教育的价值所在。如果研究生没有自主学习的精神，仍只是被动的等待老师灌输，则研究生教育很可能事倍功半，徒有文凭的价值，没有实质能力的提升。至于这样的能力有什么用？后面我会再解释。

同时，研究生学历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读或是不读，这涉及机会成本的考量。一般看来，本科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学历，可以选择早点入行工作，这样可以得到工作经验的提升。但是在理想状态下，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理解、思考和分析的能力，那么应该选择念研究生。不管是工作还是继续读研，二者都是有价值的东西，就看学生的选择。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现在随着大学扩招，本科文凭价值越来越薄，很多人盲目地来念研究所。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机会成本的考量，是一个选择和判断。

二、不同专业的差异

至于研究生应该如何培养？不同专业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我观察到台湾的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有三种模式。经济所研究生的专业学习状况非常像本科，大体上就是老师教，同学在下面抄笔记，常常也有期中、期末考试。和



本科比较大的差别就是更多的作业任务、研读更深入的文献。博士班时我去修习经济所的“高级计量经济学”，并问过任教老师何以如此？他很直白地告诉我：“连走都不会，凭什么跑？”对于经济所的人来讲，也许等念到博士，基础的理论知识尤其是数理工具比较完备，才开始有资格和老师讨论问题。

而法律所则是另一个极端，很多都是非常开放性的报告讨论课。譬如我妹妹在台大法律所念博士，他告诉我绝大多数他们的课程，老师会在课程开始阶段讲个几次，紧接着就分配任务由学生作报告。老师可能会给出报告方向，但是不会明定题目，由学生准备、主讲，老师点评、带讨论。这样的方式可说是非常相信学生的能力，但可预见的就是学生报告的品质良莠不齐。法律所何以如此做？我想跟法学的学科本质有关。法学其实只是下游的学问，很多实体知识在本科已经讲完。而法律内容何以如此？这常常已经不是法学本身的范畴，而是来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法律所的训练很大一部分需要跨学科，老师不容易就实体内容来教，那就由学生自主学习，老师带领学生讨论学习心得。

政治所则是介于其中，不像经济所几乎



都由老师主讲，也不像律所这么放任。老师会根据课程主题开出书单，规范清楚每周的阅读内容与进度。学生必须课前先阅读材料，然后上课的时候和老师、同学讨论。在台湾，政治所课程阅读的是以英文材料为主，学期考核的依据以撰写期末报告比较多。

何以不同专业的培养方式差别甚大？这涉及到对技术难度的关注。经济所特别强调技术能力，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数理程度差很多，以至于实际讨论有困难。律所的基本知识在本科阶段大体教完，研究生阶段更强调思辨的训练，特别是采用“作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培养。政治所也注重思辨的训练，研究生在入学前应该已有前期的知识储备，所以老师就针对进阶的部分先让学生阅读，然后带领讨论，在讨论中进行教学，更多的是启发引导，而非老师单向地讲授。以上所言只是大方向上的差别，实际上也要看课程的性质而定。例如政治所的统计课主要也是由老师讲授，而非进行讨论。

三、研究生教育的价值

谈完了不同专业培养方式的差异，再回到原先所谈研究生教育的价值。是否念研究生涉及机会成本问题，人的心力、时间就这么多，投入职场可以得到工作经验，这是很宝贵的，那来读研究生除了文凭外又有什么价值？如果藉由政治学相关领域的培养方式，每门课都需要大量阅读，并在课堂上和老师、同学进行讨论，同时修习几门课会带来比较沉重的课业压力，这样持续一年多到两年的训练，我觉得能够提升几种抽象的能力。

1、如何应付大量资料。每门课可能都是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阅读量大，特别是英文材料，而且同时好几门课，你该怎么办？如何在比较多的资料中迅速掌握重点，特别是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很难从第一个字精读到最后一个字，这取决于把握材料的策略。只有身临其境面对沉重的课业压力，才能在挣扎中发现生存之道。一旦学会这种技能，对将来进入职场也是非常有用的。

2、掌握重点只是第一步，紧接着要去分析、判断。文本的观点如何？这样好还是不好？自己是否同意？自己又是怎样想这个问

题？读完材料后把思考的结果拿到课堂上和老师讨论，同学之间彼此讨论、甚至辩论。这涉及到如何陈述己见，如何理解别人。不断的阅读、思考、讨论、辩论，就会提升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对整个状况的利弊得失能够掌握。很少有什么观点是绝对的好或不好，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应该怎么看待，并且如何做出判断。

3、学习如何做研究。其实写硕士论文就是做研究。那什么是做研究？我觉得我导师的一句话很有启发：“把一件事情想清楚、弄明白，这就是做研究”。论文套路的每个步骤，都有深刻的意涵。比如说为什么要写文献综述，这就是一个分析的过程。一个问题往往会有其他人想过，那你首先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通过和前人成果比较，可以界定出你的研究在既有成果中的意义何在，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做研究本身就是整套抽象能力的训练跟提升，包括理解、思考到分析的复合能力。这样的能力不只可以应用在学术上，更能应用在职场上。

学会如何掌握大量资料的重点，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判断采用何种方案较佳，这其实是提升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也是我觉得研究生教育的精华所在。大部分的人念完研究所不会去当学者，但研究所仍然值得念，就在于藉由学术训练，可以提升自己整套的思辨能力。研究生教育其实是对自己投资，特别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

四、学历文凭的迷思

很多人认为：研究生毕业，投入职场的工资应该比较高，这其实是对学历文凭的一种迷思。这可以分两部分来谈。就工作的熟悉度而言，徒有研究生文凭并没有资格要求更高的工资。同一个岗位，本科生会比研究生早入行二到三年，对工作的熟悉程度要高于研究生；所以相较于刚投入职场时的研究生，早入行的本科生在职级和工资较高是很正常的。

但另一方面，为什么公司往往聘用高学历的人时会给予较高的工资？这涉及到对综合素质的评价。因为接受过学术训练，研究生所拥有的理解、分析、判断能力可以更

好吻合工作的要求。所以企业愿意给研究生较高的工资，是因为相信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过程能提升综合能力，企业投资的是研究生在未来会有更出色的发挥。

如果仅凭一张研究生文凭，在工作的一开始，是没有资格要求更高的工资，因为对工作根本还不上手。但是职场上往往愿意给研究生较高工资，是冲着研究生可能具有更高的抽象能力和素质。所以研究生教育的关键价值，在于这是一个投资自己、提升自己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训练过程，培养的是未来加薪、晋升的“加速度”。

研究生刚入职的时候，本科生已经入职两、三年，工资和地位会高于研究生。如果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足够高的话，在合理的预期之下，研究生的工作表现在入职后两到三年，工资和职级能赶上早入行的本科生，然后再过两到三年，很可能超过本科生。

接受研究生教育是投资自己的“加速度”，让自己的后劲更强。就像是两辆汽车赛跑，其中一辆汽车先跑，另一辆汽车改装更强大的引擎再跑。在前一段时间，先跑的车是领先的，但后跑的车后劲更强，在可预见的未来，会逐渐赶上先跑的车，紧接著超越并拉开领先的距离。

所以硕士文凭和更高工资之间的连结，合理性应该是建立在研究生教育有助于提升素质和能力的观点上。至于要不要念研究生是一个选择，这涉及到机会成本的考量；至于念了研究生是否真的提升了素质和能力？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五、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困境

如果前述的理解能够成立，则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普遍面临困境。一方面涉及到老师怎么看待研究生。一般来讲，学校特别看重本科生，认为这是经过高考筛选出来的优秀苗子；博士生则和老师关系密切，多半与老师的科研绑在一块，形成学术共同体。但是硕士生介于其中，面临着“不上不下”的局面，学校不够看重，老师不够关注，最后的结果，很多老师对于研究生的指导与教学往往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另一方面，研究生怎么看待学校呢？可能有些同学的心态本来就是来“过水”，重点在

于取得文凭；也许有些同学一心向学，立志走学术之路，准备读博；但更多的同学心态应该是介于其中。当这批居多数的同学发现学习的环境不是很理想时，他们的想法容易转变，本来重心可以放在学校的学术训练，但后来更多的是把重心移到校外的工作实习上。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同学，要小心两头落空。毕竟在企业实习，只是实习生，不容易被赋予重要的任务，也不见得能学到很多东西。但因为实习，在学校的时间短，接受的学术训练不足，以致于抽象能力的提升有限，毕业就只剩一张文凭。当然我也承认，对于谋职来讲，虽然没有全职工作，但有实习经验总比完全没有经验要好一些。关键是同学对于利弊得失应该要好好权衡。

当前的困境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老师看待研究生觉得“不上不下”，那么他们对研究生的培养和课程讲授就不会那么尽心尽力；而研究生也许本来有比较大的期待，但后来发觉自己的期待与实际情况有落差，最后就选择离开。所以演变到后来，学校会抱怨研究生对学习的认同感和参与度没有那么高，研究生可能也感到挺委屈的，所期望的培养和训练好像没有完全达成。恶性循环之下就构成一个矛盾的局面。

六、改进之道

比较可行的改进之道，首先是老师们能够自觉地提升课程品质。但是学校很难对课程品质出台统一的规范，所以老师们应藉由彼此之间更多的交流，建立学术的默契和共识，致力于提升教学的水准，让学生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并藉由学术训练提升抽象的能力和素质。

再一个是研究生的自觉性。很多研究生只是随波逐流的生活著，并没有深刻体会到研究生教育的价值。藉由以上的分析，希望能对研究生群体有点启发，更自觉地投入到学校的生活和学术训练中，切实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

藉由老师提升课程品质，研究生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接受研究生教育，更自觉地投入学术，期盼会对当前的困境有所缓解，甚至能重新开启一个良性循环的新学风。

注重历史与政治的经济学研究

——《21 世纪资本论》与法国调节学派理论关联

吕守军

人物小传:吕守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博士,2006 年美国巴尔蒂莫大学访问教授,2010 年日本关西学院大学访问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外国人特别研究员,日本演化经济学会会员、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会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政府规制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公用事业管理、公共经济政策分析、日本经济、演化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

《21 世纪资本论》最重要的贡献,无疑是重新把社会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促进了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交流。

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以英、法、美、德、日等国近 300 年的历史为研究对象,通过长期时间序列的定量分析,揭示了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引起了全世界关注。这种对长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关注,与深受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启发的法国调节学派颇为相似。梳理二者之间的理论关联,可以为全面认识《21 世纪资本论》提供参考。

研究主题的相似性

自 1976 年创立以来,法国调节学派始终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学理基础,坚持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自由主义方面,皮凯蒂与法国调节学派无疑具有一致性。法国调节学派强调经济因素在资本积累相对稳定时期的变化,以及在危机导致的重组时期的变化。同时,他们强调经济外因素的作用,强调习惯、法律、文化、习俗和心理,强调社会行动发生变化所起的作用,尤其强调政治是制度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在危机中自愈。相反,政府机构在资本主义稳定期和危机期具有调节作用。

在《21 世纪资本论》的结论中,皮凯蒂提到了让·布维尔(Jean Bouvier)、弗朗索



瓦·菲雷(Francois Furet)和马塞尔·吉莱(Marcel Gillet)于 1965 年出版的《19 世纪法国的利润变化》著作,表明了他关于对过去和现在各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分析受到调节学派研究的影响。很明显,皮凯蒂借鉴了布维尔等人的“历史序列数据法”等研究成果,并赞同菲雷优先考虑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方法。皮凯蒂认为,“价格和工资、收入和财富的涨跌,帮助形成了政治观点和态度,这些表现方式反过来产生了政治制度、规则和政策,最终形成社会和经济变迁。找到一种兼具经济和政治、社会和文化,并且关注工资和财富的方法是可能的,甚至是绝对必要的。”同时,皮凯蒂为政治的、历史的经济学辩护,明确表示更喜欢“政治经济学”的表述,而不喜欢“经济科学”这样“极端傲慢”的表述,“因为暗示经济学获得了比其他社会科学更高的科学地位”。

方法论的共性

在方法论方面,皮凯蒂和法国调节学派

都强调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都注重对资本主义各国差异性的分析。

1976年出版的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的《资本主义的调节理论和危机：美国经验》一书，是法国调节学派的奠基之作。该书通过对美国建国以来200年历史的分析，揭示出二战后“黄金发展时期”和石油危机形成的原因和机制。20世纪80年代，调节学派提出“时间可变性和空间多样性”的方法论，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增长和危机交替发生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不断地发生变化。而这一方法论更有利于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时间可变性”实质上是历史分析的方法，是指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强调制度诸形态是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微观主体的行动符合积累体制发展的需要就会出现经济增长，反之则出现经济危机。“空间多样性”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文化、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多样性，导致各国的经济结构并不完全相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经济结构和制度形态。20世纪90年代，调节学派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多样性”学说，把资本主义划分为四个或五个类型，比较其制度形态的差异，揭示出美国型资本主义并不比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有效率。

对于上述方法论，皮凯蒂并没有明确的论述，但《21世纪资本论》最重要的贡献，无疑是重新把社会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促进了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交流。皮凯蒂认为，“新手法经常导致研究者忽视历史，也认识不到历史经验仍然是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为此，他构建起数量史和长期时间序列，为税收政策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对那些直接来源于理论而缺乏实证和论证的想法提出了批判。相较而言，《21世纪资本论》研究的历史时段更长，涉及资本主义300年的历史；而其建立的成套的统计数据以及“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也使得调节学派相形见绌。

调节学派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得到了体现。在研究中，皮凯蒂首先以法国的富裕阶层和继承资产的长期推移为焦点，之后在同事、青年学者和博士生的协作下，把研究对象拓展到

美国、印度、中国、欧洲和拉丁美洲。在比较分析中，皮凯蒂指出，有些现象在美国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英国可以清楚地看到，但在加拿大或大多数欧洲国家却看不到。虽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决定论的问题，但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可以部分地阻止不好的变化，避免食利者的收入超过劳动者的工资。在皮凯蒂看来，不平等的程度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向神秘的结构平衡趋同的结果。

与调节学派“空间多样性”方法论不同的是，皮凯蒂看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有“一个国家一个类型”的“国别论”倾向，而前者对多样性的理解则是基于类型划分。通过对21个OECD国家GDP增长率等宏观数据和“创新和生产的社会体系”的特征分析，调节学派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型资本主义”、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型资本主义”、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型资本主义”和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地中海）型资本主义”五种类型。进而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与“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相比，其他类型资本主义同样具有效率，得出了“市场并非万能”、“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也并非最完善的发展模式的结论。

存在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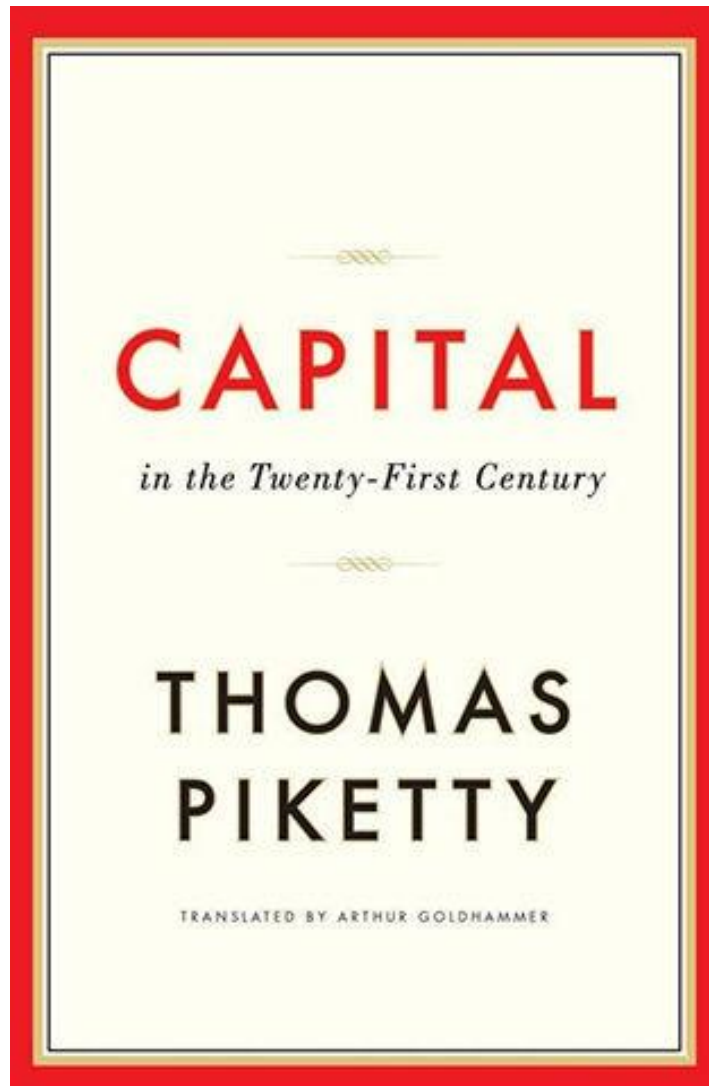
《21世纪资本论》不仅对传统经济理论和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而且解决了经济学界由于统计数据不足而产生的长期争辩，其学术贡献显而易见，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将尝试对其可能存在的不足提出一些看法。

与皮凯蒂提供的庞大数据相比，该书在理论化方面相对薄弱。书中大量使用了归纳法，但对统计趋势进行推断时，却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没有对其中的连锁关系、因果关系进行精密的理论化分析，由此导致对统计中表现出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是否能够推广等问题的解释不足。例如，本应对构成长期体制的各种变量之间的交错关系进行全面说明，然而作者只对资本/收入之比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率、人口增加率、生产率和利润所占比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但对于储蓄率和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储蓄率和利润所

占比率之间的关系、生产性资本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非物质资本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资本/收入之比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加以说明。

可以看出，作者深知自己模型中关键性变量来源于复杂的社会过程，因此采取了两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他求助于其他社会科学，指出“（储蓄率和增长率）两个参数本身取决于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和人口等众多因素影响之下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决策，因此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可能

千差万别”，从而回避了对上述变量之间关系的说明。另一方面，皮凯蒂试图从先行研究和经验考察中探索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虽然对增长理论进行了重新考察，但仍然把人口的动态变化、技术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收入分配、不平等关键性变量混合在一起。总之，与作者非凡的历史研究相比，期待皮凯蒂在新著中，能够在理论上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系统阐述，而不是简单的处理。



《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

译者感言

徐家良

人物小传：徐家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民政部基金会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出版的个人专著有《互益性组织：中国行业协会研究》、《政府评价论》、《制度、影响力和博弈》、《中国中央政府管理》等。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的周雪光教授在2006年第4期的《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启迪——《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对美国年青的社会学家埃里克·克里纳伯格的新作做了介绍和评述。此书获得2003年罗伯特公园奖(Robert E. Park Award)和由城市事务协会2003年城市事务最佳图书奖(Best Book in Urban Affairs Award of the Urban Affairs Association)。我感到，尽管这本书是从社会学专业的博士论文改编过来的，除社会学、人类学、医学外，实际上还涉及到相关学科和领域，如公共管理、政治学、公共政策、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而且，该书采取案例方法的理论分析，因此越益增加了我的兴趣。

我理了一下思路，《热浪》一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吸引力：

一是命题。克里纳伯格所研究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的社会环境才能足够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芝加哥人在热浪中孤独地死去？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意识到悲剧发生以后，仍然有那么多芝加哥人相继孤独地死去，他们与社会的纽带或联系真的非常少吗？

从芝加哥的热浪入手，探讨了人类永恒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和死去？儿童、青年人是一种活法和死法，老年人是另外一种活法和死法。对前者，学术界关注较多，而对后者，则研究较少。“关于城市居民的孤独，尤其是老年人和穷人的

孤独现象，当今的学者几乎没有人对它进行研究，更没有人去研究这种现象的本质。”(32页)克里纳伯格正是从700多个死难者身上，发现了老人余生的孤独。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轨迹，也

是一种人生观的具体展示。追求个人权利的人们，不仅在年轻的时候如此，而且在老年时也不改本性。解决人与人之间孤独的方法有许多种，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常用的词就是“综合运用”。小区中，要有安全的居住环境，少一些毒品交易和其他犯罪行为；邻里关系有较多的交流和帮助，而不会出现老人死去多日，仍未被及时发现的现象；社区教堂和其他的社会组织也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解决老人所遇到的生活困难；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增加适合老人使用的冷气中心，增添警力，鼓励民众加强交流。因此，克里纳伯格从热浪死难者身上，逐渐把视角转向社区、邻里、网络、政府机构和媒体。展示各个部分如何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成为《热浪》一书的思考过程。

二是方法。克里纳伯格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生，有较深厚的实证研





究的基础，特别是选取热浪作为个案，有其独特的慧眼神功。

一般而言，选择个案的好坏，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可以加以考察：

第一个是可控制性。如果研究者对研究的对象不加以“适当”控制的话，研究可能无法深入，缺少针对性，会流于泛化。（1）时间控制。热浪时间为一周，只要收集这一周的材料，就可以了解整体状况，投入的精力会比较小。（2）人数控制。热浪死难者达到739人，加上医院、消防队员、社区、教堂、社会组织、验尸官、记者等人员，人数就不少了，如果作者要对这些人员都加以访谈，难度仍然很大，所以，作者巧妙地选择了相关的医院、消防队员、验尸官和记者，特别选取了两个社区北朗代尔（North Lawndale）、小村（Little Village），这就降低了访谈范围过大的难度。（3）地点控制。在美国，人员死亡的灾难不仅仅出现在芝加哥，包括1994年加利福尼亚诺斯里奇（Northridge）地震、1992年佛罗里达的飓风。如果把灾难加以整体研究，可能会泛泛而谈，变量之间缺乏逻辑性和有机联系，选择芝加哥这个城市，就轻而易举地把讨论的话题限定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便于深入的分析。

第二个是扩散性。从南朗代尔到北朗代尔，从热浪的一周到整个芝加哥的政府再造运动，反映出作者不仅仅把自身的讨论限定在热浪这个话题上，而是以热浪作为一个聚焦点，触及到家庭传统、邻里关系、产业结构、个人主义传统、犯罪活动、城市基础设施、政府管理、非政府组织（如黑人政治赋权力量、大都市老人在行动）、警民关系等方面，使探讨的问题辐射到整个芝加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

三是理论。研究活动不能凭空产生，有较强的传承关系，这项研究也是如此。芝加哥学派有一重要的研究途径，就是对城市的研究。克里纳伯格承袭了这一传统，包括案例研究、强调物理与社会空间、关注社区与公共生活、调查族群差异等，但他不囿于此，而是把重点放在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系统这方面，这恰恰是芝加哥学派问题意识的核

心。整体社会系统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政府管理、媒体传播的地位和作用。

四是材料。平常我们所见不成功的个案研究材料收集，往往是第二手材料，包括报纸杂志媒体的报道内容，这样的材料在使用时，就会有很大的局限，因为媒体报道的重点与研究者的重点以及对材料的取舍有较大的不同，使用媒体报道的材料，有致命的缺陷。而克里纳伯格选定这一研究题材后，进行了16个月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五年的研究活动。而且田野调查的“大部分时间我与那些孤独的、贫穷的以及没什么社会关系的人呆在一起。”（32页）到验尸官办公室查找档案，到墓地去参加活动等，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他在整个田野考察的过程中，访谈了40多位老人，对老人孤独和隐居现象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对两个相邻社区进行调查时，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日常观察（1998年7月—1999年2月），做了40多次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当地居民、商人、政府官员、宗教领袖、社区组织者、警察等。只有与研究对象做成朋友，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才能了解“真实”的生活。

五是责任心。通过整本书，我们始终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作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学者的崇高使命感。通过访谈与参与观察，考察社会的基本运行，探求事实背后的真相，这不仅是要把它写作一篇博士论文，而是要有一种勇气，排除主观或客观的干扰，提出不同的对事物的判断，显示出对生命的尊重，尤其是对像老人这一类弱势人群的关注，呼唤着对人的同情与关爱，重组人际网络。

在纽约时，克里纳伯格告诉我，根据《热浪》这本书改编的话剧在2008年2月21日至4月6日的演出，票价17-25元。我甚感欣慰，因为，在美国有这么多人把历史作为一个教训，也作为一个经验，这对以后人们过上幸福的好生活，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增强人与人的信任，提升组织的凝聚力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健忘”历史，也不应该“健忘”历史。

范式与沙堡

——评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

陈拯

人物小传：陈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上海市晨光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的制度与规范变迁、中国人权外交政策。

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的第三本英文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获得了国际问题研究协会 2014 年度最佳著作奖。¹ 该书综合多学科知识，提出并论证了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范式，为国际体系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系统进化诠释。

除简短的导论外，《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全书由三部分共五章组成。

第一章“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是全文的基础，阐述了社会演化范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 SEP）的基本主张。作者指出，演化思维考察的是由生命主导的系统。这些系统不可避免地随时间发生改变，而改变进程的核心是变异-选择（即消灭/保持某些表型/基因型）-遗传（即复制及传播某些表型/基因型）的进化机制。只要生命系统存在，这一机制就会无限运作下去。进化论的优势在于它对生命的奇迹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且完整的解释。和生物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也是演化的天然领域。根据作者的论述，在本体论上，社会演化范式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随时间流逝进化的系统，其驱动力来自社会系统内部各种力量间持续的互动。在认识论上，社会演化范式强调，我们能够而且只有通过演化思维才能充分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对社会变化的核心解释机制同样是“变异-选择-遗传”。与生物进化中只有物质力量发挥作用不同，社会演化中具有精神力量这一全新的动力，赋予社会演化以生物进化所没有的特征。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共存意味着社会进化是以拉马克遗传为主（即表型可遗传）而以达尔文遗传为辅的。在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表型的直接遗传（通过学习观念或行为）

是驱动社会变化的关键力量，社会权力作用是社会选择的核心机制，而社会演化中变异的随机性可能比自然进化要小。社会进化论范式同样以一个单一的机制（即变异-选择-遗传）来解释系统的变革及其相对稳定性，并能将学习、社会化等微观或中层机制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作者强调，当由互动产生的变化在系统内不断累积，并超越临界值时，系统即能够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是内生化的，无需求助于外生变量。在这一章中，作者还检讨了国际关系研究中采用演化路径的已有尝试，澄清了一些误解。²



第二部分是本书主体，共三章，作者将社会演化范式应用到国际体系变迁的经验研究。在其前两本英文著作《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与《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基础上，作者利用社会演化范式阐述了国际体系从公元前 8000 年到今天以及未来的变迁，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



是从一个“和平的乐园”到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以及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到一个更加规则化的世界。

第二章以“失乐园得范式”为题，讨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的形成。作者利用考古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等学科的前沿成果，梳理世界上主要地区的人类社群如何从乐园般的和平状态进入一个残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这是国际关系研究以往几乎从未涉及的领域。作者认为，所有人类文明都经历了战争从无到有并渗透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轨迹。在作者的论述中，基于生物进化的这部分“人性”只是导致战争出现的一部分重要原因，但并非充分的原因。群体认同感以及作战工具与技巧（最开始都是用于狩猎的）的出现，也是使战争成为可能的必要因素，但一个子系统内的相对人口压力才是战争起源的关键导因(trigger)：当食物、土地等资源不足，一个子系统内的相对人口压力越过某一临界值时，群体之间极可能会爆发战争。而一旦战争出现，它就会将恐惧扩散到整个体系中。只有备战进攻才能存活。根据社会进化的变异-选择-遗传的机制，人类群体不得不走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道路以使自身存活下去。在战争推动下，社会分工、政治体制和理念文化都发生相应变化（即，作者所谓的“得范式”）。战争成为所有群体必须面对的事实，人类从此失去了“乐园”。作者利用考古学与人类学资料具体讨论了两河流域、古埃及、中国的战争起源，以及这些区域又如何影响欧洲等战争外生的区域。作者强调，随着系统的进化，只有尝试并且成功征服他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在系统中生存；而其它类型的国家，要么消亡，要么被社会化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国际关系学者要认清理论的时代特征。进攻性现实主义最适用于战争起源至近代国家体系形成。

第三章以“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为题，转向论证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如何不可逆转地演进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系统。作者指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国家必须通过扩张和征服来保障自身安全。这被认为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不可替代的根本机制。作者的理由是，当

一国追求征服且某些征服取得成功时，将不可避免地使国家的数目减少，而国家的平均大小（以土地、人口和物质财富为衡量标准）增加，防御能力相应得到增强。进攻方将面对更为强大的对手，于是征服将变得更加困难。换言之，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通过征服来获取安全，随着时间流逝却不可避免地使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中心逻辑变得难以实现。这又得到三个辅助机制的支撑。首先，当进攻战略越来越不利时，将出现别的选择。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晚期，不少国家通过自助或结盟的方式已聚合了应对潜在进攻的足够防御能力。这些国家选择防御性战略也能生存下来，这类似于生物意义上的突变，成为遗传变化的基础。而随着国家规模增大使征服变得困难，系统中的选择将越来越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利，而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有利。其次，征服变得困难的观念还会扩散传播。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后期，大多数国家将最终学会“征服不易且无利可图”的观念。通过防御性战略实现安全成为下一个在国家间流行的观念。最后，还有一个辅助动力是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传播，同样使征服和占领更加难以取得成功。三个辅助机制建立在根本机制所带来的结果之上，与后者一道，逐步但坚实地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³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它“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地随着时间推移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这一转变是内生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国家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国际体系经历了这一社会演化，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适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第四章则讨论在防御性现实主义基础上一个更加规则化的国际体系如何正在形成。作者认为，人类社会正在变得更加规则化，但不会出现完全和谐的世界政府与世界社会。这一判断建立在其依据社会演进范式提出的制度变迁广义理论基础。作者指出，制度是社会知识的体现，或者说是观念的固化。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如何把一些观念固化成为制度安排的过程。作者将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视为基因、把制度安排视为表型(phenotypes)，利用社会进化范式中的核心

机理，即“变异-选择-遗传”，来分析制度变迁。其中观念的产生相当于“变异”；相关的政治动员和权力斗争则相当于“选择”；规则创建和使制度合法化/稳定/复制相当于“遗传”。国际政治中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对规则选择/制定权的争夺。制度由权力创造和维系，包含着利益冲突与权力关系。制度和权力塑造集体认同，而不是相反。基于这种理解，作者认为，只有在以“共同生存”为逻辑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合作才能成为一种可行的自助方法，来源于重复合作交往的观念和规则才有机会固化为国际机制。这一转型直到二战后才大致完成，所以新自由制度主义有意识地将研究限制在这一时期。作者扼要讨论了拉美、欧盟和东盟三个地区将和平规制化（institutionalizing peace）的过程。他认为，初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浅层和平使得制度化和平成为可能。这种互动合作加强了民主化等进程，而后者反馈推动国家构建更加规则化的深层次和平。作者强调，地区制度化和平的启动，只有在某个子系统演进到防御性现实主义阶段后才有可能；是区域和平的规制化推进了经济一体化而不是相反。对于国际秩序的未来，作者提倡福柯式的批判思路，强调世界国家和世界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无法确立普世一致的价值和规则，它们也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必须警惕道德一元和绝对主义。对规则的违反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变化的动力。我们能期待的是一个多元而不平衡，更好却注定不完美的世界秩序。

第三部分由扩展性讨论的第五章和结论组成。作者着力阐述体系-演化观与结构观的差别。在作者看来，有关结构-行为体的争论是不充分的。结构本身所能解释的十分有限。继续在结构-自主性问题上纠缠是无效的，相反，作者强调应当从体系而非结构的眼光出发思考社会问题。他指出，以往对社会及国际体系的界定并不充分。社会体系除了结构和行为体，还包括了自然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以及无法被还原的系统特性与进程。因此，将体系化约为结构并不可行。除了行为体间的互动，行为体、结构及自然环境间也彼此相互影响，一个体系理论必须处理单元如何在体系中互动，单元同体系的其它部分

如何互动，以及所有这些互动如何推动了体系变动等问题。作者阐述了国际体系的若干（而非全部）构成，包括体系（或次体系）的地缘政治环境，体系内单元的数量，体系内多数单元的性质，体系内单元互动的数量和范围，体系内单元同自然环境间互动的数量和范围，体系的制度化程度，行为体对体系的知识水平，以及不同行为体间知识的共通程度与体系内的主要趋势等等，并讨论了体系与国家互动的五种渠道机制：限制/机会（enabling），学习，选择，构成（constituting）以及反社会化或理念式对抗（anti-socialization or ideational resistance）。他强调，必须综合这五种机制，才能更好地解释国家在体系中的作为，而国际关系的已有范式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对反社会化机制几乎没有涉及。

在结论部分，作者回应开篇的问题，指出不同大理论间的根本性分歧来自于隐含假设的不同。国际政治不同的大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历史时期又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因此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因此，尽管某些特征（如无政府状态）一直存在，但其本质还是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systemic theory）无论多么复杂都注定不可能解析国际政治的全部历史。它们只能解释一个特定时间框架内的特定系统。这正是为什么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辩论没有得到解决的最终原因。它们之间的辩论试图将一个非进化的理论强加于一个进化的系统之上。这注定是行不通的。作者最后的政策建议是今天世界已进入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国家必须在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的指引下尽可能寻求合作，并且努力将合作常态化和制度化，增进社会福利，并且尽可能用和平的手段惩罚违规行为，维护规则。

总之，《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这本书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诸学科的知识，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国际关系的进化范式。作者为诠释国际政治的系统进化提供了一个气势恢宏的总体框架，对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富于启发性的新见解。演化范式试图通过变异-选择-遗传

机制综合多种学说，超越目的论与建构论，展示了内生解释复杂现象与体系变动的思路。书中挑战了国际政治领域内所有重要的大理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新

自由主义、英国学派以至建构主义，展示了作者提出的国际政治社会演进范式的智力力量，令人震撼。



[1]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作者认为，在国际关系著作中，Hendrik Spruyt 对欧洲主权领土国家兴起的解释与其倡导的社会进化论观点最接近（而其它多数研究虽然用了演化字眼，但其思维论述模式并不是真正演化的），但后者并未对社会进化和社会进化论范式进行系统阐述。See Hendrik Spruyt,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 An Analysis of Systems Chang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相关讨论参看，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5-40.

[3]在笔者看来，民族主义与主权观念如何“内生地”出现存在疑问，但原著在此似无说明。

苛政之后的“同情”：毁灭还是繁荣？

——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李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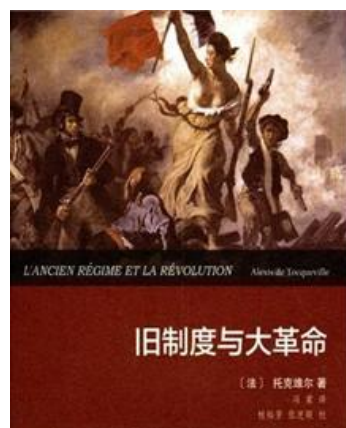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紧紧围绕中央集权、阶级分离、宗教革命和文人政治这几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一个核心问题：大革命为什么不在具有相似性的除法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爆发？为此，托克维尔利用前人未从接触过的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之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 1789 年的陈情书等大量档案材料对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状态进行了严密考察，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是引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这些旧制度包括中央集权制、御前会议、政府管理监督、行政法院、官员保证制等等。令人惊奇的是，这场以摧毁旧制度为目的的血雨腥风在其实现其目的之后，它摧毁的对象竟死而复生并重新冠冕堂皇地控制着社会秩序的运行。更令人可笑的是，许多人竟然将他们要推翻的中央集权制奉为大革命的功绩，对之俯首贴耳、恭恭敬敬。托克维尔深刻地分析了旧制度是怎样为一场大革命的到来做准备的，详细地描述了大革命之前的各种征兆，深入地剖析了一些令人矛盾的现象，如 18 世纪的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为何比 13 世纪的农民还糟、繁荣为何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减轻人民负担为何反而激起人民愤怒等。本文正是基于托克维尔对这些矛盾的分析来阐述苛政的缘起与不可根治。

具有典型特征的封建农奴制实际上在法国很早就没有了，据考证竟早于文艺复兴时期，在 13 世纪法国农民就可以任意往来、买卖、处置耕作，而这一时期的德国甚至没有一处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度，仍和中世纪一样，大部分人民仍然被牢牢地束缚在封建领地上，因此法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小地主，

这些小地主是农民中的富有者，这些小地主在后来旧制度的作用下不断向城市进军并逐渐摆脱领主的统治变成了不受赋税和军役控制的新贵族。这种人由农民变为贵族，由第三等级走向第一或第二等级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当时的人民还是存在一定自由的，正是这种土地所有的规定的变化改变了人民的社会地位，也改变了人民生活环境中的自由气息。令人不解的是，人民在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同时政府却在表现出压迫和暴力的特征。

路易十六之前的统治者为满足其挥霍，收罗财源、剥夺人民变成了政府的重要目的。在桥梁公路工程中，他们“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而对财产的破坏和毁灭迟迟不愿赔偿，甚至干脆分文不赔。在旧制度中，富裕资产者涌向城市为过活而赎买官职的行为经常发生，然而在这过程中有通信表示，“历来为赎买城市官职而付的钱，其数额之大使我震惊。这笔钱财政总数用于有益的事业本应当为城市谋利，然而结果相反，城市只感受到政府的压迫和这些官职享有的种种特权。”在这一时期政府实际上控制着所有事情，政府事无巨细，已经渗透到居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居民一般有权通过普选选出他们的官员，





但实际上常常是总督替这小小的选举团指定候选人，而这位候选人从来都是以全票通过。另有几次，总督撤消了自发举行的选举，亲自任命收税员和理事，无限期中止一切新选举。”另外，“在旧制度下，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在司法方面，“在欧洲，没有哪一国的普通法庭较之法国的普通法庭更独立于政府；但是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经常使用特别法。”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行政制度已经凌驾于司法制度之上并消解着司法制度的运转，人民在政府的税收压制下满怀怨气和不满，整个社会充满着焦躁、不安和不公正。

这些苛刻的政策和行为究竟何以产生，归根结底还是旧制度在作祟。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对人民控制过于严格，旧制度下的政府监管成为一种特权，旧制度下的行政法院成为一个无力抗拒的附庸。旧制度与统治者的个人目的相结合使苛政成为一种常态，这

些旧制度蔓延到政治权力中形成一种独特的行政风尚，行政官员们办事拖拉、态度傲慢、风格平庸、牟取私利、变化无常、专横跋扈、任意胡为，以至于“没有他们，什么事也办不了，只有通过他们，事情才办成。”“行政官员几乎全是资产者，他们已经构成一个阶级，有其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感和自尊心。”

行政官员成为旧制度下的一个独特产物，与其说他们为国家服务、为国王服务，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为旧制度服务、为中央集权制度在服务。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旧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孕育和成长已经渗透到法国人民心中，无法拔除，更无法毁灭。旧制度的可怕性并不在于它所带来的战争和灾难，而在于它的复活性、渗透性，即无休止地带来灾难和战争。旧制度土壤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苛政和独特的行政风尚，人性的贪婪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总会异化政策的初衷，一个好的制度总会在旧制度中慢慢变质，演化为一个无恶不作的“坏制度”。

斩断伸向民众的黑手

——读《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付》

沈星辰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小时候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是“法轮功”这种邪教组织，通过传播教义的方式教唆人们。稍大点后，恐怖主义则是以“9·11”时间为代表的大规模爆炸等恐怖性事件。但是这些认识都是较为片面的，直到我上了《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并且阅读了其推荐的《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付》，对恐怖主义的基本定义、特点有了一些初步的直观的概念。

这本书是胡联合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改编而成的，但是在我看来，则更像是一本恐怖主义的知识普及书，因为他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恐怖主义的各个方面。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不但系统地研究了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基本类型、基本特点、原因和机理分析、经济危害、政治影响和发展趋势，而且系统地总结了世界反恐怖斗争的基本措施和经验教训，提出了我们对恐怖主义问题应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有效开展反恐怖斗争的对策意见。正如他的导师李忠杰先生在序中提到的“它是国内第一部运用马克思注意观察与分析恐怖主义问题的学术专著，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提出了许多有别于西方的新观点，第一次向世界比较完整地展示了中国学者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基本观点。”

通读全书之后，对于书中作者提到的反恐怖主义的历史教训，我稍作梳理，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国际合作



这是书中反复提到的最重要的建议之一。由于，因此恐怖主义的活动呈现的趋势是范围的越来越广，尤其在“9·11”之后，恐怖主义均以基地组织“马首是瞻”，所以其活动也呈现出“基地化”的特点。所以它已经成为了全球人民共同反对的目标。

然而，国际合作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因为有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恐怖活动有着政治利用或实用主义（包括双重标准）政策，使当时的恐怖主义活动得到有效遏制。他们支持所谓的“自由战士”的另一组织的反政府反社会恐怖主义活动，少数国家甚至将恐怖主义当作国际斗争的武器，直接进行针对对方



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往往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由，庇护别国的恐怖分子，从而助长了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妨碍了防恐怖的国际合作。

二、思想上的准备

在思想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恐怖主义有足够的重视。许多国家只重视以政府的暴力反击恐怖分子的暴力，而忽视采取有力措施消除或解决国际、国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另外，国际社会要对于什么是“恐怖主义”达成统一的认识，目前这一点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国际协作的桎梏。

三、自身的内部建设

1、法制的建设法律是打击恐怖主义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武器，如果能够制定有利于侦查与审判起诉的法律，那么就有利于遏制恐怖主义违法犯罪活动的蔓延。

2、切断恐怖主义的经济来源。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忽视或者轻视切断恐怖分子的财路。要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筹资活动，仅以主观的良好愿望为出发点而制定想阻止恐怖分子筹资的法律或规章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是要从多方面进行可行性论证，以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而不是搞出适得其反的对策。

3、警察等安全保卫系统的健全。他们是反恐怖主义第一责任人的前线地位，意义重大，出不得丝毫差错，否则就可能酿成悲剧。

4、准备充足的反恐怖行动计划。在世界反恐历史上，计划不周、准备不足、组

织不得力，行动欠火候是反恐突击行动的致命伤。

5、重视无形的心理素质、精神文化等“软”措施。各大车站、机场等都有有形的硬件反恐措施，然而如何提高公民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心理素质，增强社会各阶层的公民意识更为重要。

6、新闻传媒的过度渲染性宣传和报道需要限制。它们增加了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加速恐怖主义的泛滥，使得反恐活动更加举步维艰。

四、大国起到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全球国际军火业火爆，特别是美国大四向热点地区输出军火，恐怖组织往往轻而易举获得大量先进的武器。另外，美国动辄以反恐为名对别国进行制裁和军事打击的霸道行径，不但家具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泛滥，而且妨碍了反恐怖主义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有效展开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因此世界的大国在反恐的全球合作上有标杆立影的模范作用。

通读本书之后，也发现了本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过于意识形态化。个人觉得作者对于西方国家的过失阐述得非常透彻，对于切断恐怖根源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所不足的地方研究并不是非常详实透彻。

最后，借用作者的一句话：“既要重视恐怖主义，又要藐视恐怖主义”。虽然恐怖分子的行径是可憎的，而且越来越严重，但是在反恐这一长期的阵仗上，各国政府也要有足够的信心，作好准备，坚信“邪不胜正”！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与公共事务中的集体行为选择

殷航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是当代公共选择学派代表学者塔洛克与布坎南的经典之作。本书以个人主义方法论、理性个体假说、损益分析以及博弈论建构了一个应然状态下的公共选择的世界，并通过严谨的理论分析，揭示了规则与制度设计对个体在博弈中的行为取向以及公共选择结果的重要影响。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在理性个体假设、社会依赖成本与集体行动规模的基础上，建构“社会选择的王国”作为深入分析公共选择的基础。首先，布坎南将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并以追求偏好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取代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以扩大理论适用范围；其次，他们认为，个体从事各种活动的成本，即社会依赖成本，由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组成。其中，外部成本随着分担人数的增加而边际递减，决策成本则反之。而理性个体在特定行为选择中会综合考虑活动的外部成本与决策成本，并选择社会依赖成本最低的方式实现既定目标。例如，人们通常自行解决私人问题，集体参与社区治理，而将国防、教育等事务交由国家和政府处理；最后，布坎南将市场视为以上公共选择的载体，并认为在长期博弈中，市场最终会克服信息不对称与交易不充分等问题，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随后，本书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分析了决策方式、参与者偏好强度、方案收益对称性以及额外支付限度四种主要因素对外部成本处理中的公共选择结果的影响。并认为，一项规则只有在最大限度满足所有参与者偏好的同时，实现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上的帕累托最优，才被认为是理想的决策规则。经过

分析，塔洛克和布坎南发现，全体一致原则虽然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因决策成本过高而无法应用于大规模集体决策；而在简单多数原则下，如禁止额外支付，则永远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若允许互投赞成票，帕累托最优能否实现就取决于特定方案的收益分配情况；而在充分额外支付的情况下，公共选择会消除所有负和博弈并确保决策方案达到帕累托最优。据此，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领域的市场机制越完备，资源配置就越有效率。只有在集体决策中充分引入市场机制，才能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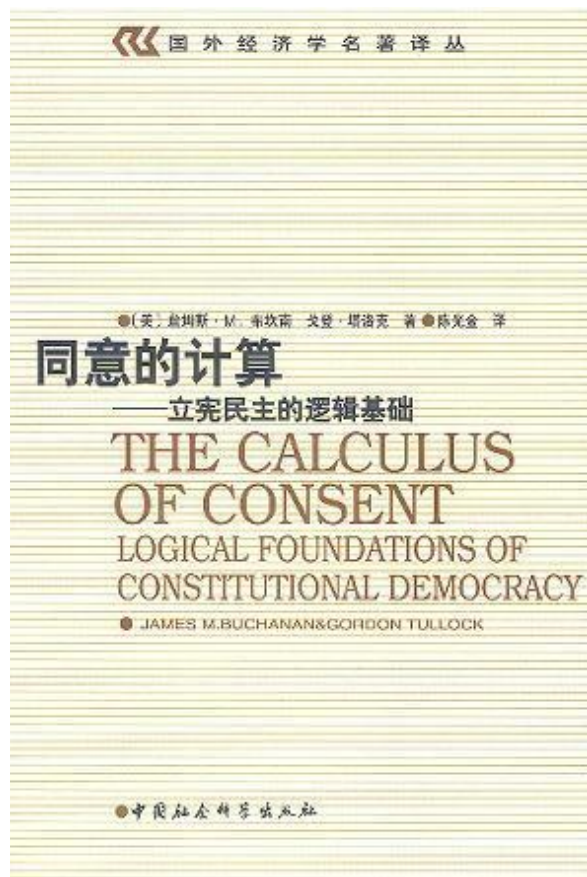
最后，塔洛克和布坎南探讨了不同民主制度下的决策成本。他们首先界定了描述选举成员到立法议会规则的变量（X1）、描述立法议会成员代表权基础的变量（X2）、代议制程度的变量（X3）和立法会议据以作出其决定规则的变量（X4）四个相互关联的立宪变量，并根据决策成本函数建构了不同制度下的决策成本计算模型。而后，布坎南对直接民主、一院制和两院制下的决策成本进行逐一分析，并证明了一院制决策成本为何低于直接民主，以及两院制是如何在有限增加决策成本的情况下，显著增加代议机构代表程度（即议会可以代表更多人的利益）的。以上分析不仅印证了人们在民主实践中长期观察到的经验结果，而且有效解释了不同幅员、民族成分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国家在民主制度方面差异的成因。但以上理论建构没有将代表选举与建立授权—委托关系所产生的一系列附加成本计算在内，故在实际应用时仍需引起注意。

总之，《同意的计算》一书在理论建构方



面首次真正解决了经济与政治领域人性假设与行为分析的理论脱节问题，证明了规则在集体行为选择中的导向作用，并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等现实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尽管一直以来，本书常以其应然性的理论推演无法完全对应现实受到读者诘难，但

笔者认为，本书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一种公共管理领域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而在于为人们审视公共问题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思路，从而帮助我们更加有效地认识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汤面与华年

潘倩倩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忘了是在哪里看到这句话了，“面里恩情细，汤中岁月长”。蒸汽氤氲的画面，是妈妈在厨房的身影，碎花棉布家居服，青绿色灶台橱柜。家里吃夜宵，最常有的是面线汤。面线，或者面干，是闽南人的叫法，面发酵拉成长丝而后晒干，形状比龙须面还要细点，该算是一种特制的面条吧。一捆捆用红线系着，静静躺在竹制的圆匾里。

闽南有风味小吃，名曰面线糊，那是将面线拧得极短而碎，倒入熬好的骨汤之中，咕嘟咕嘟翻滚几下即可，浇头随由个人喜好，醋肉、虾仁、炒猪肝凡此种种，并不拘泥。家常做法，并无这样琐碎。水大开，下面线，将它们从中折断，簌簌地一道道白线，纷纷落下。待其再次烧开，加入肉羹，蛋液在锅划着圈徐徐倒入，快熟的时候下菜叶，油盐调味，长勺一搅，即可关火。爸妈都下厨，这是妈妈的做法，肉用酱油稍腌，拌少量地瓜粉，面线下得多，面汤稠而少，盛在瓷碗里，嫩黄碧绿，色与味都是鲜亮的。爸爸做面线汤偏爱加醋，用紫菜代替绿菜叶，肉切成立方的小块，不下酱油，较厚地裹上一层地瓜粉，面线下得少，面汤留得多。出锅时，因为地瓜粉的缘故，肉羹晶莹剔透，紫菜墨绿，蛋花泛白，颇有几分诗与墨的禅意。我作为他们的女儿，二者都是做得的。每每在家，父母招呼我吃夜宵，我总以怕长胖为借口，拒绝了一碗碗热腾腾的面线汤。独自在外生活，妈妈曾经给我邮寄过面线，让我在寝室自己做着吃。我煮了几次就作罢了，因为没有地瓜粉，没有家里那口黝黑的铁锅，就总觉得做得不好。

面线在闽南是吉利的兆示，有俗语“猪脚龟，面线蛋”，在台湾，也有“猪脚面线”的讲法。生日以及出发远行的当天，早饭必

然是妈妈做的“面线蛋”，俨然的一碗面线汤，卧着两个白水蛋，一个鸡蛋，一个鸭蛋。我素日里是不爱吃白水煮蛋的，可每当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勉力地把它们全部吃掉，不再絮絮叨叨地挑剔蛋黄粉干的口感。分别在即，简简单单的一顿饭也倍加珍惜。《汉乐府》里有一句，“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一饭一羹，俱是相思。

都说是南米北面，可我这个生长于江南以南的人，对汤面却有着别样的钟爱。我曾求学在北地，每逢秋冬雨雪，宿舍里的北方姑娘们总会想着出去吃拉面。渐渐地，吃面也成为了我的习惯，从过去的卤面沙茶面到四面八方的各路面食，我还记得从山西来的姑娘时常会对着它们进行一番品评。学车的时候，早晨六点多出门，中午十二点多回的学校，就这样我还能下车后走上几百米再折腾一趟地铁，只为着吃上一碗我心心念念的乌冬面。牛肉酸汤，佐以金黄酥脆的天妇罗花，边吃边看着周边来来往往逛街的人群，身穿校服、三两结伴的学生，带着孩子、脚踩高跟的辣妈，不远处的饮料店又再做着新饮品的广告。我也试着自己做过面的，只不过我在此方面经验匮乏，既不知要醒面，也不知拉面的手法。我只将和好的面压成扁扁的一个大圆片，再用刀子切开，一公分多的宽度。我这方法可不是空穴来风，应该来源于某位食堂师傅裤带面的做法，记得在《舌尖上的中国 II》里头也有类似。面煮熟后，我直接找了个不锈钢汤碗来盛，连碗带面，颇有几分难得的粗犷。当时和我同住的是个东北姑娘，一次正逢她实习休假，我俩赖在床上看剧，临近中午顿觉腹中饥饿，无奈冰箱库存所剩无几，只找到了一袋挂面。我自告奋勇下厨，瘦肉、香菇、大葱叶，快速地

搞定。我对我的面汤挺有自信，端到室友跟前，她也说好吃。再后来，我结束了在北方的生活，我和我的北方姑娘们就这样各奔东西。沪上的冬天很冷，没有供暖的室内，静静呆着不动，脚几乎冻得僵硬。那天我从主校区监考回来，路途奔波已近一个小时，回宿舍放下东西就往外走，我要去吃面。室友好奇，问我怎么会突然想着这个，我笑言，因为真的很想念。走上三五百米到一家餐厅，饭点未到，显得有些寂寥。要了一碗鲜虾云吞面，摘了帽子围巾，自顾自地吃了，面条

偏硬，云吞里的虾仁倒是脆甜。犹豫磨蹭着不愿从温暖的店堂出来，可一出来，却发现天空已经下起了雪霰子，打在伞面上淅沥淅沥地响亮，远处的高楼里华灯初上。又是雨雪天气里的一碗面，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的关联，而那些散落在各处的人，此刻的你们又在做些什么？

我喜欢尝试美食，却也是一个极不挑吃的人，这感觉就仿若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所得必欣然雀跃。汤面是朴素的食物，汤面里有我的牵挂，有我的华年。



我在国外大学学习的感受

韩广华

人物小传：韩广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助理研究员。

忆及在国外大学学习和工作的过往，不得不承认尽管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不同的学科各有所长，但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两所学校对于学术的坚持，两所学校学生对于学习的执着，都是我至今都记忆犹新的。

当时，我受学校资助在博士生访学期间对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这所以理工科见长、坐落在四季温暖的亚特兰大市的老牌学校——进行了学术访问。就像其他的交换学生一样，出国前我对即将到来的国外生活满怀憧憬，但由于我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所以仍不免存着一丝担心。因此，访问前我打印好了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附近的公交地铁时刻表等各种文件，拖着两大箱生活用品，甚至带去了一只睡袋以便不时之需。

然而，刚到学校后来自本国学生联谊会的同学们就热情地帮助我，使我在异国他乡感到来自朋友的温暖，让我在往后的岁月里倍加怀念。在基本适应生活后，我很快融入了他们的团体，真切认识到那种来自心底沁出幸福的甜。这，是我初到国外的一次美好的心灵感受。

当然，因为交换生的学业压力较重，刚刚进入学校时我很不适应，但我的访问教授 JC Lu——一个态度和蔼、特别热心的学者——缓解了我肩头的压力。与他第一次见面之后，我们共同设定了一个研究题目。那段时间，我们保持高频率的沟通，几乎每隔一天就交流一次，探讨课题进展。高频率高质量的交流使我认识到，自己实际上还有知识点没有掌握。无可奈何，我把这几个月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新知识上，人也变得越来越气馁、疲惫，对缓慢进展愈感失望。可是，当我回国的时候，Lu 教授却语重心长地和我谈，“尽管我们的研究面临一些困扰，但你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新知识，这比一项研究结果更重要，并且会让你受益终身的！见证你的成长，是我最开心的事。”

在 Lu 教授以及他的学生们身上，我总能发现他们对知识抱有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在教室、休息室、餐厅甚至路上，我经常听到他们热烈的研讨；在实验室、图书馆，我也总能看到他们在通宵实验学习。我想，虽然国界有别，但是严谨认真的学习工作态度，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是一个人不断进步的阶石。

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很多学院的本科生毕业时需要组成团队完成一项有关企业、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的课题。同学们自由组合，个人才能、协作精神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团队需要独立前往校外单位洽谈，寻求合作的机会。总的来说，毕业之前的这次课题作业，提升了同学们的实践能力、协同能力和专业能力，意义非凡。这样的实践活动让我受益颇丰。

后来，我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博士后课程。工作之余，我常跑去旁听一些课程。这些课程的学生参与度极高：同学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需要完成不同的课程作业（可能是一篇文章、一个知识点、甚至一个案例），并在课程后期向所有同学展示他们的成果、接受来自任课老师和同学的提问。尽管这种课堂学习模式屡见不鲜，但只有当你看到不同肤色、不同口音的“联合国军”共同协作完成一项作业陈述（presentation）时，才能够深刻感受到学校本地生、留学生之间跨越肤色的真诚交流与合作。在课堂教学中，不同民族、国家的同学深入沟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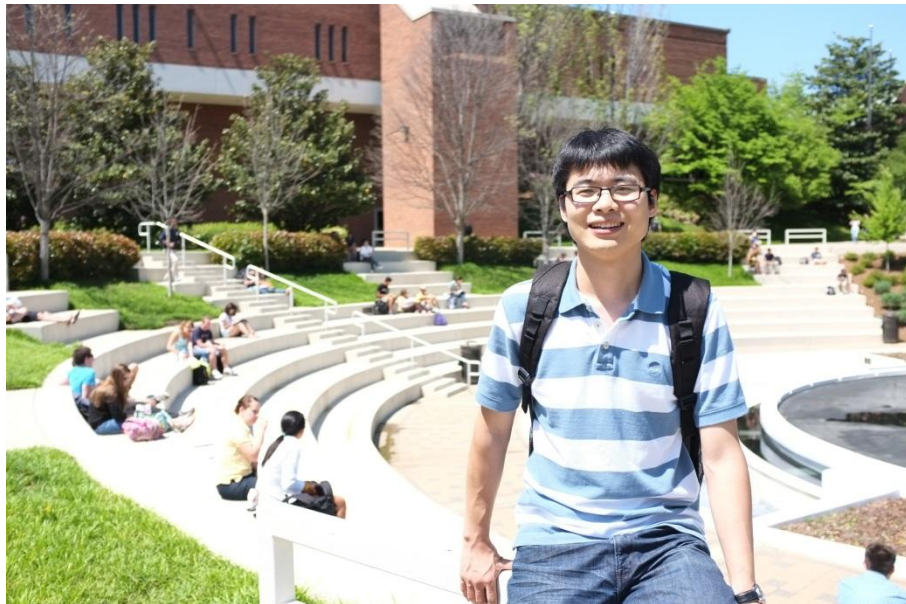
无论在新加坡还是在美国，我都看到了学校独有的校园文化。例如，佐治亚理工学



院的 GT 吉祥物是一只滑稽可爱的黄蜂（最早起源于 1890 年的校际体育比赛中），它的标志在校园内随处可见——教室、舞台、校车、便签纸随处投贴有它的图片，就连学校的球队都由黄蜂命名——黄蜂已成为佐治亚理工学院乐观进取精神的象征。而国立大学旨在建立一所“Global Leading University Centered in Asia”，因此，无论在教学中还

是在研究，该校始终坚持全球视野和创业精神。学校的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校运营、塑造了师生的品格，让人钦佩不已。

国外求学长路漫漫，我收获了知识、友谊和感动。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子将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使我在感恩中不断向前开拓人生的疆土。



志存高远 昂首向前

张楠

人物小传：张楠，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曾任国务学院研究生会宣传部干事、研究生会副主席、研究生会主席。研究生阶段获 2015 年度上海市优秀毕业生、2014 年上海交通大学优秀学生干部、2013 年上海交通大学优秀团干部。

回首旧时光，企盼未知梦

12 年的 9 月，我来到交大校园，成为了一名硕士研究生。怀着对未来的坚定与憧憬，我开始了新阶段的学习生活。回顾以往，四年的本科学习生涯带给了我丰富而扎实的逻辑思维训练；而将近两年的工作经验则教会了我真正的执行力。这期间有着喜悦与自信，有时却也叫我彷徨与沉默，因此，怀着对自我提升的迫切需求，我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

方向或许比距离更重要，很早就确定人生航向的人们，无疑是幸运的。但对于工作之后重新回到学校读书的我，这一路走得曲折艰辛。在彷徨与历练中，我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并受益无穷。凡事皆祸福相依，这一段奋斗的经历使我今后在面临困难和挑战时更加从容和充满自信。

奉献无悔，青春飞扬

奉献远比享受更加令人快乐。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学院研会的工作几乎贯穿着我的研究生生涯，而奉献，也是研会工作的主题。

在研会的倡导下，我积极地投入到残联、聋儿康复中心、图书馆、地铁站等各种志愿者活动中去，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感受人生的充实、体会生活的意义。俗话说：“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使我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尽管志愿活动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精力和体力，但这些绝对不是一种负担。在给他人带来方便和微笑的同时，精神状态

上的满足是无与伦比的。奉献远比享受更加快乐，身为青年的我们需要一份担当。

奉献，不仅仅体现在参与志愿者活动的过程中，还渗透在日常学习、工作与生活里。每当身边的人遇到困难，我总是非常乐于提供帮助——如送同学去医院，替有急事的同事完成一些细小的工作，耐心地为素不相识的人指路，帮助聋哑儿童筹集救治基金等。纵然一个人能够提供的只是绵薄之力，但聚沙成塔，我从不会“因善小而不为”。

还记得我们为学院师兄师姐组织的毕业季活动，红毯献影、歌舞惜别；还记得我们承办的社会科学博士生学术论坛，侃侃而谈、起而行之；还记得我们组织的首届“国翼杯”学院师生羽毛球赛，羽林争锋、欢乐相随；还记得我们承担的企业市场调研项目，开拓创新、传递价值。在一次次策划、组织、沟通、协调中，我们挥洒着青春与汗水，也欣慰于学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支持与信任。经历了一次次活动的洗礼，我和学院研会的伙伴们由成长慢慢走向成熟，不仅奉献了自己，也收获了彼此的认可与友谊。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

时光倏忽，转眼就到了求职季。对于文科生来说，由于机会、际遇等原因，行业、专业和工作很难做到全面的契合。取舍，几乎是每个文科生必须面对的问题。

读研期间，我在计算机行业内两家知名公司有过较长时间的实习经验，主要从事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认为自己毕业后会从事 IT 行业市场类的工作。然而，到了求职季，我问自己，这样的



选择是否真的与自己最初的追求相一致。平心而论，IT 行业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机会的行业，市场营销工作亦是我充满兴趣的。但是，我依然清晰记得，自己的初衷是如何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最大化的奉献。因此，带着这种思考，我开始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方向。

与“去奉献，去帮助更多的人”更契合的行业无疑是服务业，而金融业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服务业。金融的发展，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聪明的人具备创意、技术和激情去改造世界，但是缺乏资金的支持；勤奋的人想要合理投资，却不知如何能够将资金分配更加合理。而金融业提供的信息可以增加市场有效性，帮助人们合理利用资源，实现自身价值。一旦人们享受更好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美好。所以，我在权衡自己的所学、所爱、所需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加入金

融行业。我也希望，自己可以为人们的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尽管我的职业选择与所学专业并不一致，但是我想跟各位学弟学妹说，认真学习你的课程，履行好作为一个学生的责任，你将收获更多。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不管你将来的职业选择是什么，大学课堂教给你最重要的知识，是分析能力与研究方法，这也是你日后工作技能的基石。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自己即将拥有“毕业生”的身份。我不会忘记“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校训，也不会忘记“选择交大，就选择了责任”这第一堂课。未来的征途中还潜藏着许多的未知，但我很庆幸在不算太晚的时候找到了目标，激发了潜力。不管今后未知的路会怎样，我都将怀着自己的初衷而不懈努力，为社会的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志存高远，昂首向前！



比利时，此刻的青春最美丽！

晏子

人物小传：晏子，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Asem-Duo Scholarship 交换生，2014.9-2015.2 在 VUB 国际关系专业交换。

“那些曾经向往的地方，终于成为走过的风景了”

要说对比利时最初的印象，应该是小的时候看过许晴演的一部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不过后来才知道说的是鲁汶大学。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布鲁塞尔的向往，这个经常在教科书中出现的国家，实在太令人着迷了。

2014年9月，通过ASEM-DUO奖学金的支持，我和蒋佳颖、张晓冰一同踏上了古老的欧洲大陆，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交流学习。

虽然早就做好了接受考验的准备，但是还是没有想到在学校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困难，我们三个人拖着重重的行李箱来到 U-Residence 办理入住，发现房间的钥匙并没有如约放在信箱，之前的住户根本没有搬走，这就意味着晚上没有地方可以住。而宿舍管理员一句英语都不会说，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捡起丢了两年的法语，硬着头皮和管理员交流，希望他能帮助我们入住，虽然语法时态都有些混乱，但幸运的是，他从我的只言片语间领会了我的意思，简单地沟通后竟然同意将一间宾馆免费提供给我们住，还提供了很多实用的贴士给我们，成为我们在 U-Residence “最亲的人”。后来的半年里，我成了管理员大叔的“小翻译”，帮他给土耳其人、澳大利亚人、越南人和中国人做法语翻译，虽然我讲得并不好，但却第一次感受到了语言的重要性，它是多么重要的沟通媒介，有的时候因为你会一点他们的语言，很多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永远不要惧怕自己的语音语调不够地道，因为语言是用来交流而不是划分高下的，只要对方能理解你的意思，沟通就是成功的！

我们所住的 U-Residence 居住的基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Erasmus 交换生，走道里随时可以听到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每一种语言背后都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性格，一段历史，与这些来自世界各地朋友的交流经历，成为了我半年留比时光里最宝贵的财富。

这些小伙伴也真是可爱至极，欧洲有一个庞大的学生组织叫 ESN，大部分 Erasmus 交流生都会加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有一次 ESN 组织大家去欧洲议会 (EP) 参观。当天接待我们的“新闻办公室主任”在做完 Presentation 后问大家觉得目前的欧盟怎么样，全场沉寂了几秒后，不少欧洲小伙伴都举起了双手准备回答，其中一个来自波兰的男生说：“For me, today’s EU is another Soviet Union.” 这个回答让我大跌眼镜，一是为他的“直言不讳”，二是过去的我能够想到的都是欧洲一体化带来的 benefits，从来没有去深入思考过一体化对主权和一些国家权益的腐蚀，也只有真正和欧洲学生亲密接触，我才能了解到 real situation。

“学霸不分国界，努力是通用法则”

作为留学生，学习是永恒的主题。ASEM-DUO 项目要求每位申请者交流期间至少修满 30 个学分，并且成绩要尽量优异，不得有挂科和重修，所以我们丝毫不敢懈怠。我修读了五门专业课，五门专业课的老师各有千秋，并且他们对于学术的严谨以及 VUB 浓厚的学术氛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Gender, Diversity and Politics” 的课堂中既有鲁汶、根特的高级研究员，还有来自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的非洲代表，每节课

都会有大量的阅读材料和讨论，教授定期还会邀请比利时各个高校的博士候选人给我们展示他们的研究设计，开放讨论，集思广益。课堂外，大家还在 Facebook 上建立了课程公共主页，遇到和课程相关以及值得关注的话题，热心的“学霸们”总是毫不吝惜地尽数分享，考前甚至还猜中了教授考卷里的新闻素材。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五门课程里学习任务最重的课程，但却是我收获最大的一门课程，不仅每周有大量的阅读材料，每节课还要小测验和现场提问，平时要求大家定期阅读“Guardians”和“Financial Times”的专题报道，熟练运用“正义战争理论”、“现实主义理论”等分析国际政治。我在比利时的半年里，正值极端组织 ISIS 肆掠，比利时先是向境外出兵，后又和法国一样遭遇恐怖袭击的威胁。课堂上教授倡导大家开放讨论，运用课程所学理论分析当前局势，那一刻的课堂俨然一个“模拟联合国”，各个国家的同学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和视角下，阐述自己的看法，精彩纷呈。后来我发现这些理论，其实中国的《孙子兵法》、《孟子》中都有谈及，看来东西方文化都是相通的呀。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这门课对于我来说，是近距离接触欧盟、深入欧洲的最佳途径。而这门课的教授既是一名高级研究员，还是欧洲议会的议员，整个欧洲历史和欧盟政治、

历史进程了然于胸，他的课程没有 PPT、没有教材、没有讲义、全是重点，上课全靠速记，课下必须查阅大量资料才能消化。半年里，我每次坐 Tram 路过 Shuman 站的时候，心里总是不自觉地升起一股敬畏感，觉得这一段路特别神圣。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学习之余，旅行也是我这半年留学欧洲极为难忘的一个部分。比利时位于欧洲的中心，从布鲁塞尔出发乘巴士到荷兰、法国、卢森堡和德国都只需 2 个小时。欧洲便利的交通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让我们有幸在学术生活外，实现自己多年的欧洲游学梦，也正是这一段旅程，帮助我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欧洲。考试的时候我曾经告诉教授，中国有句古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半年来行万里路，是为了邂逅一个更加真实的欧洲。不言而喻，欧洲文明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的方面，比如对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传承、先进的法治理念和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而切身的体验，也让我对那些曾经只属于书本上的学术议题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比如让法国人头疼的非法移民问题、宗教和文明的冲突、恐怖主义、区域一体化合作等问题。

比利时是民主国家的典范，虽说早在出国前，就对比利时的政治体制有所涉猎，但那些曾经书本中“高大上”的专业知识，随着我对比利时的了解，也逐步加深。讲荷兰语的多数派和讲法语的少数派联合执政、广泛分享行政权力，地铁广播会有法语、荷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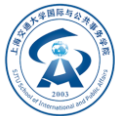


语、英语三种广播，在这里，多元文化、包容发展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当然你有可能在荷兰语区，偶遇和你讲法语朝你发脾气的“怪蜀黍”。但这些并不影响我热爱这个宁静的小城，和来自世界各地、生活方式迥异的人打交道，也让我变得更加包容、更加成熟。

2015年1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冲突进入白热化，恐怖分子开始对巴黎发动袭击。袭击《查理周刊》的那天正值圣诞节假期，刚刚结束期末复习的我和文清、晓冰当时正在巴黎游玩。第一次袭击查理周刊的时候，我们正在离事发地不远的地方，第二次袭击的时候，我们恰好在戴高乐机场附近。还记得，当天晚上辗转到郊区的时候，整个巴黎已经开始戒严，到处都是持枪的警察，

我们三个女生拖着行李箱走在巴黎凌冽的寒风中，别提有多“悲壮”了。那一刻才真正感受到之前在书本和报刊里阅读到的种族问题和非传统安全是那么真实，那些曾经抽象的议题更是如此具化。

快离开的前一天，我和从伦敦来的朋友再一次走过大广场、走过撒尿小童、走过每次都会去买的薯条店、走过圣于贝尔长廊、走过中央火车站、走过中国留学生口中的“黑狮超市（Delhaize）”，走过 VUB 的大草坪，所有的回忆就这样扑面而来。那些思念中国、一起欢乐地到亚超买菜、去徐记解馋的日子；那些在 Park 兜兜转转看芭蕾舞剧的夜晚；那些拖着 IKEA 编织袋往宿舍屯食材喂饱自己的时光，都是青春里最难忘的印记。



一个文科生的自白

武子珺

人物小传：武子珺，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曾任国务学院党支部书记，曾获上海市优秀毕业生、校三好学生，研究生阶段以公派交流生身份至巴黎政治学院交换。

凤凰花开，毕业将至，曾经我们还在羡慕学长的前途、紧张自己的出路，如今仰望苍穹，也到了自己与母校说再见的时候。

在交大的两年半，短暂而快乐。但是，作为一名文科生，我与很多人有同样的困扰——难以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职业规划。入学时，我也一度认为，“万精油”的文科专业很难确定职业方向。为了摆脱这个困扰，研究生阶段，我主要做了三件事：

客观审视自己，做好职业规划基础

只有对自己充分了解，才能知晓哪些领域哪些岗位更加适合自己。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我参加了各种实践活动，并一步步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例如，我曾经写过“让自己自豪的五十件事”和“自己的十大优缺点”——每一次回忆和总结都是对自己最好的审视。我的性格外向开朗，做事认真细致，但同时也有犹豫不决的毛病。本科阶段，我在保证学习成绩稳步提升的同时，热衷于参加各种校园活动。每一次活动之后，都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细致的总结，以期待下次活动能够做到更好。因此，我在一次次活动中逐渐充分地认识了自己，对于未来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心中也渐渐明晰。

有人说，大学阶段是一个人在心智上从青春期到成熟期的过渡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走向社会之前最后的准备阶段。无论是升学、就业还是出国，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地选择而非被动无奈的“凑合”，我们才不会后悔。

在不断尝试中，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向

现实中，处在成长成熟期的青年，多半都有喜新厌旧、虎头蛇尾的毛病。很少有人能够找准自己的兴趣并形成专长，进而发展

为未来职业规划的突破点——私以为，不断尝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不二法门。年轻人只有丰富自己的经历、尝试新鲜事物，才能更快更好地找准自己的兴趣点，从而避免因为没有尝试而后悔的现象。

学术生活中，我敢于尝试——研究生阶段，我从经管专业转为国际关系专业。我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更加高深莫测的学科，具有学术性和探索性。因此，出于能够在求学阶段读到更多不同领域的书籍、探索不同专业的知识的原因，我毅然选择了国际关系专业。

在社会实践中，我也“不断尝试”：做过各种各样的实习工作；当过打工子弟学校义务支教老师和家教；也在银行、咨询公司、保险公司做过兼职；去年还在GE（美国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做过实习，得到“做事踏实、认真细致”的评价。此外，在交大的两年时间中，我还参加了国务学院研究生学术“精品论坛”、上海市“国研杯”论文征文比赛、上海交大与徐汇区联合实践项目课题等等学术实践活动。起初我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态度，以为认真准备的论文投出去也多半石沉大海，但却获得了意外的惊喜——我的论文无意中被上海市社联看中，收录发表在《探索与争鸣》杂志中，也获得了上海市社联颁发的“优秀论文奖”。这无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因此，我更加坚信一句话：“行与不行，试过才知道。”

文科生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我对西方世界的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本科时候，我曾独自一人参加香港大学的研修课程与荷兰国际（ING Group）的见习项目，也曾作为北师大十四名公派交流生中的一员前往澳大利亚，参加昆士兰科技大学的高级研修项目。本科毕业时，我已能轻松地考取

雅思和 GMAT 高分，但因为不希望自费出国读研给家庭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我选择了国内一流名校——交大。即便如此，我依然没有放弃“行万里路”的梦想。研二时，我独自一人远赴法国，进行为期半年的公派交换项目，成为国务学院与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研究生公派交换的第一人。在巴黎的五个月充实而辛苦，单纯如梦境。在法国，当真正见到罢工游行、游说选举，我才对书本上学的西方制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行万里路的机会稍纵即逝，如不抓住必将追悔莫及。

做好这三件事后，研三时我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和方向：凡是需要与人沟通，需要细心耐心的工作都比较适合我。结合我所学的国际关系专业知识，一些带有涉外内容的工作岗位同样适合。再加上本科经管专业的背景，求职面比较宽。熟知

自己的特点后，我在应聘时就没有盲目地“海投”，而是有目的地甄选。经过若干公司单位的笔试和面试，我放弃了一些公司的垂青，最终与上海电气集团电站分公司签署了工作协议，担任经济商务专员。这个岗位虽不是薪水最高的，但却是最适合我的。在这个公司的一些海外项目中，我能够充分利用她国际关系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沟通的优势，本科时期的经管商务背景也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如今，我即将与交大说再见，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交大文科生，一个看似小众的群体，却也如校园里的樱花一般，在母校这片热土绽放青春，给母校增添一丝浪漫、温柔的情怀。未来我也一定不负母校的期望和重托，无论身在何处，用实际行动来为母校争光添彩。





当“学神”遇上“三好标兵”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朱宇轩

人物小传：朱宇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2 级本科生，荣获 2013-2014 学年上海交通大学“三好标兵”称号。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国务学院学生会副主席，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励志讲坛学生组委会秘书长。

当幸福来敲门

记得入学伊始，我在铁生馆对面的喷绘上见过“三好标兵”这四个字。当时我并不清楚其中的含义，但见上面写着“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黄超芸”，便知道这一定是个沉甸甸的荣誉，因为我知道超芸姐是学院学生会主席，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姐。不过我那时并没有想到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与这个称号发生联系。

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荣誉和成绩都是不期而至。我自认才不出众，智非过人，只是在平日里认真积极地工作、在课堂上努力勤奋地思考。未曾想到，在这样点滴的累积之后，蓦然发现自己的身旁已经有了几块敲门砖。

坦白来说，我并不喜欢追求荣誉和奖励，唯力求把在意的事做好。平心而论，不管是所谓荣誉，是进大企业实习的机会，还是到国外名校就读的 offer，我所知道的只是当门外的幸福敲响门铃的那一刻，我不应该还在床上睡大觉。

励志讲坛给了我值得铭记的大学岁月

励志讲坛是我大学生涯中最值得铭记的学生组织。入学时，琳琅满目的学生组织举办宣讲会、进行扫楼以及在东转开展百团大战，令我以及每一个期待在交大体验学生工作的同学应接不暇。然而，机缘巧合，在学长学姐的推荐下，我进入了励志讲坛这个大家庭。

从干事逐渐成长起来的我在大三成为了讲坛的秘书长。从踏实地完成每一次任务，到主动地筹划内建活动，再到统筹地协调讲坛的所有事务，规划讲坛未来的发展，每一



次的身份转换都是巨大的飞跃，而成为秘书长之后更是发生了质的改变。

第一，是对学生工作本身的理解。当初单纯地认为，做学生工作就是培养自己各种能力的过程。慢慢地我认识到，学生工作还可以是保研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认识很多大牛，所谓扩展人脉的一个选择，更可以是寻找自己的“真爱”的一个平台。学生工作可以很单纯，也可以很复杂，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工作中找到满足感和成就感，你对你所从事的“事业”是不是有足够的热情和不断进步的动力。

第二，是对一个组织发展的理解。大学校园里各类组织五花八门，由于性质的不同也会给它的成员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就励

志讲坛而言，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我理解了资源对组织的重要性，如果不能抓住校园里关键部门的资源，组织的发展将变得异常困难；当然，组织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是支撑它经久不衰甚至闪光的核心，一个优秀的组织，你可以从它每一件宣传品、每一场活动中感受到它浓厚的组织文化和独特的组织精神。

第三，从个人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在这样一个组织里遇到了一群“臭味相投”的好友，一群呼之能来、来之能战的同伴，一群能够拧成一股绳、拼命把这个组织传承下去的人。有这样一群人一起工作一起玩耍，自不必说，他们描绘了我大学生涯最灿烂的时光。正是因为我接触过别的学生组织，认识了各个组织的朋友，我才倍加珍惜励志讲坛的伙伴。在你身边，有很多怀着各种目的一起工作的人，但有幸能与一群和你志同道合，并且都深爱着励志讲坛的朋友们一起工作，这，无疑是学生工作带给我最大的财富。

唯有自己的双脚才能度量生命的宽广

不论在哪里，我都想成为一个践行者。大三，需要做大学期间最重要的选择，要为毕业之后的去向做出决定。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继续深造读研，因此也需要相应地在学习、生活上做出调整。这样的调整是困难

的，励志讲坛正是十年之际，一系列的活动以及正在酝酿的改善都不允许作为秘书长的我立刻脱手工作；同时，我又需要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学术上，因此我主动参与了更多项目的锻炼，力求尽快提高自己所缺乏的学术能力。可以说，直到大三，我才真正感受到平衡工作和学习的难度和重要性。

但就如先前所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用自己的脚步丈量道路。尽管我所面临的抉择和转变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心，但是面对困难，不去尝试就轻言放弃绝不是我的风格。在我现在看来，不论是新行政楼前的柏油路，还是包图前的水泥地，都是我这三年来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如果说我有能力在图书信息楼、光彪楼、陈瑞球楼的舞台前做好每一期项目，那我没有理由不在新图、包图读懂每一本书。我要做的就是坚定脚步，心无旁骛。

三年励志讲坛工作，两本国家奖学金证书，一座三好标兵奖杯，他们都将成为我大学生涯美丽的注脚，这三年真正带给我的，是不断进取的惯性，是时间管理的方法，是化解重压的能力，和排除万难的魄力。这就是我最真实的体验。





政治学领域前沿梳理

1. 混合和平的困境：消极或积极？

The dilemmas of a hybrid peace: Negative or positive?

作者：Oliver P Richmond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Kyung Hee University, Korea.)

文献出处：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期数：2015, Vol. 50(1)

摘要：

混合和平意味着国际规范和国际利益以及本国国内代理机构和身份认同的并存。混合和平第一阶段一般是混合政治的紧张状态，存在着结构性暴力，难以解决国内和国际规范之间的矛盾，且外包带有殖民色彩。这可以被描述混合和平的消极形式。混合和平的积极形式有利于主动而非被动解决同长期代理机构的矛盾。本文探讨的是关于混合和平的困境的争论。

2. 合作构想——关于集体行动的两个逻辑：协调和合作协调

Conceptualizing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ncertation as Two Log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作者：Darius Ornst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bias Schulze-Cleven (Rutgers University)

文献出处：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期数：2015, Vol. 48(5)

摘要：

尽管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制度化的合作对于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商业和政治发展都至关重要，然而，关于非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起源、特征和未来仍然存在分歧。本文试图通过论证不同的合作过程都由不同的集体行动逻辑所主导，并且受不同的合作驱动力的影响。例如，协调或合作生产并不容易，但却更能促进公司的发展。相比之下，在政策制定上的协调合作是国家的职责，但这种合作却不持久。本文通过对德国和爱尔兰协调与合作方式上有所不同的这两个国家在进行个案研究，并结合相关材料进行深入分析。

3. 法官与朋友：法庭之友对美国上诉法庭法官的影响

Judges and Friends: The Influence of Amici Curiae on U.S. Court of Appeals Judges

作者：Paul M. Collins, J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Wendy L. Martine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文献出处：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期数：2015, Vol. 43(2)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在美国上诉法庭的判决中，意识形态能否影响法庭之友的辩护状的影响力，旨在探讨有关政治心理学、利益集团和司法决策的受影响程度的差异。本文基于一系列的原始数据分析发现，温和派和保守派法官会受法庭之友辩护状的影响，但自由派法官则不易受影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利益集团的游说形式至少能够对司法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判断利益集团策略的有效性需要了解政治行为者如何处理具有说服性的信息。

4. 为什么英国加入欧盟的公投不能解决欧洲问题

Why a British referendum on EU membership will not solve the Europe question

作者: ANDREW GLENCRO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文献出处: International Affairs

期数: Volume 91, Issue 2, March 2015

摘要:

本文探讨英国是否作为欧盟成员举行全民公投的好处。作者质疑直接民主可以解决长期困扰英国政治的有关欧洲的问题这一假设。本文认为激进地对英国条约责任进行重构是不可取的,将会增加投票退出的风险。然而,退出并非英国解决欧洲问题的简单方式。长期的政治活动必须考虑政治和经济利益,英国从欧盟退出后,重新开启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在开启同欧盟的谈判会破坏普选的意义。如果的确如此,欧洲怀疑论者同样会不满,这可能会影响到保守党的稳定执政。因此,退出欧盟的公投这种简单果断的方式,表明承诺是靠不住的,同欧盟的关系已经是英国长期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了。

5. 国际组织, 互动和成员国利益聚合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teraction, and Member State Interest Convergence

作者: STACY BONDANELLA TANINCHEV (Gonzaga University)

文献出处: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期数: Volume 41, Issue 1, 2015

摘要:

本文介绍了关于各国代表机构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互动是如何使得各国利益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聚合的通用理论。这一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间国际组织促进了来自不同国家之间的人的互动,长此以往,有利于大成员国的利益聚合,因为有更多的机会去说服其他成员国的代表机构接受新的理念,影响他们对国家的利益的理解和界定。我认为从因果关系的机制上来看,这样的劝说并不一定能改变国家认同,但是可以促进理念的扩散。还涉及到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解的扩散。此外,我们不应该将关注点局限在社会化过程,即新成员的观念转变,更应关注到政府间组织为各国家代表机构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平台。在文中,作者提出三个关于哪些机构属性有利于成员国利益趋同的假设,并用收集到的关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原始数据集进行检验。数据结果支持了作者的通用理论,但是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与作者先前提出的一个假设背道而驰。

6. 多边援助和国内经济利益

Multilateral Aid and Domestic Economic Interests

作者: Elena V. McLean (Texas A&M University)

文献出处: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期数: Volume 69, Issue 01, 2015

摘要:

现有的有关对外援助的研究表明,援助国的经济组织,如出口商,通常应该反对多边援助。因为多边现金流并不能隐性或显性地为促进援助国本国的经济利益。然而,其实经济组织也可以受益于某些类型的多边援助,这些好处激励捐助国政府支持国际组织。作者通过有关《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援助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和国际商品贸易的分配情况的数据分析,发现强有力的实证支持这样的论点,即当捐赠者的国内经济组织通过国际环境组织的项目可以有更大的获益机会时,捐助国政府增加分配给这些组织的援助。



公共管理领域前沿梳理

1. 公共组织目标模糊性分析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Goal Ambiguity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作者: Hal G. Rainey (University of Georgia),
Chan Su Ju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出处: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期数: (2015) 25 (1): 71-99

摘要:

著名作者们认为政府机构的目标具有高度模糊性,但是这些观点需要澄清和核查。我们讨论组织目标的复杂性及其分析,并回顾其他作者对公共机构目标模糊性及其利弊的认识。然后,我们提出一个组织和明确调查的概念性框架,作为一组关于组织目标模糊性及其影响的相互关联的命题。接着,为了证明或证伪这些命题,需要界定和测量框架中组织目标模糊性和其他的概念。我们的研究完成了这些,重点利用对目标模糊三个维度的测量分析组织目标的模糊性来验证框架中的命题。此外,我们也利用了其他的研究作为延伸概念性框架的附加命题。

2. 我们需要比较,但怎么比较? 比较公共管理中的测量等效

We Need to Compare, but How?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in Compara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作者: Sebastian Jilke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Bart Meuleman (University of Leuven, Belgium)

Steven Van de Walle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出处: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期数: JAN-FEB, 2015

摘要:

除了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者,为使用跨国调查来验证理论,越来越多的研究从比较的视角关注市民与政府的互动以及市民对政府的看法。然而,这只有在我们能充分掌握不同国家和地区受访者的感知和回答的不同方式的情况下才能成功。本文主要验证公共管理研究中跨国测量等效的概念和建立等效的方法。验证了两种用于检测和校正测量非等效方法: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和多级混合项目反应理论。这些技术被用于测试和建立两个流行的测量结构的跨国测量等效:公共服务的公民满意度和公共机构的信任度。结果显示,适当处理非等效解释了不同形式的不显现的偏见。本文有助于推进研究跨国公共管理的方法论的发展。

3. 如何(不)解决问题:同源偏差学术反应的评估

How (Not) to Solve the Problem: An Evaluation of Scholarly Responses to Common Source Bias

作者: Nathan Favero, Justin B. Bullock (Texas A&M University)

出处: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期数: (2015) 25 (1): 285-308

摘要:

公共管理学者越来越关注同源偏差问题,但是对研究方法却知之甚少。在本文中,我们考虑了本期刊中六篇文章的作者的不同反应,侧重关注了以往很少关注的常见测量问题的重要细微差别问题,用一系列实证分析来测试几种同源偏差问题解决办法的有效性。结果显示,

公共管理学者所运用的统计补救措施对于解决该问题都于事无补。目前，采取感知调查测量的情况下，似乎只有找到数据的独立来源这一方法可行。

4. 从参与式改革到社会资本：市民社会网络的微观动机和宏观结构

From Participatory Reform to Social Capital: Micro-Motives and the Macro-Structure of Civil Society Networks

作者：Juliet Ann Musso, Christopher Wear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出处：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期数：JAN-FEB, 2015

摘要：

大量文献探讨了社会资本的有利影响，直到最近，社会网络出现的方式以及公民参与和协同治理的影响才得到系统性的关注。本文采用最新的社交网络统计模型研究了洛杉矶参与式改革后公民网络的出现。研究结果表明，培育了一些良好网络的改革对民主参与的支持有促进作用。同时，在自然出现的公民网络中，微妙而无处不在的社会经济排序对提升地位更高的行动者有无意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些发现表明，宏观层面的政策干预需要对促进社会经济中不同社会团体的交叉对话有培育和发展作用。

5. 养老金并轨促行政体制改革

作者：杨燕绥，张弛（清华大学）

出处：中国行政管理

期数：2015年第3期

摘要：

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并轨和公务员工资改革并举，看似一项社会政策改革，却酝酿很久，社会反响很大，因其影响着国家行政文化及其政府组织的变革，是代表社会进步的重大事件。本文基于组织理论、薪酬理论和服务型政府的视角审视这两个事件，分析政府组织从封闭到开放、公务员待遇从工资到薪酬、国家机关从行政到服务的重大意义。

6. 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改革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基于焦作试验的考察

作者：马蔡琛（南开大学）

出处：中国行政管理

期数：2015年第3期

摘要：

性别预算的焦作试验中，结合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探求了其自主推广的路径选择。中国的性别预算改革面临着政策执行效力不佳、公民参与能力有待加强、性别预算分析工具不够完善等问题。就未来发展而言，应从地方试点的推广做起，逐步拓展性别预算的应用范围，并探索性别预算与当前深化财税改革的有效整合。

速览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分析”学术研讨会 在我院隆重召开

由我院承办的上海市社联 2014 国际关系学科专场学术研讨会在 2014 年 10 月 18 日下午于徐汇校区隆重召开。近三十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题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分析”的学术研讨活动。曹友谊书记代表学院致欢迎词。上海市社联党组副书记桑玉成教授对我院此次会议的研讨主题予以高度肯定。最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金应忠秘书长做大会总结。他高度赞赏与会学者们专业研究的深度与厚度，鼓励大家继续深化此领域的研究，呼吁政界、军界和学界的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合作，互联互通，协同创新，为国家更好地献计献策。

“国家与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我院成功举行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上午，由徐家良教授主持的“国家与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在我院成功举行。我院院长钟杨教授致欢迎词，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胡象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程伟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林闽钢教授分别做主题发言，之后由我院副院长彭勃教授对主题发言进行总结。我院老师和研究生共计 200 多人参加了论坛，并在现场与演讲嘉宾进行了深入的互动。



我院台湾研究中心承办两岸婚姻研讨会

由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会主办，我院台湾研究中心与民政部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联合承办的“2014 年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政策理论研讨会”，10 月 29 日在上海龙柏饭店成功举行。来自民政部、国务院台办、全国台湾研究会、中国社科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社科院等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四十余位嘉宾和学者齐聚一堂，为增进两岸婚姻家庭福祉献计献策。



“中美学者关于文化外交的圆桌对话”研讨会 在我院成功举行

由我院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妇女儿童研究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的“中美学者关于文化外交的圆桌对话”研讨会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在我校徐汇校区新建楼举行。钟杨院长致欢迎辞时。驻沪美领馆新闻文化处处长欧阳天 (Brian Gibel) 致开幕词。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 Cynthia Perrin SCHNEIDER 教授、霍特国际商学院副院长费嘉炯博士 (Andrew Field) 和上海戏剧学院美籍客座教授蓝毅文 (Stephen Larsen) 与来自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的十多名中方学者围绕文化外交的内涵、国际教育交流、非政府组织从事文化外交活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周边关系与外交”研讨会在我院成功举办”

由我院与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周边关系与外交”研讨会于2014年11月9日在徐汇校区新建楼隆重举办。来自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及我院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会议开幕式由我院李明明副教授主持，钟杨院长代表学院致欢迎词，他对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予以高度肯定，并对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进行了致辞。

我院主办的第六届“中日美三边关系国际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4年11月15日，第六届“中日美三边关系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此研讨会由我院主办，校环太平洋研究中心与日本研究中心承办。会中，来自中日美三国的专家学者50余人共聚一堂，围绕“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展开和对东亚的影响”、“日本‘积极和平主义’的目标和实现路径”、“中日美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基层协商民主与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国务学院成功举办

2014年11月21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基层协商民主与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我院召开。来自中央编译局、国家行政学院、复旦大学等全国十几所科研单位和政府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开幕式由我院副院长、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彭勃教授主持。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陈家刚研究员和我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南教授分别致欢迎辞。



《中国社会组织评估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发布会暨2014年社会组织治理高峰论坛在我院成功举行

2014年12月12日上午，《中国社会组织评估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发布会暨2014年社会组织治理高峰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成功举行。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并得到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钟杨院长主持，校党委副书记胡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等领导嘉宾依次发言，蓝皮书主编、校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教授介绍了蓝皮书概况。发布会结束以后还举行了2014年社会组织治理高峰论坛，来自各大高校的相关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出席了本次会议。

中美学者共话台湾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

2014年12月19日，“台湾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成功在我院举办。美国宾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戴杰（Jacques deLisle）、美国戴维逊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雪丽（Shelley Rigger）、美国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以及香港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胡伟星、台湾中研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冷则刚、台湾淡江大学教授何思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严安林、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胡凌炜、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鹏、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王宪、副主任王伟男、副教授吴清、等两岸三地学者参加了这一研讨会。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挑战和愿景”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12月20日，我院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联合在沪举办主题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挑战和愿景”的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宾州大学、美国戴维逊学院、香港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吉林大学和我院近二十位中美专家学者，从历史、学理和决策的三个维度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状、挑战和愿景”进行了深入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在北京发布慈善法民间版本

12月21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的慈善法民间版本研讨会上，上海交通大学版本首次发布。此民间版本由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组织力量起草，由徐家良教授担任组长，课题组由长江流域的高校教授组成。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团研究员主持。参加慈善法民间版本研讨会的嘉宾除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实务界、媒体记者外，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于建伟主任、副主任刘新华，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健等领导参加。

“两岸青年世代的未来意象”学术研讨会在我院举行

由台湾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发起倡议、由该所与我院台湾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两岸青年世代的未来意象”学术研讨会，于1月17日上午在我院3003会议室举行。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邓建邦副教授、彭莉惠博士、我院台研中心副主任王伟男副研究员，以及来自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两岸青年世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婚恋观、性别信仰、未来意象等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国务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五所高校并同英国国王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3月16日至23日，由钟杨院长领衔的国务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五所高校，探索学院高层次国际化合作机会并与国王学院签订院级合作协议，包括1+1硕士双学位联合培养计划，与其他四所高校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本次访问的高校有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国王学院。该协议的签署为拓展了我院与英国高校的高层次合作交流，成为学院国际化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务学院代表团访英成员还包括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彭勃教授和外事秘书彭晶晶老师。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荒木法一教授一行到访国务学院

3月19日下午，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荒木法一教授一行到访国务学院。国务学院副院长章晓懿教授主持接见，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日韩交流处副处长蔡玉平老师一同参与接见。双方就互派学生交流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旨在为实质性推动两校学生交换和学术交流搭建平台，会谈双方对未来的进一步合作交流充满期待。

斯坦福大学传播系主任詹姆斯·费什金教授来我院做题为“协商民主的应用：协商民意测验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做客焦点讲坛和文治讲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教授做客交大，谈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战略格局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 Bob Carr 教授做客国务学院“国是高峰论坛”

